

جوڭگونىڭ چىگارا سىياسىتى

中國邊政

China Border Area Studies

شۇەن-خېرىمىن-شىۋى

مەمۇرىي رەھبەر
پروف. شۇەن-خېرىمىن-شىۋى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一十三年十二月

230

目 錄

專論

- 林彪事件再考——以蒙古國檔案為中心 呼斯勒 1
新疆昌吉州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岩畫的圖像分析與文化認同... 張嘉馨 41

研究札記

- 噉達族屬蠡測 劉學鈞 75
滿洲史言隨筆集 甘德星
..... 蔡名哲 95

譯文

- 官話而不是滿語：乾隆《御製增訂清文鑑》及其 馬騰著 119
在朝鮮和日本的改易 蔡名哲譯
《世界史中的金帳汗國》的前言、導讀與結論 瓦基姆·特列 155
帕弗洛夫等
Ts. 達姆丁蘇倫的兩首短詩試譯 黃柏諺 175
楊子嫻
稿約 181

林彪事件再考—以蒙古國檔案為中心

呼斯勒 (Husel Borjigin)

昭和女子大學大學院生活機構研究科教授

前言

1971年9月12日夜、13日凌晨，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被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893-1976年）欽定的接班人，其接班人地位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人民日報》1969年4月29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1970年9月6日中國共產黨第8屆中央委員會第2次全體會議基本通過）的中國第二號領導人林彪（1907-1971年）與其妻子葉群（1920-1971年）、兒子林立果（1945-197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處長劉沛豐（?-1971年）、林彪的司機暨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汽車隊副隊長楊振剛（1932-1971年）及部分機組人員共9人乘坐的256號英國造霍克薛利三叉戟飛機出走，在蒙古國肯特省溫都爾汗東北貝爾赫（Berkh）礦區西南部蘇布拉噶峽谷（Suvargyn khöndii）墜毀，9人全部身亡，史稱「林彪事件」或「九一三事件」。該事件堪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最大的懸案。

半個世紀多來，學術界有關「林彪事件」之研究著述如汗牛充棟、舉不勝舉。然而，迄今為止，該事件之真相依舊未能查清。雖然一些網路消息聲稱驚爆256號專機「黑匣子錄音」之類，寫得聳人聽聞，不過是嘩眾取寵而已，毫無證據，不值一批。而對林彪這一中國現代史上「最值得研究的人」¹、也是「最經得住研究的人」²的評價亦是意見不一、殊為分歧。「林彪事件」研究之難，原因主要有三點。其一，從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由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

¹ 葉永烈，《林彪與毛澤東》（遠方出版社，2003年），頁178。

² 王年一，〈林彪——最經得住研究的人〉（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第二版】，明鏡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為2007年】），頁3。

法院特別法庭所組織的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主犯」進行的公開審判，及 1981 年 6 月中共中央第 11 屆 6 中全會通過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林彪集團和江青（1914-1991 年）集團即「四人幫」指控、定性為「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誣陷和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策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謀害毛澤東，策劃反革命武裝政變」。在中國，這一結論目前無法推翻。第二，林彪事件之原始檔案，不論在中國，還是蒙古國、俄羅斯都極為敏感，尚未解密。查閱與此事件相關之檔案，均屬於禁忌。第三，乘坐 256 號三叉戟飛機的 9 位當事人在事件發生之際已遇難身亡，可謂「死無對證」。

林彪事件自身矛盾重重，撲朔迷離，學術界已多有指出。筆者也曾在拙作〈從蒙古看「林彪事件」——基礎研究〉中對林彪事件之疑點予以整理、總結³，不予贅述。若要解開林彪事件之謎，挖掘相關各國之檔案及當事人之證詞極為重要。隨著民主化的推進，1991 年之後，曾經參與調查、處理 256 號飛機墜毀事件的蒙古國的幾位當事人紛紛撰稿，將各自的所見所聞及觀點公之於眾⁴。蒙古國研究林彪事件的權威、歷史學家 Ch. 達西達瓦（Ch. Dashdavaa, 1949-2015 年）依據蒙古國外交部中央檔案館的檔案等，於 2007 年出版了專著《林彪元帥之死》⁵，為人們提供了諸多鮮為人知的第一手資料，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達西達瓦先生曾任蒙古國家檔案管理總局局長、文化藝術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蒙古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蒙古國家安全審議會國家恢復名譽業務指導委員會附屬為肅

³ ボルジギン・フスレ，「モンゴルからみた“林彪事件”——基礎的研究」，『学苑』第 960 号，2020 年，頁 1-30。

⁴ Г. Зуунай，「Хэнтийд сүйрсэн онгоцонд хэн байсан бэ?」，*Ил товчоо*，1991 он № 25（G. 朱乃，〈誰坐在墜毀在肯特的飛機上〉，《公開摘要》，1991 年第 25 期）；「Хятадын Батлан хамгаалах яамны сайдыг хөнөөсөн хуйвалдааны нууцаас」，*Маш нууц*，1991 он № 25（〈迫害中國國防部長的陰謀〉，《機密》2004 年第 25 期）；И. Санжаадорж，「Осолдсон онгоцонд Хятадын Батлан хамгаалах яамны сайд яасан уу?」，*Ил товчоо*，1993 он № 23（I. 桑嘉道爾吉，〈中國的國防部長是否乘坐在失事的飛機上？〉，《公開摘要》，1993 年第 23 期）；Д. Ёндон，「Эхний зарим алхам」，*Алтан аргамж: Монгол элч нарын дурсамж*，Улаанбаатар，1996 он，тал.70-81（D. 雲登，〈最初的幾步〉，《黃金之路——蒙古大使回憶錄》，烏蘭巴托，1996 年，70-81 頁）。

⁵ Ч. Дашдаваа，*Маршал Линь Бяогийн үхэл*，Улаанбаатар，2007 он（Ch. 達西達瓦，〈林彪元帥之死〉，烏蘭巴托，2007 年）。

反被害者恢復名譽研究中心主任等職。曾撰寫、出版《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文化革命—歷史經驗、現代問題》（1989 年）、《紅色歷史—共產國際與蒙古》（2003 年）、《蒙古的政變》（2008 年）、《日本俘虜在蒙古》（2013 年）、《周恩來與蒙古—照片與資料集》（與 Ch. Bold 共著，2014 年）等多部學術價值極高的專著。也曾多次參加由筆者所策劃、組織的在東京和烏蘭巴托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惠贈論文。2014 年 8 月，在第八屆烏蘭巴托國際學術研討會《綜合研究—哈拉哈河・諾門罕戰爭》舉辦期間，達西達瓦先生將其專著《林彪元帥之死》等贈予筆者，並商定於 2015 年 8、9 月間一起赴俄羅斯調查、搜集有關林彪、溥儀及內蒙古與蒙古、蘇聯關係之檔案。2015 年 8 月初，筆者與達西達瓦先生預約了從蒙古飛往俄羅斯的機票及住宿等，然而，就在筆者從東京出發之前，突然接到其同事發來的噩耗—達西達瓦先生於當年 8 月 19 日病逝。悲痛之情，無以言表。

達西達瓦的專著《林彪元帥之死》的部分內容被譯為中文，由舒雲等予以介紹⁶。時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長 D. 雲登（D. Yondon，1927-2018 年）答日本《朝日新聞》、《每週星期日》記者的採訪錄等⁷也被譯為英文、中文等，為林彪事件研究者所熟知。由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於 1971 年 10 月 4 日審議通過，由蒙古外交、軍事、公安、醫務人員等組成的調查小組於當年 11 月 20 日完成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墜毀原因的調查報告〉亦被翻譯成中文，由余汝信加以分析、評論，刊登於《華夏文摘》增刊第 1028 期⁸。余汝信雖說，蒙古國檔案部門已於本世紀初對該報告解密，其實並非如此。該文也沒有標明收藏有該檔案的檔案館名和檔案編號。由原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KGB）調查部副部長 A. V. 扎格沃茲丁（A. V. Zagvozdin，1924-2018 年，1974 年晉

⁶ 舒雲，〈蒙古學者披露林彪飛機墜毀細節〉，《決策與資訊》2011 年第 12 期，頁 68-71。

⁷ 「処理担当の元モンゴル高官“林彪墜死”詳細を証言」，『朝日新聞』1998 年 2 月 15 日【東京：朝刊】。「モンゴル元外務次官が明かした林彪事件 30 年目の真実」（『サンデー毎日』第 79 卷第 40 号，2000 年），頁 31-33。

⁸ 余汝信，〈蒙古官方調查報告中的「九一三事件」〉，《華夏文摘》增刊第 1028 期，2016 年，www.cnd.org/cr/ZK16/cr860.gb.html。

升為少將）上校、原蘇聯國防部中央法醫研究所副所長 V. V. 托米林（V. V. Tomilin，1928-2009 年，1981 年晉升為少將）上校等 4 名蘇方工作人員和兩名蒙古國家安全局委派的工作人員組成的調查組於 1971 年 11 月 2 日所寫的調查報告被翻譯成日文在日本予以報導⁹。而彼得・漢娜姆（Peter Hannam）和蘇珊・勞倫斯（Susan V. Lawrence）所撰寫的有關林彪之死的文章也依據了扎格沃茲丁和托米林所提供的資訊¹⁰。俄國《消息報》1994 年 2 月 17 日刊載的文章〈克格勃的將軍將林彪元帥的頭顱帶回了莫斯科〉對由扎格沃茲丁等組成的秘密調查小組赴蒙進行調查一事做了介紹¹¹。需要指出的是，新聞媒體及學術界在提及扎格沃茲丁和托米林時，誤以為 1971 年時二者的軍銜為將軍。其實，1971 年蘇方秘密調查小組赴蒙古調查時，二者的軍銜均為上校，倆人是後來才晉升為少將的。

本文在參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依據筆者在蒙古所搜集到的資料，包括對蒙方當事人的採訪記錄等，對林彪事件重新予以考察¹²。

蒙古檔案之補正：又一個「256 號」

自中蘇關係破裂後，中蒙關係也趨於緊張，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兩國關係完全處於對立狀態。自 1967 年 1 月中國駐蒙古大使張燦明（1914-2010 年）返回北京後四年多的時間裡，中國一直沒有任命、派遣駐蒙大使。其間，蒙古也撤回了駐中國大使 D. 策伯格米德（D. Tsebegmid，1915-1991 年）。1970 年下半年，中蒙外交界開始恢復接觸。經過幾次磋商後，1971 年 6 月 21 日，中國駐蒙古大使館臨時代辦呂

⁹ 古谷浩一，『林彪事件と習近平——中国の権力闘争，その深層』（筑摩書房，2019 年），頁 161-164。

¹⁰ Peter Hannam and Susan V. Lawrence, "Solving a Chinese Puzzle Lin Biao's Final Days and Death, After Two Decades of Intrigue", *US. News & Report*, Vol.116, Issue 4, January 23, 1994, pp.51-54.

¹¹ В. Скосырев, "Голову маршала Линь Бяо генерал КГБ привез в Москву", *Известия*, 17.02.1994 (V. 斯科斯列夫，〈克格勃的將軍將林彪元帥的頭顱帶回了莫斯科〉，《消息報》1994 年 2 月 17 日)。

¹² 本文是在拙作「“林彪事件”補遺」（『モンゴルと東北アジア研究』Vol.9，2024 年 3 月，pp.191-200）的基礎上，增補了“Мао Цзэ Дуны эсрэг бүлэг, байгууллагуудын гаргаж байсан ухуулга”，1969-1971 он（《反對毛澤東的團體和組織的宣傳活動》）等資料撰寫而成。

子波向蒙古外交部副部長 D. 額爾敦畢力格 (D. Erdembileg) 遞交了中國駐蒙古大使館致蒙古外交部的照會 (照字 23/71 號) 及許文益 (1917 年-) 的簡歷等。該照會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準備任命許文益同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人民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並附有許文益的簡歷。其內容如下：「許文益同志，男，1917 年 8 月生，上海人，大學肄業。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一秘，外交部人事司副司長，世界知識出版社副社長，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剛果 (布) 大使館參贊等職」¹³。7 月 1 日，蒙古外交部第二司司長 P. 策倫朝道勒 (P. Tserentsoodol) 約見呂子波代辦，表示蒙古政府同意中方所提出的任命許文益為中國駐蒙古大使的照會內容。

1971 年 8 月 15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董必武 (1886-1975 年) 簽發了由外交部長姬鵬飛 (1910-2000 年) 副署的、致蒙古人民共和國人民大呼拉爾主席團 J. 桑布 (J. Sambuu, 1895-1972 年) 主席的、任命許文益為中國駐蒙古大使的任命書。任命書全文如下：

蒙古人民共和國人民大呼拉爾主席團扎木斯朗·桑布主席

為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友好關係，我任命許文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人民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接任前任大使張燦明的職務。

我相信許文益大使將盡力完成他所擔負的使命，請你惠予接待，並對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進行的工作給予信任和幫助。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董必武

外交部長姬鵬飛 副署

1971 年 8 月 15 日於北京

國字第 256 號¹⁴

¹³ “БНХАУ-аас БНМАУ-д сууж байсан Элчин сайд Сүй-Вень-Й-гийн хэрэг (1971-1974)”，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Гадаад харилцааны төв архив, 5-2-447, тал.167, 197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使許文益事由 1971-1974 年〉，蒙古外交部中央檔案館，5-2-447，頁 167、197)。

¹⁴ Мөн тэнд, тал.133-136 (同上，頁 133-13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1898-1969 年）在文革爆發後遭到批判，並於 1968 年被開除黨籍，國家主席等職均被罷免、撤銷，第二年去世。是否設置國家主席，及由誰接任國家主席、副主席一事便成為中共 9 屆 2 中全會前後黨內爭論的問題之一。而所謂的「堅持要設國家主席」這一點後來成了「林彪集團」試圖「篡黨奪權」的罪證之一。通過 1971 年 8 月董必武所簽發的任命書等可知，此時董必武依舊發揮著國家副主席的職能。無獨有偶，上面所舉任命許文益為中國駐蒙古大使任命書的編號為「國字第 256 號」！與當時中國第 2 號領導人林彪專機 256 號飛機的編號一致。這可以說是一種巧合。而林彪墜機事件的「巧合」實在是太多了。譬如林彪的秘書之一張雲生（1924-2006 年）於 2006 年 9 月 13 日去世，曾經呼籲為林彪平反的、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王年一（1932-2007 年）則於 2007 年 9 月 13 日去世。即二者都是在林彪的忌日離世的。這是後話。

1971 年 8 月 20 日身負改善兩國關係使命的許文益到達烏蘭巴托，同月 25 日向蒙古人民共和國人民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 J. 桑布遞交了國書。並表示：「我將為進一步發展中蒙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作出自己的努力。我相信，在我任職期間，將會得到您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協助和支持」¹⁵。然而，等待著許文益的卻是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震撼世界的「事件」。

對 256 號航班航向及蒙蘇調查小組調查活動的再探討

1971 年 9 月 12 日夜、13 日凌晨山海關機場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件。對於林彪何以「選擇」乘機出逃這一問題，學術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褒之者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林彪有叛逃之心，林彪也不知道飛機要飛向何方，他是被騙上飛機的；有人則宣稱林彪是遭到綁架，被林立果和葉群拉著、拽著上的車，上的飛機¹⁶；甚至有人認為林彪上飛機北飛是北京的陰謀¹⁷；也有人主張即便林彪是出於本人意識出逃，也是被毛澤

¹⁵ Мөн тэнд, тал.160-166 (同上, 頁 160-166)。

¹⁶ 張寧，《塵劫》，明報出版社，1997 年。

¹⁷ 舒雲，高伐林，〈專訪舒雲：葉群、林立果為何挾持林彪出走〉，《新史記》編輯部，《林立果為何魚死網破》（哈耶出版社，2012 年），頁 117-126。

東所逼，錯不在林彪¹⁸。貶之者則想盡辦法證明林彪是畏罪叛逃¹⁹。關於 256 號飛機強行起飛後的航線，當事人的說法也不一致。有說先向西飛，之後轉彎，向正北飛行的；有主張飛機先向西南，之後右轉，向北京飛，但在遷安突然向北直飛的；有說「開始航向很亂，過了河北的遵化才比較清楚，到了內蒙古的西部，航跡突然向北」的；有說「基本上按『之』字形，山海關、遷安、多倫、貝勒廟【錫林浩特】……」的²⁰；也有人說第一個階段「起飛的方向與去廣州的航向基本一致」，第二個階段「是從山海關回到北京的航向」，第三個階段是「越過叛逃航向 325 度而到達航向 340 度」，第四個階段「飛機穩定在叛逃方向即 325 度上」，「飛機在山海關機場畫了一個碩大的問號」²¹；《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則說該機「首先往南飛了約 10 分鐘時間，然後掉頭返回山海關，但發現山海關機場已遵照周恩來指示關閉……迫使他飛往蘇聯」²²；還有人說「一開始向西飛，然後又向東飛，最後突然向北飛去」²³；甚至有人強調是「一條直線，一點彎也沒有」，「直向烏蘭巴托」等等²⁴。顯然，上述記述，極不科學。按照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吳法憲（1915-2004 年）的說法，256 號飛機起飛後，中國空軍等的雷達一直都在追蹤該機，直至出境²⁵。既然如此，只要中國軍方公佈當時的記錄，那麼 256 號飛機起飛後在中國境內的具體航線，諸如幾時幾分到達何地，高度是多少等資訊就會大白於天下。這對於揭示林彪事件的真相極為重要。非常遺憾的是，中國軍方一直沒有公開這些資料。

中方資料認為，256 號飛機於 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 1 時 50 分飛入

¹⁸ 王年一，何蜀，陳昭，〈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當代中國研究》2004 年第 2 期，頁 137-154。

¹⁹ 孫一先，《在大漠那邊—林彪墜機真相》（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年），頁 206-209。林星雨，《林彪傳》（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 年），頁 438。

²⁰ 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明鏡出版社，2006 年），第 16、18 章。

²¹ 欲鳴，《歷史重新評說—為林彪元帥鳴冤》（靈活文化，2011 年），頁 395。

²²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余金堯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2006 年重印]），頁 797。

²³ 吳法憲，〈林彪機毀人亡，周恩來鬆了一口氣：回憶「九一三」事件〉，《新史紀》2011 年總第 3 期，頁 93。

²⁴ 舒雲，前揭《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第 18 章。

²⁵ 吳法憲，前揭〈林彪機毀人亡，周恩來鬆了一口氣—回憶「九一三」事件〉。

蒙古境內²⁶。孫一先稱，9月13日蒙軍和駐蒙蘇軍「在縱深沒有發現這架中國飛機」，「蘇軍和蒙軍的雷達站……或者沒有開機，或者開了機也沒有認真值班」，蒙軍阿沙蓋圖邊防站將此「消息壓了9個小時17分鐘才上報邊防總隊」，蒙古的「防衛系統在17小時57分鐘（9月13日下午4時）以後，才上報到烏蘭巴托公安部邊防內務軍事務局」，「駐蒙古蘇軍的防空系統看來漏斗也不少」²⁷。但他卻沒有出示證據。

根據蒙方記錄來看，1971年9月13日凌晨過後，蒙古邊防部隊第20支隊第2哨所的哨兵烏森柏（Usenbai）和通訊中尉滿達拉（Mandal）等向上級部門報告，1時53-55分，一架沒有開燈、不明國籍的飛機，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通過蒙古人民共和國蘇赫巴托省阿斯噶特縣（Asgat Sum）414號界樁越境而來，侵入蒙古領空，響聲巨大。此機便是256號飛機。該機先後於1點57分飛過蘇赫巴托省納仁縣（Naran Sum）中心所在地東2.5公里處，2點1分飛過翁貢縣（Ongon Sum）中心所在地東27公里處，2點6分飛經紅格爾縣（Khongor Sum）東26公里處，2點9分飛經哈勒贊縣（Khalzan Sum）中心所在地西7.5公里處，2點17分飛經孟赫汗縣（Mönkhkhua Sum）中心所在地西5公里處，2點24分飛經肯特省伊德爾莫格縣（Idermeg Sum）中心所在地東16公里，由此向北飛行了約35公里後，向西南折返，於2點30分左右在貝爾赫礦區西南14.8公里的蘇布拉噶峽谷墜毀²⁸。關於墜毀時間，下面將提到的9月30日《蒙古真理報》的報導稱是「2時25分」。蒙古外交部中央檔案館所收藏的有關此次飛機失事的檔案中的一份蒙古地圖上標識的時間為「1971年9月13日2點25分」。這應該是1971年蒙方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時所得出的時間。上面所提蒙方調查小組於當年11月20日完成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墜毀原因的調查報告〉便認定飛

²⁶ 田繼軍，《中國共產黨黨史紀實—歷史的豐碑》第2卷（黨史研究出版社，2010年），頁888。

²⁷ 孫一先，前揭《在大漠那邊—林彪墜機真相》，頁179-180。

²⁸ Б. Ганхүлэг, Хилийн 0184-р ангийн 80 жилийн ойд зориулав Он жилүүдийн түүхнээ дурсагдах “Онгон”-ны манлай анги: Түүхэн баримт, үйл явдал, дурсамж, тэмдэглэл,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6 он, тал.396（В. 鋼胡勒格，《紀念0184邊防部隊成立80周年：值得永遠紀念的「先鋒隊」—歷史資料、事件、回憶、記錄》，烏蘭巴托，2016年，396頁）。

機墜機時間為 2 時 25 分。如上所述，256 號飛機於 9 月 13 日凌晨 1 時 53-55 分從中國通過 414 號界樁飛入蒙古境內，若經過上述各地，到達蘇布拉噶峽谷約需 30 分鐘。但正如達西達瓦所指出的那樣，在 256 號飛機遺留物品中有 5 塊手錶。其中一塊手錶的指針停在 2 時 27 分。因此，達西達瓦斷定 256 號飛機墜機的時間為 1971 年 9 月 13 日 2 點 27 分²⁹。現在，學術界已基本採納了這一觀點。

256 號飛機失事原因是林彪事件研究的焦點之一。256 號飛機在蒙古墜毀這一消息一經傳出，各國輿論便做出了種種猜測。半個世紀多來，各種推測有增無減。諸如「中國軍隊導彈擊落說」³⁰、「蘇蒙軍導彈擊落說」³¹、「機上搏鬥說」³²、「起飛前飛機已被做了手腳說（安置了小型定時炸彈之類）」³³、「迫降失事說」³⁴、「自殺殉職說」³⁵等等。近年來還出現了所謂的「西山遇害說」等³⁶。許多目擊者都證實 9 月 12 日夜林彪和葉群等上了 256 號飛機，因此「西山遇害說」無法成立。而 256 號飛機在飛入蒙古境內後基本上保持低空飛行，中方既沒有下令向 256 號飛機發射導彈的命令，當時也不具備向已經進入蒙古境內低空飛行的飛機發射導彈的技術³⁷，所以完全可以排除「中國軍隊導彈擊落說」。俄國漢學家 R. Sh. 古達舍夫（R. Sh. Kudashev，顧達壽，1929 年-）稱，256 號飛機失事後，奉蘇聯駐中國大使 V. S. 托爾斯季科夫（V. S. Tolstikov，1917-2003 年，在任 1970 年 10 月-

²⁹ Ч. Дашдаваа, мөн тэнд, тал.33 (Ch. 達西達瓦，前揭《林彪元帥之死》，頁 33)。

³⁰ ベンジャミン・ヤン著，加藤千洋，加藤優子訳，『鄧小平 政治伝記』（朝日新聞社，1999 年），頁 343-344。

³¹ 陳曉寧，〈質疑林彪出走事件〉，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事件》【上】（明鏡出版社，2004 年），頁 332-385。

³² 欲鳴，前揭《歷史重新評說—為林彪元帥鳴冤》，頁 552-555。

³³ 轉引自丁凱文，〈「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評〉，《當代中國研究》2007 年第 2 期，頁 155。

³⁴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1603-1604。

³⁵ 康庭梓，《真相 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 年。

³⁶ Yao Ming-Le, *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 Biao: How Mao's Successor Plotted and Failed - An Inside Account of the Most Bizarre and Mysterious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3. 姚明理著，莫昭平，傅依萍譯，《林彪的陰謀與死亡》（時報文化，1983 年）；姚明樂著，林牧譯，《林彪之死—一流產政變幕後秘辛：重要的歷史轉折時刻》（遠東評論出版社，1983 年）。

³⁷ 舒雲，〈林彪座機墜毀前後的空軍指揮所〉，《黨史博覽》2004 年第 12 期，頁 33。

1978 年 6 月)之命，他與大使館的兩名工作人員一起去失事現場考察。古達舍夫稱「在飛機的艙壁上發現了子彈的彈孔」，由此斷定「機艙內發生了搏鬥」。但他又強調「可以肯定飛機墜毀不是由於機艙裡面的射擊所致」，而是在「溫都爾汗地區被擊落」的³⁸。而早在事發當初，世界各國媒體就已有「蘇蒙軍導彈擊落說」、「機上搏鬥說」、「起飛前飛機已被做了手脚說」、「迫降失事說」等種種推測³⁹。至於飛行員潘景寅（1929-1971 年）「自殺殉職說」則由未登機的 256 號機組的副駕駛康庭梓（1939 年-）等提出⁴⁰。很顯然，作為部下，康庭梓等試圖要把潘景寅描寫成一位保護戰友、自我犧牲的英雄。

在學術界，多數學者支持飛機迫降失事說。至於 256 號飛機何以選擇迫降，孫一先等多數人都主張是由於「燃油不足」⁴¹。還有人依據所謂的機場人員所述「256 號飛機起飛前右機翼的端部碰到了還沒有完全離開油車頂部的把柄上，撞壞了右機翼尖上的紅色航行燈」，「飛機和油車相撞，造成右翅膀嚴重受損。……受傷處比別的地方承受更大的壓力，很可能破裂，或者造成短路，引起著火」，「不得不在野地迫降」，最終失事⁴²。然而，林彪事件後，中國共產黨通過政治、軍事、公安等各個部門對該事件及相關人員進行了全面、嚴密、詳細的調查，卻從未有人提起 256 號飛機起飛前機翼與油車相撞之事。當時中方組織的由時任中國空軍司令部軍訓部第二部部長王海（1926-2020 年，後升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上將）為首的調

³⁸ 閻明復，〈前蘇聯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現場〉，《炎黃子孫》2009 年第 10 期，頁 27-28。

³⁹ 以日本媒體為例，如「モンゴルで中国機墜落 九人乗り空軍機 先月 12 日飛行禁止？の前夜 ソ連ロケットで撃墜？」，『朝日新聞』1971 年 10 月 1 日【東京：朝刊】；「中国，民間機と発表 モンゴルでの墜落機操縦装置の故障」，『朝日新聞』1971 年 10 月 1 日【東京：夕刊】；「林彪氏，死にまつわるナゾ 撃墜か・墜落か・破壊工作か」，『朝日新聞』1972 年 7 月 31 日【東京：夕刊】。

⁴⁰ 康庭梓，前揭《真相 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⁴¹ 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頁 234；孫一先，前揭《在大漠那邊—林彪墜機真相》，頁 178。

⁴² 舒雲、高伐林，前揭〈專訪舒雲：葉群、林立果為何挾持林彪出走〉，頁 123-124；佟玉春口述、舒雲記錄〈山海關機場參謀長：三叉戟墜毀另有原因〉，《新史記》編輯部，《林彪事件新解碼》（明鏡出版社，2012 年），頁 181-192；〈山海關機場參謀長：三叉戟墜毀另有原因〉，《新史記》編輯部，《誰逼走林彪》（哈耶出版社，2011 年），頁 109-118。

查組於 1972 年 5 月 19 日提交的報告⁴³，也沒有提到這一點。上述觀點尚值得商榷。

256 號飛機墜毀後，蒙方組織了由蒙古公安部、外交部、國防部等有關人員組成的專門工作組，並最遲於 14 日起開始了調查工作。其成員如下：公安部邊防與內務軍事事務局邊防處處長 N. 桑加（N. Sanjaa）上校、外交部領事司司長 B. 高陶布（B. Gotov，1927 年 - ）、國防部副司長 G. 達木丁（G. Damdin）上校，法律專家 G. 達西策伯格（G. Dashzeveg）、肯特省檢察員 Kh. 烏爾金道爾吉（Kh. Ürjindorj）、航空司專家 J. 雲登（J. Yondon）少校、國家防務總局犯罪研究中心專家 P. 莫尤（P. Moyuu）少校、醫務處負責人、法醫 I. 桑嘉道爾吉（I. Sanjaadorj）、法醫 G. 朱乃（G. Zuunai）、外交部工作人員兼漢語譯員 Ö. 古爾斯德（Ö. Gürsed）。同時，委派肯特省社會安全科科長 O. 敖特根吉爾嘎拉（O. Otgonjargal，1928-2021 年。最終職銜為少將）中校、攝像師 B. 巴拉吉尼亞姆（B. Baljinnyam）等協助工作組工作。可以看出，該工作組涵蓋了外交、公安、邊防、航空、法律、醫療、攝影等領域的人員⁴⁴。孫一先在其專著中所使用的，9 月 16 日夜晚由蒙方提供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上飛行失事的現場調查紀要〉及〈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失事遇難人員安葬的紀要〉⁴⁵便是由該工作組所撰寫。

當蒙方意識到 256 號機墜機身亡的九人中可能有中國政府的重要人物在內後，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於 1971 年 10 月 4 日（？）通過了 268 號決議，成立了由蒙古人民軍總參謀部第一副部長 Ch. 圖門登伯勒（Ch. Tumendemberel，1926-1993 年，最終軍銜為中將）少將為首的調查小組，重新對 256 號機墜機事件進行調查。其成員除了 9 月中旬調查小組中的 N. 桑加上校、B. 高陶布司長、G. 達西策伯格、J. 雲登少校、P. 莫尤少校、I. 桑嘉道爾吉、G. 朱乃外，增補了 Ts. 耿登達爾扎（Ts. Gendendarjaa），L. 藏力（L. Tsanli）倆人。這倆人的身份不詳。但前者應與蒙古內防部所

⁴³ 王海，前揭《我的戰鬥生涯》，頁 233-234；孫一先，前揭《在大漠那邊—林彪墜機真相》，頁 175-179。

⁴⁴ Ч. Дашдаваа, мөн тэнд, тал.19-20（Ch.達西達瓦，前揭《林彪元帥之死》，頁 19-20）。

⁴⁵ 孫一先，前揭《在大漠那邊—林彪墜機真相》，頁 130-132。

屬、Yu. 澤登巴爾（Yu. Tsedenbal, 1916-1991 年）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辦公室主任 Ts. 耿登達爾扎（Ts. Gendendarjaa, 1917-2016 年）為同一人物。

此外，當 256 號飛機在蒙古墜毀後，蘇方除了派遣後貝加爾軍管區赤塔州軍區的一支特殊部隊抵達蘇布拉噶峽谷，於 1971 年 9 月 14 日用米格 8 直升機將該機的黑匣子、一個發動機及部分設備、用品、遺留物等帶走外，還專門成立了由蘇聯駐蒙古大使館及駐蒙蘇軍後貝加爾軍管區第 39 集團軍的相關人員組成的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1971 年 10 月 12 日晚在蒙古人民軍總參謀部舉行的蒙方和蘇方調查小組的聯席會議上，駐蒙蘇軍後貝加爾軍區第 39 集團軍司令 F. F. 寇里夫達（F. F. Krivda, 1923-1998 年，最終軍銜為蘇聯陸軍大將）中將介紹蘇方調查小組的調查報告時指出：在肯特省「墜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是屬於北京近郊的（中國空軍）第 34 師的軍事運輸機」；「能夠很容易地證實該機是軍用飛機。……機上人員均著軍裝，都攜帶有手槍，還有自動步槍、飛行地圖、呼叫符號等，……所有槍支幾乎都裝有子彈，其中一隻槍裝滿了一梭子子彈」；「該機飛得較低，保持平均時速 670 公里這一有利的速度飛行」；「該機配有極為現代化的設備，說迷航沒有根據。該機不可能不知道自己飛到哪裡。如果真的是迷航，該機應該發出求救信號，但沒有這麼做」；「所謂該機燃料不足是謊言。剩了多少油，還能飛多久，通過儀錶就可以判定。通過著火情況看，證明該機有足夠的燃料」；「也能排除迫降這一可能性。現在的大飛機要迫降必須開燈照亮降落地點，然而我方專家認為該機沒有打開機翼上的燈。即便假設（駕駛員）不想打開照明，（實施迫降）飛機尾部應先著地，然而並非如此，該機機首（хоньу）先著的地。事實是所有儀錶在著陸之初已經解體。而且由於沒有關閉發動機，導致飛機再次騰起，在第二次落地時被燒毀。……，沒有放下尾翼，所以不是迫降」；「飛機彈起第二次著地時，機上的人都還活著。所有屍體都在機艙左翼，說明他們企圖通過左翼艙門下飛機。他們都摘下了手錶並脫了鞋。如果（我方）人員能早一步到達現場，說不定能活捉幾名輕傷人員」；「所找到的（飛機上遺留的）圖片中（所示）封閉路

線是軍用飛機飛行航線。9月10日該機可能已經發生過什麼事情」⁴⁶。

蒙方調查小組於當年11月20日完成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墜毀原因的調查報告〉強調：256號飛機配有型號為 Star 的超短波接收機、Atom 無線電臺、型號為 Ekho 的蘇聯造氣象雷達、和型號為 6407 的無線電羅盤、及蘇聯造 Радиовысотометр малых высот РВ-УМ 無線電高度測量儀等。指出該機「能夠自動控制飛行和精確計算其燃油消耗量，可以自動診斷故障」。這些事實與「中方所聲稱的該機因失去航向而飛入蒙古墜毀」的說法相矛盾。「該機著陸前沒有放下起落架，兩翼燈和著陸燈也沒有打開」，「該機墜毀時在大範圍內引起爆炸和燃燒，燃燒持續了很長時間，證明該機仍攜帶有足夠的燃料可以繼續飛行」，「事故發生時飛機引擎仍在全速運行，並沒有損壞」等⁴⁷。

蘇方和蒙方的上述報告都沒有提到256號飛機右翼嚴重受損這一情況。

256號飛機飛入蒙古領空後，前述蒙古蘇赫巴托省、肯特省各縣的目擊者（含軍人）均稱該機沒有開燈。而在256號飛機墜毀前，目擊了該機墜毀的肯特省的牧民拉哈瑪（Lkham）等看到的是「一架冒著大火的飛機，飛得相當低」。對此，主張因燃油不足，飛機迫降失事說的孫一先認為拉哈瑪「可能把機上耀眼的著陸燈錯當成大火」⁴⁸。可是，前述蘇方和蒙方調查小組的報告均稱該機墜毀前「兩翼燈和著陸燈沒有開燈」。而中國空軍的情報部隊在9月13日已監聽到蒙軍各部隊之間的通話內容，即「有一個大型目標從空中入侵」，「大型目標空中起火」，「大型目標墜毀」等⁴⁹。所以，不排除256號飛機著陸前著火的可能性。筆者於2010年9月19日赴蘇布拉噶峽谷墜毀進行調查時（圖2、3、4），同行的蒙古國防科學研究所 G. 米亞格瑪爾桑布（G. Myamarsambu）上校認為該機是由當時駐蒙蘇軍用導彈或火箭擊落的，因為當時肯特省駐紮有蘇軍導

⁴⁶ Ч. Дашдаваа, мөн тэнд, тал.80-82 (Ch. 達西達瓦, 前揭《林彪元帥之死》，頁 80-82)。

⁴⁷ “БНХАУ-ын нисэх онгоц БНМАУ-ын нутагт сүйрсэн шалтгааныг мандлан тогтоох акт”, 1971 оны 11-р сарын 20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墜毀原因的調查報告〉, 1971年11月20日)。

⁴⁸ 孫一先, 前揭《在大漠那邊—林彪墜機真相》，頁 241-242。

⁴⁹ 《新史記》編輯部, 《林彪事件的黑匣子》(哈耶出版社, 2012年), 頁 332-333; 《新史記》編輯部, 《林彪事件新解碼》(明鏡出版社, 2012年)。

彈部隊，蘇軍雷達追蹤到了這架飛機，如果該機在蘇聯領土內降落，從當時的國際關係等角度看對蘇方不利，在蒙古境內「處理」該機是最妥當的。一般認為，若飛機遭到導彈攻擊會在空中爆炸、分解，殘片會散落在方圓數公里內。但導彈、火箭種類繁多，如果擊中飛機機翼的一部分，則飛機未必會立刻在空中爆炸、分解。歷史上有飛機遭到導彈攻擊而成功迫降之例。如冷戰時代的 1978 年 4 月 20 日，大韓航空公司的 902 航班（波音 707-321B）侵入蘇聯領空，因為無視蘇軍戰鬥機的警告等，在摩爾曼斯克（Murmansk）附近被蘇軍戰鬥機發射的空對空導彈擊中左翼。該機在蘇領尚處冰凍狀態的科皮亞維湖（Korpijärvi Lake）湖面上迫降，機上 109 名乘客和機組人員中兩名死亡，13 名受傷。而曾經參與協助調查 256 號飛機在蒙古墜毀的 O. 敖特根吉爾嘎拉（如前所述，1971 年為肯特省社會安全科科長）於 2015 年 9 月 19 日接受筆者採訪（圖 5）時稱：「只有等到 256 號飛機黑匣子得到破解後，才能搞清該機墜毀的真正原因。256 號飛機的飛行員非常優秀，和周邊地區相比，蘇布拉噶峽谷適合飛機降落，遺憾的是也許是他操作時出現了什麼失誤而導致飛機墜毀。飛機上有足夠的燃料，足以飛到烏蘭巴托。至於該機為什麼不得不迫降，原因不明。我個人認為，該機遭到導彈攻擊的可能性不大。也許該機出了什麼機械性的故障而不得不迫降」。

順便提及，蘇方和蒙方的這兩份報告都沒有提到 9 名遇難者的年齡。1991 年，曾為該調查組成員的法醫朱乃在《公開摘要》第 25 期上發表的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說：「我們對 9 具屍體的年齡和外觀、身體狀況、肌肉的收縮、鬆弛狀況，燒剩的毛髮等進行了分析，得出了這 9 人當中無人超過 50 歲的結論。引人注目的是，9 人中 8 個人都是黑頭髮，矮個子。從頭骨、身體形態、肢體比例上看，可以毫無疑問地斷定是亞洲人。另一人四肢較長，胸部被燒焦變黃。（頭部髮毛幾乎全部燒掉）。其頭骨和顴骨與歐洲人相似，鼻樑骨很高。我總懷疑這個『歐洲人』不會就是那位攜帶自動步槍【256 號飛機遺留物中有兩挺小型自動步槍——引者】的吧」⁵⁰。1972 年 7 月 31 日日本《朝日新聞》刊登的一篇報導援引

⁵⁰ Г. Зуунай, мөн тэнд (G. 朱乃，〈誰坐在墜毀在肯特的飛機上〉，《公開摘要》，1991 年第 25 期）。

蒙古官員的話說，「蒙方起初稱遇難 9 人年齡均在 35 歲以下，後訂正為 45 歲以下」⁵¹。而同樣是參加過 1971 年 9 月和 10 月調查的桑嘉道爾吉卻提出了不同的觀點：「9 具屍體中，有的燒傷程度為 3—4 級。有的肢體已折斷。1 女、8 男。從沒有燒盡的衣服散片、武器和其它物品來看，他們大都是軍人。從牙齒的變形程度和鑲牙（非金屬材料）狀況來看，我認為 9 人中有 60 歲左右的人」⁵²。

蒙方調查小組對 9 具屍體做了編號。後來，人們斷定第 5 號屍體為林彪。孫一先在其書中，這樣描述 5 號屍體。

第 5 號屍體，個子瘦小，雖然每具屍體燒後似乎都有些萎縮，而且由於皮膚腫脹顯得年輕，但這具屍體看來縮得更厲害一些，像個大孩子。全身衣服燒光，但皮膚燒灼不重。上身平仰，下身略向右側。頭部上昂，禿頂，頭皮有些綻裂，露出幾道灰白色頭骨。有額紋，眉燒光，眼睛燒凹深陷。顴骨較高，下巴較尖，臉部稜角明顯。鼻子較大，鼻尖燒焦，露出兩個朝天的黑洞。嘴張開，右門牙及犬齒摔掉，舌頭燒黑。左眼內角鼻樑間有一傷痕，血跡沿額部流至右頭頂。右臂平伸，手心向上，左肩內彎，手心扣向腰眼。右腿直伸，腳心向下，左腿內屈，踝骨搭在右膝上，脛骨炸斷，肌肉外翻，上脛骨刺露。兩腳底及手心都燒起燎泡。這個屍體的面部輪廓看起來眼熟，但想不起來在哪裡見過⁵³。

而蒙方調查組對第 5 號屍體的檢驗報告則為：

第 5 具屍體：身體發育正常，身高約 180 公分，男性。兩臂沿著肘部彎曲，面向上躺著。右腳膝蓋處略向上彎曲，左腳膝蓋處彎曲，腳跟著地。胸部和右膊骨上留有燒焦的衣服碎片。胯襠部位有燃燒了一半的衣服碎片。左脛骨中部骨折，骨

⁵¹ 前揭「林彪氏，死にまつわるナゾ 擊墜か・墜落か・破壊工作か」，『朝日新聞』1972 年 7 月 31 日【東京：夕刊】。

⁵² И. Санжаадорж, мөн тэнд (I. 桑嘉道爾吉，前揭〈中國的國防部長是否乘坐在失事的飛機上〉)。

⁵³ 孫一先，前揭《在大漠那邊—林彪墜機真相》，頁 119-120。

頭外露。後腦勺左上部有 5X6 公分的皮膚已脫落。全身約 70% 的面積被燒傷，燒傷程度為 1-2 級⁵⁴。

和蒙方調查小組的檢驗報告相比，孫一先的記述極為詳細。但筆者並不認為上述孫一先的記錄是 1971 年 9 月寫的。和孫一先、沈慶沂、王中遠 1988 年所寫的文章相比⁵⁵，《在大漠那邊—林彪墜機真相》寫得較為詳細。加了諸如「屍體看來縮得更厲害一些，像個大孩子」，「頭部上昂」，「禿頂……有額紋」，「鼻子較大，鼻尖燒焦，露出兩個朝天的黑洞」，「這個屍體的面部輪廓看起來眼熟，但想不起來在哪裡見過」等描述，對其他幾位人物的描寫也不乏嘲諷之意。如果該報告是 1971 年 9 月所寫，就不會有這些富有感情性、傾向性的描述。顯然，孫一先故意把 5 號屍體寫得更貼近於林彪。其實，《在大漠那邊—林彪墜機真相》對 9 具屍體的描述都是有意跟 9 人的特徵相結合而寫的，都是後來寫的。9 月 15 日，中國大使館的人員到達蘇布拉噶峽谷 256 號飛機墜毀之地時已是黃昏（圖 1），待的時間很短；16 日上午 9 點 30 分，中國大使館人員到達失事現場後，忙於查看現場的全景，選擇墓地等。11 時起，蒙方軍人便倉促將 9 具屍體下葬。中國大使館的人員根本來不及詳細記錄 9 具屍體的特徵。而且，孫一先的記述中沒有提到兩個關鍵問題，即身高和燒傷程度。蒙方調查報告中說第 5 號屍體身高約 180 公分。而林彪身高為 169 公分，1971 年的實際身高低於 169 公分。二者差距太大。再有，林彪的一位親屬曾指出，托米林所出示的林彪顱骨的照片中，牙齒齊全，而墜機現場所拍攝的照片中，5 號屍體（「林彪」）缺失門牙。對此，孫一先也無法解釋，只是說「『九一三』事件的確是一部寫不完的书」⁵⁶。

林彪座機、即 256 號飛機墜毀事件中的一些事情看似已經明瞭，借用某些學者或媒體的說法是「真相大白」。但事實並非如此，許多問題依舊疑點重重，仍需進一步考證、推敲。

⁵⁴ Ч. Дашдаваа, мөн тэнд, тал.37 (Ch.達西達瓦，前揭《林彪元帥之死》，頁 37)。

⁵⁵ 孫一先、沈慶沂、王中遠，〈視察林彪叛逃飛機墜毀現場紀實〉，《黨的文獻》1988 年第 1 期，頁 74-77。

⁵⁶ 孫一先，前揭《在大漠那邊—林彪墜機真相》，頁 247。

蒙古對失事中國飛機之報導

256 號飛機在蒙古墜毀之後，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於 1971 年 9 月 29 日通過了〈關於報導中國飛機失事墜毀事宜〉的決議，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架噴氣式飛機於今年 9 月 13 日夜侵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國領空，在深入我國內地領空飛行時墜落，有必要對此事予以報導」，並確定了報導的具體內容⁵⁷。

當天下午 17 時，蒙古通訊社播發了中國飛機侵犯蒙古領空並墜毀的消息。次日，即 9 月 30 日蒙古《真理報》刊載了該消息。譯文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架噴氣式飛機於今年 9 月 13 日凌晨 1 時 55 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國領空，在深入我國內地領空飛行時，於 2 時 25 分在肯特省的東經 111°15'，北緯 47°42' 處墜毀，原因不明。

在中國飛機墜毀地點找到的燒得殘缺不全的 9 人的屍體、槍枝、文件和物品，證明這架飛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空軍飛機。

已經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使館的代表們去現場觀看、確認了該失事飛機。

就中國飛機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國領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國方面表示了抗議，並要求做出正式解釋⁵⁸。

孫一先在其專著中介紹蒙古《真理報》該報導的譯文時，說是在肯特省「伊德爾莫格縣」⁵⁹。其實，前述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於 9 月 29 日通過的〈關於報導中國飛機失事墜毀事宜〉的決議及 9 月 30 日蒙古《真理報》的原文並無此表述。9 月 30 日當天，塔斯社以援引蒙古通訊社消息的形式向世界播報了此新聞。之後，路透社、合眾國際社、共

⁵⁷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Хувьсгалт Намын Төв Хорооны улс төрийн товчооны тогтоол. No.253. Хятадын нисэх онгоц сүйрсэнтэй холбогдуулан мэдээ нийтлэх тухай”, 1971 оны 9 сарын 29, Олон нийтийн байгууллагын Архив, 4-32-11, тал.369-370 (〈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決議第 253 號：關於報導中國飛機失事墜毀事宜〉，1971 年 9 月 29 日，【蒙古】政黨・公共團體檔案館，4-32-11，頁 369-370)。

⁵⁸ “Хятадын нисэх онгоц сүйрсэн тухай”, *Үнэн*, 1971.09.30 (〈中國飛機失事一事〉，《真理報》1971 年 9 月 30 日)。

⁵⁹ 孫一先，前揭《在大漠那邊—林彪墜機真相》，頁 173。

同社等世界各大通訊社都迅速報導了中國飛機在蒙古墜毀的消息。

256 號飛機的遺留物

Ch. 達西達瓦在其專著中提到，蒙方調查人員在 256 號飛機墜毀現場搜集到了手槍、自動步槍、子彈、彈夾、槍套、匕首、小型收音機、日本小型答錄機、磁帶、紙幣、照片、筆記本、《低空無線電高度表技術說明書和使用細則》、《航空簡語》、《報務制度》、《低空飛行技術說明書》、機組人員飛行日誌、新疆地區航空地圖、華北地區航空地圖、泰山機場圖、飛行時刻表等⁶⁰。前述蘇蒙方調查報告也都對此有所記述，但沒有對《航空簡語》等做詳細的說明。

筆者有幸閱讀到了上述檔案中的一部分。茲將 256 號飛機所留《航空簡語》、手寫北京—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航線呼叫符號及照片等予以說明。

《報務制度(秘密)》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於 1970 年 3 月印製。《航空簡語》則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於 1964 年 6 月印製。

256 號飛機所留《航空簡語》雖然為印刷品，但也有幾處為手寫。其內容如下。（）為原文所有，筆者所注各處以【】標示。

密 封 破 壞 進 行 緊
1. 1378 1409 4275 1095 6651 5887 4868

急 下降
1838 DES PHONE

第 三 發 故 障 停 車
2. 4574 0005 4099 2399 7140 (0255 6508、

反 順 漿 著 火 可 保
0646 7311 2862、4192 3499) 0668 0202

【「2862」第一個「2」原為「6」或「8」，用手寫改成了「2」】

持 平 飛 降落
2170 1627 7378, QGN ?

發 動 機 著 火 迫降
3. 4099 0520 2894 4192 3499, QUG?

⁶⁰ Ч. Дашдаваа, мөн тэнд, тал.23-34 (Ch. 達西達瓦，前揭《林彪元帥之死》，23-34 頁)。

迷航 速 開 雷 達
4. QVG 6643 7030 7191 6671 TELL RM.

返航
5. CB ATR AWY NO QAF WS(QRF).

我 遭 遇 敵 機 襲 擊
6. 2053 6685 6657 2420 2894 6002 2345.

我 發 現 不 明 飛 機
2053 4099 3807 0008 2494 7378 2894

我 被 敵 機 包 圍
2053 5926 2420 2894 0545 0953.

嚴重結冰 下降
7. QFT SEV(MOD) OSC(DES).

8. PSE xx RP TO AD.

降落
9. xx WX BD QGN?

機上發現爆炸物（破壞）
10. 2894 0006 4099 3807 3615 3498 3630 4075 0935

機上有人企圖綁架（破壞）
11. 2894 0006 3589 0086 0120 0956 4934 2665 4075

以上，至「9. 降落」這一行為止為《航空簡語》原有印刷文字。自「10. 機上發現爆炸物（破壞）」以下為手寫。最後一行字，尤其是最後幾個數字不太清晰。「第三發」指第三發動機。而 256 號三叉戟專機正好有三台發動機。上述記述雖是《航空簡語》原有印刷文字及後來手寫而成。但很容易讓人們與 256 號飛機 1971 年 9 月 12 日夜、13 日凌晨的遭遇聯想到一起。達西達瓦認為 256 號飛機「從肯特省省會城市附近上空飛過，經過北邊的貝爾赫礦區後，沒過多長時間又突然折轉回來，在折回之後起火墜毀」。之所以突然折返，是因為蘇方不願意讓這架飛機進入蘇聯領空，「蘇聯的小型軍用飛機圍過來，迫使它降落」，「如果當時飛機墜落在蘇聯境內，那麼中蘇之間肯定會產生（巨）大的矛盾」。不過，雖然是蘇軍迫使該機降落，但蒙古的調查報告顯示，該機「外表上找不出受到攻擊的痕跡」。扎格沃茲丁稱 256 號飛機飛至肯特省蒙蘇邊境時受到蘇聯

空軍警告而折轉，但「從地面的狀況來看，沒有任何進攻的痕跡，只有不成功的降落」，即否定了該機受到導彈或其它武器攻擊而墜毀的觀點；彼得·漢娜姆也贊成 256 號飛機在蒙蘇邊境受到蘇聯防空部隊的警告而折返，認為「這架飛機很可能不是被擊落的」，就飛機墜毀前著火一事而言，「不能排除飛機出現機械故障的可能性」⁶¹，最終導致失事。

在 256 號飛機的遺留物品中還有幾張手寫的北京—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呼叫符號及廣播頻率等。茲照抄如下。（）為原文所有，筆者所注各處以【】標示。

【第一張紙】

烏蘭巴托——依爾庫次克【原文如此。】

位置報告程式：或○○○位置報告以前呼叫 кяхта【這一行應該是後寫的，比較潦草。кахта 即恰克圖】

哈拉果爾江 發烏蘭巴托，要 ШДР（呼：叫且要）迅速發出後即呼叫 кяхта

2．飛近國境線報告，盲目拍發 кяхта（蘇蒙□境線）

【「□」應是「國」的簡寫】

程式：ЖЗ 呼號³ ge 自呼² 臨近國境線密碼及口令三次，例如：

ЖЗ РСКВЗ ge БСП ○○○○【字跡殘缺，周邊已被燒毀】

【第二張紙】

張家口

喔倫里哈 998 ХР1/385Блы6

二連 937

沙音山達【賽音山達】 670 ДН/380 УГЙ4

4605кц 塔臺 4430кц 叨林

烏蘭巴托 933 УБ/350 РБЖЩ 4605 кц 塔臺

4430кц 定向有時改頻至 3585，天氣通播

哈拉果爾江 823

字體不明

Кяхта черта

Гусиное 865

Гулоусиное 584

⁶¹ 〈鳳凰大視野：折戟沉沙鐵未銷—9·13 事件再追蹤（1）〉，香港：鳳凰衛視 2012 年 9 月 10 日播放；〈鳳凰大視野：折戟沉沙鐵未銷—9·13 事件再追蹤（5）〉，香港：鳳凰衛視 2013 年 9 月 20 日播放。

伊爾庫茨克 668 BB/514
 Б/250 УНЗ 收 3995
 РБРФ 發 3410
 БАНАН 5405 6482 通播天氣 27.57
 БАНАН 4460 →通話
 БАНАН 發 4055
 (呼出【字跡不清】) 4305

【第三張紙】

廣播頻率

時間：

(沙音山達：烏蘭巴托起飛時用)

起飛時間：шех? (請求滑引)

шей 請求進跑道

шел 請求起飛

ШРФШТР 請問起飛時間

這顯然是北京—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航線的呼叫符號等。Кяхта 即恰克圖，今蒙俄（當時為蘇聯，以下同）邊境小鎮恰克圖，Гусиное 即俄羅斯境內布里亞特共和國領內的古西諾耶湖，距離烏蘭烏德約 120 公里。Гулоусиное 應該是 Голоустное，即戈洛烏斯特諾耶。位於貝加爾湖西岸。現在有大戈洛烏斯特諾耶、小戈洛烏斯特諾耶之分，為伊爾庫茨克州的兩個村莊。大戈洛烏斯特諾耶距離伊爾庫茨克東南部 120 公里。小戈洛烏斯特諾耶位於大戈洛烏斯特諾耶的西北方。然而，256 號飛機並沒有沿著這一航線飛行。如前所述，256 號飛機從蘇赫巴托省阿斯噶特縣 414 號界樁越境飛入蒙古，先後飛經納仁縣、翁貢縣、紅格爾縣、哈勒贊縣、孟赫汗縣、肯特省伊德爾莫格縣等地，最後在蘇布拉噶峽谷墜毀。從 256 號飛機的遺留物品來看，該機明顯是以伊爾庫茨克為目的地飛行的。9 月 13 日凌晨，林立果的親信、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1935-1971 年）等三人、試圖挾兩名飛行員乘 2685 號直升機要飛的也是蒙古⁶²。所謂的林立果所主張的「上策刺殺毛澤東，中策南去廣州，下策北去蘇聯」

⁶² 康庭梓〈「九一三」事件中 3685 號直升機被劫持經過〉，《湖北文史》2004 年第 1 期，頁 39-45；呂學文〈我所經歷的林彪出逃〉，《文史精華》2005 年第 4 期，頁 42-46。

或「南下廣州，另立中央」之說⁶³極為有名。然而從 256 號專機留下的遺物中找不到任何該機準備或試圖飛往廣州的證據。

在 256 號飛機的遺留物品中有幾張照片，其中一張為 8 男、1 女的 9 人照，均著軍裝。或許蒙蘇方調查小組一時認為這 9 人即墜機遇難的 9 人。然而，這 9 人都比較年輕，尤其是那位女性，極為年輕。其實，照片上 9 人當中並無林彪、葉群和林立果。這應該是機組人員的照片。1971 年 9 月 8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 34 師黨委所批准的 256 號飛機的機組人員為下列 9 位，即機長潘景寅（空軍第 34 師副政委）、第一副機長陳聯柄（1933-，空軍第 34 師副參謀長）、第二副機長康庭梓（第 34 師飛行中隊長）、領航員李昌平（空軍第 34 師主任）、機械師邵起良（空軍第 34 師特設分隊副中隊長）、李平（空軍第 34 師機械師機務副中隊長）、張廷奎（空軍第 34 師機械師）、通訊員陳松鶴（空軍第 34 師通訊副主任）、乘務員張秀玲⁶⁴。顯然機組乘員身份較高。然而，9 月 12 日夜，256 號飛機機組成員中只有機長潘景寅、機械師邵起良和李平、領航員李昌平 4 人登機，加上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楊振剛這 5 人，正好也是 9 人。（又是一個巧合！）。所以不明 256 號機內幕的人乍一看看到這張照片時，自然會誤以為墜機遇難的 9 人就是照片上的 9 人。其實，機組乘員中的陳聯柄、康庭梓、張廷奎、陳松鶴、張秀玲並沒有登機。

再有，達西達瓦在其專著中提到 256 號飛機遺留物品中有日本小型答錄機、磁帶。其實，磁帶上印的是 SHIBADEN MAGNETIC TAPE FOR V.T.R. 和 PRECISION VIDEO TAPE MADE IN TOKYO, JAPAN BY SHIBA ELECTRIC CO., LTD. 即應該是錄影帶。

林彪遺骸之去向

根據蒙方與中方協商的結果，1971 年 9 月 16 日上午 11 時至 12 時，在以許文益為首的中國大使館相關人員、蒙古公安部邊防與內務軍事事務

⁶³ 翁衍慶，《林彪的忠與逆一九一三事件重探》（新銳文創，2012 年），頁 322-323；張光渝〈「九一三」林彪要飛往哪裡？〉，《炎黃春秋》2015 年第 2 期，頁 86-89、85 頁。

⁶⁴ ボルジギン・フスレ，前掲「モンゴルから見た「林彪事件」—基礎的研究」，頁 14。

局邊防處處長 N. 桑加上校、外交部領事司司長 B. 高陶布等的看護下，蒙方軍人將遇難的 256 號飛機的 9 具屍體下葬。10 月中旬，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調查部副部長 A. V. 扎格沃茲丁上校、蘇聯國防部中央法醫研究所副所長 V. V. 托米林上校等 4 名蘇方工作人員和兩名蒙古國家安全局委派的工作人員組成的調查組前往蘇布拉噶峽谷（圖 6），在蒙方軍人等的協助下，挖出林彪和葉群屍體的棺木，經熬煮倆人的頭顱後，將其顱骨帶回莫斯科⁶⁵。11 月 19 日，扎格沃茲丁和托米林等再次來到蘇布拉噶峽谷，將林彪的肺部等帶回莫斯科⁶⁶。

日中戰爭時，林彪曾率領八路軍 115 師參與對日遊擊戰。1938 年 11 月，林彪頭部中傷，12 月經新疆前往蘇聯治療，並於 1942 年 2 月 8 日返回延安⁶⁷。不論是在延安，還是在莫斯科等地，林彪都給蘇聯及共產國際的相關人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時任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 1905-1953 年，孫平）及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 1900-1974 年，李德）等對林彪不乏贊詞⁶⁸。1950 年 10 月，適值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征朝鮮戰爭之際，林彪再次赴蘇聯養病⁶⁹，約 1 年後返回中國。因此，在俄羅斯（當時的蘇聯）保存有林彪的病歷等。蘇方醫療專家將從蘇布拉噶峽谷帶回的林彪和葉群的顱骨等與林彪的病歷進行核對後，確認 256 號飛機遇難的人中確有林彪和葉群。而 256 號飛機遇難者的家屬、林彪幾位部下的子女等也曾

⁶⁵ Ч. Дашдаваа, мөн тэнд, тал.83-84 (Ch. 達西達瓦, 前揭《林彪元帥之死》，頁 83-84)。竇應泰，《外國記者探秘林彪事件真相》（靈活文化，2016 年），頁 110-120。

⁶⁶ В. Скосырев, Указ. Соч (V. 斯科斯列夫, 前揭〈克格勃的將軍將林彪元帥的頭顱帶回了莫斯科〉)；Ч. Дашдаваа, мөн тэнд, тал.84-85 (Ch. 達西達瓦, 前揭《林彪元帥之死》，頁 84-85)。

⁶⁷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V, 1937-май 1943, Москва, 2007, сс.177-178, 579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資料集 第 5 卷 1937-1943 年 5 月》，莫斯科，2007 年，頁 177-178、579)。

⁶⁸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呂文鏡等譯，《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2004 年），頁 136、489-490。奧托·布勞恩著，李達六等譯，《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 年），頁 271。

⁶⁹ 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 年）》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221-222。

⁷¹ 「林彪事件をたどって 10 遺体はどこへいったのか」, 『朝日新聞』2014 年 10 月 30 日【東京・夕刊】。

林彪等 9 人就這樣被焚燒了。參加了這一秘密工作的 G. 班扎拉嘎齊 (G. Banzlagch, 1938 年-) 2022 年 5 月 3 日接受筆者採訪說：「9 人的骨灰現在也許仍收藏在蒙古國家情報總局」，「1971 年冬，蘇聯調查小組將 9 人的顱骨都帶回了莫斯科」。然而扎格沃茲丁、托米林等在提起 1971 年冬的這兩次調查時只說第一次赴蘇布拉噶峽谷時將林彪和葉群的顱骨帶回莫斯科，第二次將林彪的肺部等帶走。沒有明確說將 9 人的顱骨都帶回了莫斯科。這一出入有待進一步研究。

「投遞」給蒙古駐中國大使館的反毛林傳單

林彪事件發生之後，有人向蒙古駐中國大使館院子裡扔了一封信。這封信是以中國駐當時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前大使館參贊 Liu Pu 的名義和地址投遞的，信封上的地址為：

Mr. Liu Pu
Berlin-karlshorst,
Rheinsteinstrasse 81
Germany, East

但信封上所貼的是香港的郵票。所以並非真的投自東柏林。該信於 1971 年 9 月 23 日報告給了蒙古外交部長。裡面裝的是一份署名為「中國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革命同志會」於「1971 年 7 月 1 日」所發的、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 50 周年、批判毛澤東和林彪的傳單。茲全錄如下：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бичсэн протокол”, 1971 оны 12-р сарын 9, ТЕГ-ын Тусгай Архив (〈關於將 1971 年 9 月 13 日夜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上墜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上乘坐的 9 人屍體予以焚燒的照會〉, 1971 年 12 月 9 日, 蒙古情報總局特別檔案館)。

⁷³ “Мао Цзэ Дуны эсрэг бүлэг, байгууллагуудын гаргаж байсан ухуулга”, 1969-1971 он

這份傳單矛頭直指毛澤東，同時也批判了林彪。並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以及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現有政權稱為「毛家王朝」、「軍人主宰一切的法西斯反動政權」。但卻沒有提到、也沒有批判周恩來。這可以看作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黨內鬥爭的一種體現。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毛澤東指定林彪為自己的接班人，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被寫進了總綱。這份傳單還批判了各個省市自治區成立的以軍人為主的黨委會及各級革命委員會。並痛擊正在籌備非法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稱之為「只是毛家王朝的軍事法西斯體制」。當然，考慮到信封上貼著香港地區的郵票，不排除這是當時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情報組織所搞的政治宣傳活動的可能性。但這種宣傳單何以有必要「投遞」給蒙古大使館？而且趕在林彪事件發生之際。投遞者選擇這樣一個特殊時期特意將此郵件「投遞」給蒙古大使館，說明其瞭解林彪等墜機與蒙古有關。從當時中國內部的郵局檢查制度來看，這一信件如果是經香港投遞至中國大陸的，也不可能。因為中國的檢查機構會在郵件入境之後檢查該郵件，絕不會允許這樣一份郵件在中國國內投遞。如果真是中國共產黨黨內鬥爭的一個產物，鑒於當時中國的政治、社會環境，從信封上能貼香港地區的郵票，（當時在中國大陸一般人是無法搞到香港地區的郵票的，而且更不能公開流通），能夠印刷傳單（擁有印刷設備）、「投遞」給蒙古大使館（實際上從外面扔到蒙古大使館院內的）這幾條因素來看，這一「投遞」活動的幕後人地位非同一般。

結語

以上，筆者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董必武簽發的任命書（國字第 256 號）、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於 1971 年 9 月 29 日通過的決議〈關於報導中國飛機失事墜毀事宜〉、256 號飛機所遺留的《航空簡語》、手寫北京—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航線呼叫符號、9 人照片、〈關於將 1971 年 9 月 13 日夜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上墜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上乘坐的 9 人屍體予以焚燒的照會〉、〈打倒毛家黨重建中國共產

黨〉等蒙古外交部中央檔案館、政黨・公共團體檔案館、情報總局特別檔案館等檔案館的資料，對林彪事件進行了再探討。其中有些檔案資料為筆者所首次使用。通過這一考察，本文重新梳理了 256 號三叉戟林彪專機失事前的一些狀況，指出該機飛行的目的地為伊爾庫茨克，遺留物品中沒有任何能夠證明該機準備或試圖飛往廣州的證據，更指出林彪等 9 名 256 號飛機遇難者的遺骸的去向—9 人屍體已於 1971 年 12 月 7、8 日在烏蘭巴托郊外額莫樂圖山東麓火葬，當時骨灰收藏在蒙古內務部國家安全總局。



圖 1. 256 號專機墜落現場：右二為 O. 敖特根吉爾嘎拉、右四為許文益中國駐蒙古大使。1971 年 9 月 15 日。（O. 敖特根吉爾嘎拉提供）。



圖 2. 256 號專機墜落現場：蒙古國肯特省蘇布拉噶峽谷。呼斯勒攝於 2010 年 9 月 19 日。



圖 3. 256 號專機墜落現場：飛機殘片。呼斯勒攝於 2010 年 9 月 19 日。



圖 4. 256 號專機墜落現場：左一為筆者、中為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田中克彥、左三為 G. 米亞格瑪爾桑布上校。2010 年 9 月 19 日。



圖 5. O. 敖特根吉爾嘎拉（左）與筆者。2015 年 9 月 19 日。蒙古國防科學研究所 L. 巴雅爾（L. Bayar）中校攝



圖 6. 由 A. V. 扎格沃茲丁（右二）、V. V. 托米林（右三）等組成的蘇方調查小組到達蒙古。1971 年冬。（O. 敖特根吉爾嘎拉提供）。

參考文獻

蒙文

“БНХАУ-аас БНМАУ-д сууж байсан Элчин сайд Сюй-Вень-Й-гийн хэрэг (1971-1974)”.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Гадаад харилцааны төв архив, 5-2-447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使許文益事由 1971-1974 年〉, 蒙古外交部中央檔案館, 5-2-447) .

“БНХАУ-ын нисэх онгоц БНМАУ-ын нутагт сүйрсэн шалтгааныг мандлан тогтоох акт”. 1971 оны 11-р сарын 20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墜毀原因的調查報告〉, 1971 年 11 月 20 日) .

“БНМАУ-ын нутаг дээр 1971 оны 9-р сарын 13-ны шөнө сүйрсэн БНХАУ-ын онгоцонд сууж яваад амь үрэгдсэн 9 хүний шарилыг шатааж чандар болгосон талаар бичсэн протокол”. 1971 оны 12-р сарын 9, ТЕГ-ын Тусгай Архив (〈關於將 1971 年 9 月 13 日夜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上墜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上乘坐的 9 人屍體予以焚燒的照會〉, 1971 年 12 月 9 日, 蒙古情報總局特別檔案館) .

Ганхүлэг, Б. *Хилийн 0184-р ангийн 80 жилийн ойд зориулав Он жилүүдийн түүхнээ дурсагдах “Онгон” -ны манлай анги: Түүхэн баримт, үйл явдал, дурсамж, тэмдэглэл*.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6 он (В. 鋼胡勒格, 《紀念 0184 邊防部隊成立 80 周年: 值得永遠紀念的「先鋒隊」—歷史資料、事件、回憶、記錄》, 烏蘭巴托, 2016 年) .

Дашдаваа, Ч. *Маршал Линь Бяогийн үхэл*.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7 он (Ch. 達西達瓦, 《林彪元帥之死》, 烏蘭巴托, 2007 年) .

Ёндон, Д. “Эхний зарим алхам”. *Алтан аргамж: Монгол элч нарын дурсамж*.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96 он (D. 雲登, 〈最初的幾步〉, 《黃金之路—蒙古大使回憶錄》, 烏蘭巴托, 1996 年) .

Зуунай, Г. “Хэнтийд сүйрсэн онгоцонд хэн байсан бэ?”. *Ил товчоо*, 1991 он № 25 (G. 朱乃, 〈誰坐在墜毀在肯特的飛機上〉, 《公開摘

要》，1991 年第 25 期）。

“Мао Цзэ Дуны эсрэг бүлэг, байгууллагуудын гаргаж байсан ухуулга”. 1969-1971 он (《反對毛澤東的團體和組織的宣傳活動》，1969-1971 年)。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Хувьсгалт Намын Төв Хорооны улс төрийн товчооны тогтоол. No.253. Хятадын нисэх онгоц сүйрсэнтэй холбогдуулан мэдээ нийтлэх тухай”. 1971 оны 9 сарын 29, Олон нийтийн байгууллагын Архив, 4-32-11 (〈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決議第 253 號：關於報導中國飛機失事墜毀事宜〉，1971 年 9 月 29 日，[蒙古]政黨・公共團體檔案館，4-32-11)。

Санжаадорж, И. “Осолдсон онгоцонд Хятадын Батлан хамгаалах яамны сайд яасан уу?”. *Ил товчоо*, 1993 он № 23 (I. 桑嘉道爾吉，〈中國的國防部長是否乘坐在失事的飛機上？〉，《公開摘要》，1993 年第 23 期)。

“Хятадын нисэх онгоц сүйрсэн тухай”. *Үнэн*, 1971.09.30 (〈中國飛機失事一事〉，《真理報》1971 年 9 月 30 日)。

“Хятадын Батлан хамгаалах яамны сайдыг хөнөөсөн хуйвалдааны нууцаас”. *Маш нууц*, 1991 он № 25 (〈迫害中國國防部長的陰謀〉，《機密》2004 年第 25 期)。

俄語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V, 1937-май 1943*, Москва, 2007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資料集 第 5 卷 1937-1943 年 5 月》，莫斯科，2007 年)。

Скосырев, В. “Голову маршала Линь Бяо генерал КГБ привез в Москву”. *Известия*, 17.02.1994 (V. 斯科斯列夫，〈克格勃的將軍將林彪元帥的頭顱帶回了莫斯科〉，《消息報》1994 年 2 月 17 日)。

英文

Hannam, Peter and Susan V. Lawrence. “Solving a Chinese Puzzle Lin Biao’s

Final Days and Death, After Two Decades of Intrigue”. *US. News & Report*. Vol. 116, Issue 4, January 23, 1994.

Yao Ming-Le. *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 Biao: How Mao's Successor Plotted and Failed - An Inside Account of the Most Bizarre and Mysterious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3.

中文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呂文鏡等譯，《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2004年。

奧托·布勞恩著，李達六等譯，《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

丁凱文，〈「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評〉，《當代中國研究》2007年第2期。

〈山海關機場參謀長：三叉戟墜毀另有原因〉，《新史記》編輯部，《誰逼走林彪》，哈耶出版社，2011年。

王年一，〈林彪一最經得住研究的人〉，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第二版]，明鏡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為2007年]。

王年一，何蜀，陳昭，〈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第2期。

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田繼軍，《中國共產黨黨史紀實—歷史的豐碑》第2卷，黨史研究出版社，2010年。

佟玉春口述、舒雲記錄〈山海關機場參謀長：三叉戟墜毀另有原因〉，《新史記》編輯部，《林彪事件新解碼》，明鏡出版社，2012年。

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年）》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

呂學文，〈我所經歷的林彪出逃〉，《文史精華》2005年第4期。

吳法憲，〈林彪機毀人亡，周恩來鬆了一口氣：回憶「九一三」事件〉，《新史紀》2011年總第3期。

林星雨，《林彪傳》，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

- 孫一先，《在大漠那邊—林彪墜機真相》，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年。
- 孫一先、沈慶沂、王中遠，〈視察林彪叛逃飛機墜毀現場紀實〉，《黨的文獻》1988 年第 1 期。
-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余金堯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2006 年重印]。
- 姚明理著，莫昭平、傅依萍譯，《林彪的陰謀與死亡》，時報文化，1983 年。
- 姚明樂著，林牧譯，《林彪之死—流產政變幕後秘辛：重要的歷史轉折時刻》，遠東評論出版社，1983 年。
- 閻明復，〈前蘇聯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現場〉，《炎黃子孫》2009 年第 10 期。
- 翁衍慶，《林彪的忠與逆—九一三事件重探》，新銳文創，2012 年。
- 康庭梓，《真相 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 年。
- 康庭梓，〈「九一三」事件中 3685 號直升機被劫持經過〉，《湖北文史》2004 年第 1 期。
- 欲鳴，《歷史重新評說—為林彪元帥鳴冤》，靈活文化，2011 年。
- 張光淪，〈「九一三」林彪要飛往哪裡？〉，《炎黃春秋》2015 年第 2 期。
- 張寧，《塵劫》，明報出版社，1997 年。
- 陳曉寧，〈質疑林彪出走事件〉，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事件》[上]，明鏡出版社，2004 年。
- 葉永烈，《林彪與毛澤東》，遠方出版社，2003 年。
- 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明鏡出版社，2006 年。
- 舒雲，〈林彪座機墜毀前後的空軍指揮所〉，《黨史博覽》2004 年第 12 期。
- 舒雲，〈蒙古學者披露林彪飛機墜毀細節〉，《決策與資訊》2011 年第 12 期。
- 舒雲，高伐林，〈專訪舒雲：葉群、林立果為何挾持林彪出走〉，《新史記》編輯部，《林立果為何魚死網破》，哈耶出版社，2012 年。

《新史記》編輯部，《林彪事件的黑匣子》，哈耶出版社，2012 年。

《新史記》編輯部，《林彪事件新解碼》，明鏡出版社，2012 年。

〈鳳凰大視野：折戟沉沙鐵未銷—9·13 事件再追蹤（1）〉，香港：鳳凰衛視 2012 年 9 月 10 日播放。

〈鳳凰大視野：折戟沉沙鐵未銷—9·13 事件再追蹤（5）〉，香港：鳳凰衛視 2013 年 9 月 20 日播放。

余汝信，〈蒙古官方調查報告中的「九一三事件」〉，《華夏文摘》增刊第 1028 期，2016 年，www.cnd.org/cr/ZK16/cr860.gb.html。

寶應泰，《外國記者探秘林彪事件真相》，靈活文化，2016 年。

日文

「処理担当の元モンゴル高官 「林彪墜死」詳細を証言」，『朝日新聞』1998 年 2 月 15 日【東京：朝刊】。

「中国，民間機と発表 モンゴルでの墜落機操縦装置の故障」，『朝日新聞』1971 年 10 月 1 日【東京：夕刊】。

古谷浩一，『林彪事件と習近平—中国の権力闘争，その深層』，筑摩書房，2019 年。

ベンジャミン・ヤン著，加藤千洋，加藤優子訳，『鄧小平 政治伝記』，朝日新聞社，1999 年。

ボルジギン・フスレ，「モンゴルからみた「林彪事件」—基礎的研究」，『学苑』第 960 号，2020 年。

ボルジギン・フスレ，「「林彪事件」補遺」，『モンゴルと東北アジア研究』Vol.9，2024 年 3 月。

「モンゴル元外務次官が明かした林彪事件 30 年目の真実」，『サンデー毎日』第 79 巻第 40 号，2000 年。

「モンゴルで中国機墜落 九人乗り空軍機 先月 12 日飛行禁止？の前夜 ソ連ロケットで撃墜？」，『朝日新聞』1971 年 10 月 1 日【東京：朝刊】。

「林彪氏，死にまつわるナゾ 撃墜か・墜落か・破壊工作か」，『朝日新聞』1972 年 7 月 31 日【東京：夕刊】。

「林彪事件をたどって 10 遺体はどこへいったのか」、『朝日新聞』
2014 年 10 月 30 日【東京・夕刊】。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JSPS KAKENHI Grant Number JP22K00845).

(未經本刊編輯部及作者同意，不得擅自轉載本文，否則將會受到相應追究。)

(若欲閱讀本篇論文塗黑處之內容，請參考本期紙本期刊。)

新疆昌吉州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岩畫的 圖像分析與文化認同

張嘉馨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 要

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岩畫是這一區域原始先民的物質文化遺產，筆者在大量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對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人形」、「彩繪」、「動物」、「凹穴」、「折線紋」圖像進行了研究，這些圖像所包含的不同製作方法和年代關係說明這裡具有長時間的岩畫製作傳統，並可能持續了上千年。在不同時代岩畫製作的主題不同，圖像背後所表徵的文化體現了這一地區多元文化的彙集及其在歷史長河中各文化此消彼長相互影響的相貌。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岩畫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和歷史文化價值，這為進一步發掘該岩畫遺址在當代的作用、通過將其作為教育、旅遊基地強化受眾者對區域文化和中華文化的認同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字：新疆岩畫、康家石門子岩畫、文化認同、文化遺產

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岩畫的發現與研究

岩畫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在世界不同地區的文化中都有發現，岩畫的創作貫穿於人類的整個歷史進程，岩畫可以被用來理解象徵、宗教系統、性別關係、文化邊界、文化演變、藝術起源和信仰。岩畫作為早期人

類對世界觀和自我的表達，狩獵和食物採集表徵出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武器、工具及其他器物表徵出了當時人的技術能力；一些表現神話和信仰的圖像根植於當時人的精神世界和對人、自然、超自然關係的認識。岩畫的研究會使我們對人類歷史的構建、特定族群文化的認知產生重要的影響，所以，對岩畫的「閱讀」是我們探知史前文化方方面面的一個通道，它承載著人類初期的歷史和記憶。新疆自古就是文化交流的要道，呈現多元文化輻集的形態，「從很早起東西方就存在著文化互動，來自甘青地區的史前文化在距今 4000 年左右進抵新疆哈密。於此同時，一些西方的文化特質也出現在中國西北地方。具體包括麥類作物、權杖頭、冶金術等……與中原內地相比較，新疆的史前文化有獨特的發展模式，具體表現為來自不同方向的族群和文化不斷互動、影響並分化為一系列的綠洲文明。」¹ 新疆的岩畫是生活在這裡的早期先民精神生活的物質遺存，對新疆的岩畫的探究，可以使我們知曉這片土地最古老的文明起源，以及早期先民的社會結構、宗教信仰、生活面貌、文化交流等；以便更好地將上古歷史文化遺產為今所用。

對新疆岩畫的記載可追溯至清代紀昀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槐西雜誌三》，「喀什噶爾山洞中，石壁爬平處有人馬像。回人相傳雲，是漢時畫也。頗知護惜，故歲久尚可辨。漢畫如武梁祠堂之類，僅見摹本，真跡則莫古於斯矣。後戍卒燃火禦寒，為煙氣所熏，遂模糊都盡。惜初出師時，無畫手窠筆摹留一紙也。」²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當時學者不但已注意到岩畫，而且將此與漢代磚畫進行了對比。1928 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團長徐旭生調查了天山山脈柏格達峰的岩畫，並記錄下來：「有鹿、有羊、有持弓矢的人，餘不甚可識」；考察團成員瑞典考古學家佛爾克·貝格曼（Folke Bergmen）在他的《考古探險筆記（第二章）：1928 年新疆之旅》中記載了他在去羅布泊途中、興地南 65 千米處布延圖布拉克山谷中發現了岩畫，「石灰岩壁上畫著潦草的動物、騎馬者的圖像和一些難以理解的符號，甚至在小河中一些大石塊上也有雕刻。岩畫是以

¹ 李水城，《東風西漸—中國西北史前文化之進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頁 33。

²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年），頁 317。

這樣的方式『分層』的：最古老的畫在最上頭，最新的在底部。最新的類型含有佛教符號和土爾扈特人的筆跡，因此十分現代；另外最古老的明顯是史前的。我用白顏色把他們拓下來……壁畫離地面 5.5 米高」。³可見貝格曼不僅對記錄了岩畫所描繪的形象還注意到了岩畫中的分層和疊加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新疆歷史文物考古工作者重點調查了哈密、吐魯番、昌吉、伊犁、阿勒泰等區域的岩畫，對於岩畫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和有益的嘗試。以王炳華、王明哲、王博為代表的文物考古專業人員，撰寫了一批介紹和研究新疆岩畫的文章。2007-2009 年，新疆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的實地調查工作中，共普查了岩畫 472 處，新發現岩畫 249 處，其中有 18 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89 處縣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新發現的岩畫主要集中在阿爾泰山脈、天山山脈；崑崙山脈也有少量發現。岩畫之所以集中出現在這些山區，與新疆「三山夾兩盆」的地理環境有著緊密的關係。

在阿爾泰山脈，自古以來就零散分佈著眾多的冬、夏牧場，這些牧場從阿勒泰地區到塔城地區，再到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木壘縣，哈密地區的巴里坤縣、伊吾縣，雖然是不連續分佈的，但都是新疆重要的岩畫遺址區域。在這些地域分佈的岩畫，既有其特性相近的地方，也有其不同之處，新疆目前發現的洞穴岩畫，都集中在阿爾泰山脈中，洞穴岩畫中多見手掌紋和簡單線條組成的抽象人物；鑿刻的岩畫多北山羊，車、馬等圖案。⁴

在天山山脈各山之間，發育有許多河流，著名的有特克斯河、鞏乃斯河、喀什河、伊犁河；並且分佈著 6890 多條大小冰川，是天然的固體水庫。融冰的化雪，彙集成兩百多條河流，滋潤和灌溉著天山南北的廣闊綠洲。崇山峻嶺之間，又分佈著一個個盆地、谷地，著名的有哈密盆地、吐魯番盆地和伊犁谷地，這裡土地肥沃、水草豐茂、形成了良好的山區天然草場。天山山脈的岩畫主要分佈在其間的草場附近，並向北與阿爾泰山脈的岩畫群連在了一起，向南延伸至崑崙山脈附近，只是天山南部的岩畫遠

³ （瑞典）斯文·赫定、沃爾克·貝格曼著；李述禮、張鳴譯，《橫渡戈壁沙漠》（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240-241。

⁴ 于建軍，〈新疆岩畫初步研究〉，《北方民族考古》，第 2 輯，2015 年，頁 82。

遠少於北部，風格特徵也與山北的岩畫有著稍微明顯的差異，與崑崙山脈的岩畫風格更趨於一致。⁵

新疆岩畫的分佈規律似乎以天山為界，出現了不同的變化，天山北坡及其向北的多數山間草場、牧場，直至阿爾泰山的南坡，都有內容豐富的大量岩畫分佈，阿爾泰山的岩畫以阿勒泰地區和塔城地區最為集中。天山北坡的岩畫以哈密地區、昌吉回族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最為典型。天山南部的岩畫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為特色。⁶新疆岩畫多數鑿刻在避風朝陽山坡的岩石上，附近有草場和水源（無論現在是否乾枯），阿爾泰山脈、天山山脈其間有很多的山間盆地，有的甚至是比較廣闊平坦的草場，在這些草場周邊的山坡上，往往有大量的岩畫存在。古代岩畫的分佈區域與今天牧場的區域是比較一致的。⁷

本章的研究以新疆天山山脈北坡中段，準噶爾盆地南緣的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岩畫為例，通過圖像風格探索這一岩畫遺址背後早期文明的交流與交匯。這一區域是古代「絲綢之路」通往中亞、歐洲諸國的必經之路；現在仍是通往北疆各地及霍爾果斯、阿拉山口等邊貿口岸的重要交通樞紐。康家石門子岩畫所在的天山一帶是遊牧民族與農耕社會交融的紐帶也是歐亞草原的十字路口，這裡便利的交通、豐富的資源和宜人的氣候哺育了天山山麓的族群形成了悠久的歷史和眾多珍貴的文化遺存，也塑造了康家石門子東西兼具、內容多元的圖像風格。

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的地理環境

「康家石門子岩畫」（圖 1）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圖壁縣，距縣城西南 75 公里的天山中段，地理座標：北緯 43°51'2"、東經 89°19'20"，海拔 1500 米。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岩畫遺址之一。呼圖壁縣地勢南高北低，自東南向西北傾斜，地貌分山區、平原、沙漠三大部分。南部天山山區層巒疊嶂、溝壑縱橫、樹木叢生、水草豐茂是天然的牧場。中部為沖積平原由沖積扇、溢出帶和沖積平原地貌形態組成是呼圖壁

⁵ 于建軍，〈新疆岩畫初步研究〉，頁 83。

⁶ 同前註。

⁷ 同前註。

縣主要農作物種植區，正是這樣的自然環境和宜農宜牧的條件滋養著生活在這裡的族群，孕育了康家石門子岩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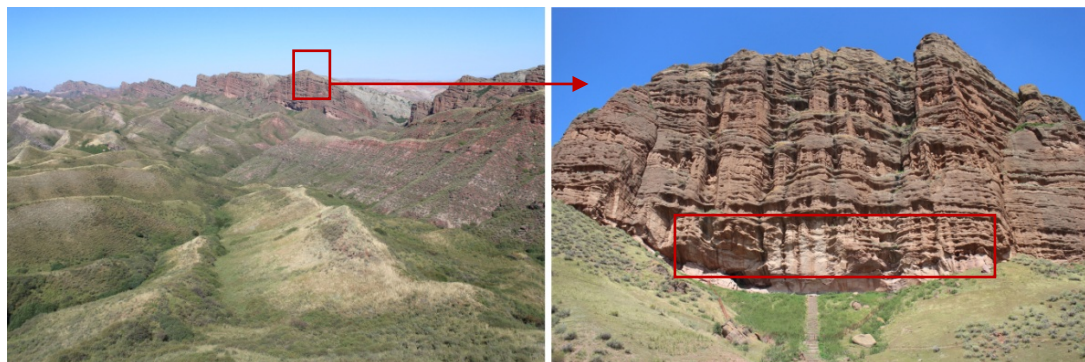


圖 1 康家石門子岩畫的地貌景觀

根據筆者的田野調查瞭解到「康家石門子」的名稱來源於清末民初之時，一康姓家族生活在這裡，周圍的人稱其為「康老二」，由於這裡山的形狀像兩扇門，所以命名為「康家石門子」，並沿用至今。「康家石門子」岩畫是呼圖壁縣（「呼圖壁」在當地語言中為「吉祥」之意）最具典型性和影響力的岩畫，在部分國內外文獻中也會以「呼圖壁岩畫」進行指稱。事實上，在呼圖壁縣還有多處岩畫點，涉及人像、動物等。康家石門子岩畫位於兩條山溪匯流處西北岸的侏羅紀晚期丹霞地貌山體南側岩壁底部的垂直岩面上，康拉爾溝、澇壩灣子溝分別流經東側和南側。該區域是天山中典型發育的侏羅紀最晚期的岩層，學名為「喀拉扎組」（俗稱「城牆礫岩」）；形成時間在距今 7000 萬年前，山石以水準狀沉積的砂礫岩為主。岩畫圖像位於高高聳立的柱狀風化岩山底部內凹的岩廈之中，由於岩體被風向陽又稱為「曬岩」，遠望岩畫所在的山體有如連綿山巒中的一座城堡。內凹所形成的岩廈不僅背風避雨，對於聲音的傳播和回聲也頗有意味，站在岩廈的大石上呼喊，聲音傳播較遠，回聲響徹山谷，就岩畫選址與聲音之間的關係，托馬索·馬蒂奧利（Tommaso Mattioli）等岩畫學家已有研究，⁸具體到康家石門子岩畫還待更多的實證資料進行剖析。康家石門子岩畫圖像以人形為主，與人形岩畫在同一岩面上，西側相距十餘

⁸ Tommaso Mattioli et al., "Echoing Landscapes: Echolocation and the Placement of Rock Art in the Central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83 (July 2017): 12-25.

米處以及岩廈內的石塊上有多組動物圖像，主要是羊、鹿、馬，此外還有凹穴、折線紋等。

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岩畫的發現

在上個世紀對岩畫的瞭解和認知遠不及當今，即使有些人看到岩畫，往往會以為是放羊娃的「玩作」，而不會和上古歷史遺跡聯繫起來。且新疆地廣人稀山高路遠，岩畫的發現更屬不易，更需要對藝術敏銳的觀察和一定文史知識的積累。筆者有幸採訪到了年近古稀的康家石門子岩畫發現者李世昌先生，追憶了他早年在呼圖壁縣「地名辦」（直屬呼圖壁縣政府）的工作經歷和康家石門子岩畫的發現過程。

康家石門子岩畫早在解放初期就被縣徵收牧業稅的工作人員發現，但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也未經專家鑒定，僅附近鄉村的居民知道此處畫作。1983年呼圖壁縣人民政府地名辦主任李世昌（甘肅隴西人，18歲到新疆求學）負責編纂《呼圖壁縣地名圖志》和《呼圖壁縣行政區劃》，在地名普查與走訪中，根據當地維吾爾族牧民的描述發現了康家石門子岩畫，據李世昌老人回憶，當地生活的維吾爾族牧民說那個崖壁上（指康家石門子）有鬼，會吃人，李世昌說我是共產黨員，唯物主義者，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鬼，一定要去看一看。根據牧民對方位的描述李世昌找到康家石門子岩畫，現場拍照並繪製了素描圖（李世昌先生具有建築學的專業背景）並上報至昌吉州博物館，但並未引起博物館相關人員的重視，只是將康家石門子岩畫大概斷定為南北朝時期。⁹ 根據當時昌吉州博物館給李世昌老人的回饋，在李世昌參與編寫的《呼圖壁縣地名圖志》（1985年印製，為內部資料，非公開發行）一書中對康家石門子岩畫的介紹為：「在雀爾溝西部13公里處。克牧勒塔斯山斷層壁立，在離地面5米處的岩石上雕刻舞蹈群像，畫面橫長4米餘，上下寬約2米，人像大者有如真人，小者約20釐米，筆鋒蒼勁，畫面古樸，初步考證產生於南北朝時期。」¹⁰、¹¹這是目前所知關於康家石門子岩畫最早的文字記載。直到1987年時任新疆考古所

⁹ 訪談人：張嘉馨，訪談時間：2017.7.18，報導人：李世昌

¹⁰ 呼圖壁縣地名委員會編，《呼圖壁縣地名志》，內部資料，1985年，第160頁。

¹¹ 註：本句對岩畫的描述與後文有出入，但基於對原始材料的尊重，按照原文進行了引用，未做改動。

所長的王炳華教授考察呼圖壁古城過程中，聽聞康家石門子岩畫，經縣文物局局長張峰柱引薦，李世昌向王炳華說明了情況，並帶領王炳華前往康家石門子進行實地考察，經過王炳華的重視、研究和相關文章的刊發康家石門子岩畫逐被外界所知曉。

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岩畫研究回溯

康家石門子岩畫引起國內外的關注與王炳華先生的重視和研究分不開，他於 1988 年在《新疆文物》發表〈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生殖崇拜岩畫〉一文，最先就康家石門子岩畫的族屬和年代問題進行了闡述：「呼圖壁境內，天山深處新發現的康家石門子岩刻，是一處非常重要的遺跡。很可能，他們是與西元前三世紀以前，在新疆北部地方活動的塞人有關的一支居民。是他們鑿刻在岩壁上的一頁珍貴歷史……我們沒有把呼圖壁康家石門子岩刻造像結論為西元前三世紀，而結論為西元前一千年的前半期，最主要的，是考慮到這組岩刻畫，自它始鑿到完成，曾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過程。」¹² 王炳華先生在談及岩畫斷代缺少比較準確方法的同時，也提及岩畫的創作不僅是古代狩獵民族、而且在近現代的遊牧民族中也是比較普遍的、歷史性的現象。王炳華先生判斷的主要依據是：「我在這裡，明知岩雕刻畫斷代存在這類棘手的問題，卻還是明確提出了這幅岩刻可能在西元前一千年的傾向性結論，主要就是因為岩雕的思想內容上，明顯可以見到原始社會後期父系崇拜的思想內涵。而這一相對年代又有助於我們做出絕對年代的推斷。這個方法，從理論上講，當時是可以站住腳的。但具體分析是否完滿、充分、自然還可以充分進行討論。」¹³ 蘇北海在〈龜茲石窟壁畫裸體藝術溯源〉一文中認同王炳華的斷代觀點，並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的巨幅生殖崇拜岩畫，屬父系氏族社會時代鑿刻，因為岩畫上所反應的以男子為中心的生殖崇拜，但還未進入奴隸社會。根據中亞進入奴隸社會的大體時間是在西元前 5-3 世紀，則康家石門子的巨幅裸體岩畫應該產生於西元前 500-1000 年之間，即距

¹² 王炳華，〈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生殖崇拜岩畫〉，《新疆文物》，1988 年第 2 期，頁 15。

¹³ 王炳華，〈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生殖崇拜岩畫〉，頁 15-16。

今約 2500-3000 年時間。」¹⁴

宋耀良在〈呼圖壁岩畫對馬圖符研究〉中認為在整幅岩畫中對馬的圖像最為抽象，首尾相接形成一個封閉性的有意味的形式，且在畫面的最高位置；可能是「族徽」。母對馬在右，公對馬在左，對照右大左小的人像順序，母對馬要顯貴於公對馬，推斷出當時的氏族處於母系為主的時代，並與陰山托林溝對馬岩畫做了比較，認為這兩處相隔萬里的岩畫具有同一文化內涵，之間可能存在著傳播。¹⁵ 盧曉輝認同宋耀良的觀點並對虎岩畫進行了探討，認為虎是「母」，是女性的象徵，而「虎鞭」可能是後來添加上去的，並且把虎作為對馬的伴生圖像，認為虎與畫面中的女性形象是等值的，其功能也應該是相似的。盧曉輝在關於對馬的解釋中認為馬圖像與馬祖崇拜思想相關，和十車國王馬祠得子的故事結構可能相同是原始生命信仰的藝術反映。

2014 年西北大學劉成教授對康家石門子岩畫進行了三維數位掃描，實現了數位化記錄，並在掃描資料的基礎上，根據刻痕分析了康家石門子岩畫中圖像的疊加關係，以此得出了部分圖像在年代上的先後順序，為康家石門子岩畫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

2015 年 羅伯特·貝納里克（Robert G. Bednarik）、保羅·塔森（Paul S. C. Taçon）、馬克西姆·奧伯特（Maxime Aubert）、湯惠生等岩畫學者考察了康家石門子及阿勒泰岩畫，其中貝納里克認為康家石門子岩畫的年代在距今 2000-3000 年，其年代上限不早於距今 4000 年，年代下限不晚於距今 1500 年。¹⁶

2017 年由於旅遊開發和地方文化宣傳的需要，將康家石門子岩畫的意涵構建為西王母的起源，持此觀點的主要是巫新華。他認為「康家石門子岩畫早期人物形象為女神崇拜，有可能是中國西王母文化的起源地……康家石門子岩畫曾於春秋戰國時期傳播到四川西南部地區和雲貴一帶，並直接影響了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鹽源青銅枝形器的出現。而鹽源

¹⁴ 蘇北海，〈龜茲石窟壁畫裸體藝術溯源〉，《新疆藝術》，1989 年第 6 期，頁 37。

¹⁵ 宋耀良，〈呼圖壁岩畫對馬圖符研究〉，《文藝理論研究》，1990 年第 5 期，頁 84-87。

¹⁶ 具體數據尚未發表，年代推斷基於現場觀察和會議交流。

青銅枝形器則是中國西南地區漢魏時期風行一時的西王母主題青銅搖錢樹來源。」¹⁷ 在筆者 2017 年 8 月的實地調查中，對縣委宣傳部長等相關負責人員進行了訪談，他認為先前關於康家石門子岩畫「生殖崇拜」的定位不利於旅遊宣傳，對直白而廣泛地宣傳這一地區生殖崇拜文化感到羞澀與忌諱，而西王母起源這一假說更符合對當地文化宣傳和推廣的需要，有利於提高當地的知名度。

總體而言，康家石門子岩畫的研究，先賢學者在年代的判定上基本觀點為距今 3000 年左右，在族屬問題上多歸功於塞人（Scythians，希臘文獻譯為「斯基泰人」、波斯文獻譯為「薩迦人」），在圖像的內涵闡釋方面集中在生殖崇拜、舞蹈起源、族群祭祀等。當然，我們還應注意到岩畫的研究與二十世紀的原始主義思潮和原始主義運動不無關係。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原始藝術在歐洲等西方國家受到學者的重視。同時，十九世紀末，西班牙阿爾塔米拉岩畫的發現使岩畫研究逐漸進入到學界的視野之中，並被考古學、人類學、藝術史方面的專家所關注。這一時期受到泰勒的《原始文化》和弗雷澤的《金枝》的影響，對原始藝術的研究多關注於藝術起源問題，「為藝術而藝術」、「巫術說」、「宗教說」、「舞蹈說」、「遊戲說」、「模仿說」等觀點相繼提出，史前岩畫往往成為學者論點的例證。同時，這一時期的岩畫研究受到交感巫術（sympathetic magic）理論的啟示，考古學家雷納克（Salomon Reinach）、步日耶（Abbé Breuil）認為歐洲舊石器時代的洞穴岩畫是狩獵或生殖巫術的體現。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結構主義人類學的發展，高爾漢（André Leroi-Gourhan）借用結構主義方法對岩畫進行闡釋，之後阿納蒂（Emmanuel Anati）借用結構語言學對岩畫進行了討論。到 20 世紀末隨著科技考古和碳 14、釉系測年的發展，岩畫研究中更多科技的力量介入，為岩畫闡釋提供了直接斷代的年代學基礎。筆者認為康家石門子岩畫的研究並未脫離大的學術輿論背景，上世紀八十年代康家石門子岩畫的發現和研究之初，正是國內文化意識反思和繁盛之時，其生殖崇拜說不僅僅是基於圖像的分析也受到了西方關於原始藝術思潮的影響

¹⁷ 董少華，〈康家石門子岩畫又有新發現〉，《新疆日報》（漢），2017-08-04(005)。

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岩畫圖像研究

「人類學以整體論為標誌，它一直強調整體綜合的觀點，堅持把人類社會看作是一個整體，一個具有功能結構的系統。因此，對於變化多端的人類社會文化現象來說，許許多多的課題不是一個學科的知識所能解決的，而是要多種學科的通力合作。」¹⁸ 在岩畫研究中不僅需要人類學的理論方法進行闡釋，更需要整體論的視角，2017 年夏筆者對康家石門子岩畫本體及周邊的文化習俗進行了系統的調查，涵蓋圖像、區域生態環境、民間習俗、歷史文化等以此勾勒出岩畫製作的「時空」場域，同時把對岩畫的研究置於民族社會關係之中進行解釋；通過民族志、考古資料等多重證據的應用延展岩畫實證的經驗範疇，從跨學科和整體論的角度不斷補充證據鏈條使得從物質遺存到精神闡釋之間邏輯更為嚴密且具有可驗證性，從而消解對岩畫的過度闡釋。

人形岩畫圖像研究

康家石門子岩畫主體圖像是「群舞」的人形（圖 2、圖 3），東西長約 13 米，最下層岩刻距地面約 1.9 米，最上部岩刻距地面近 10 米之高，畫中以人物為主，人物中間有對馬和老虎的圖像。其中人物大小不等，最大者超過真人，最小者約 10 釐米，共刻大人 74 個，小人 62 個。畫面中的人像有些根據特徵可辨識性別，男像體格健壯，並繪出生殖器及睪丸，女像修長秀美臀部肥碩，畫面中有交媾動作出現，但有些人像頗為抽象或已斑駁不易辨識性別。此外還有雙頭同體人像：兩個頭像共有一個倒三角形的身體，身體的一側有男性生殖器；腹中懷子人形：即在人形的腹中有一與人形頭像相似的頭像，這種表現手法在岩畫中並非孤例，但多見於動物岩畫之中，如馬來西亞的打捫岩畫中有牛的腹部描繪小牛的彩繪。

¹⁸ 麻國慶，〈民族考古學與陰山岩畫研究〉，《陰山學刊》，1989 年第 1 期，頁 118-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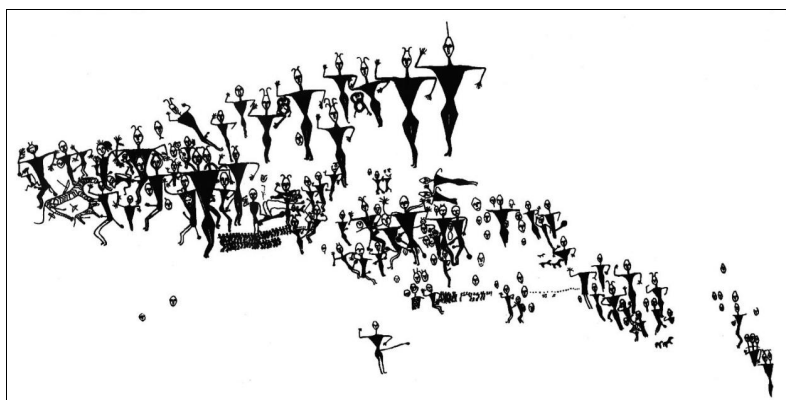


圖 2 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主體圖像



圖 3 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主體圖像（部分）



圖 4 鄯善縣蘇貝希遺址 I 號墓地 M6 女屍（左圖）和 M11 女屍（右圖）

在康家石門子岩畫的人物造型中「尖頂帽」的特徵比較突出，王炳華據此將康家石門子岩畫作為塞人遺存的證據之一。「尖頂帽」這一文化符號在西域地區較為常見，至今仍有製作和穿戴。溯古，在新疆鄯善縣蘇貝希遺址曾出土過三頂、在哈薩克的伊塞克遺址的「金衣人」也頭戴「尖頂帽」、俄羅斯戈爾諾阿勒泰省的巴澤雷克墓地中出土過彎鉤形尖頂帽。俄羅斯學者認為巴澤雷克古墓中出土的尖頂帽是原始人對「生命樹」的象徵性符號表達。根據筆者的田野調查，在現在的維吾爾族中「尖頂帽」製作程式帶有誦經等宗教色彩，視其為高山或雄性權利的象徵，也是神聖與高貴的體現。鄯善縣蘇貝希遺址 I 號墓地 M6 女屍和 M11 女屍的形象（圖 4），「尖頂帽」的特徵十分明顯，M6 女屍的帽子內部有支撐棍，其高高的帽尖和康家石門子人像岩畫中頭頂的「天線」（俗稱）十分相似。「希羅多德在各軍隊與薛西斯作戰的描述中，注意到了塞種人戴的尖帽，而且一個戴著尖帽的塞種國王形象出現在比索頓的雕刻中。我們在波斯波利斯的浮雕上清楚地看到了這些帽子的形象，上面顯示特使們戴著這種獨特的頭飾，附文稱他們為塞種人，這是被希臘人稱之為斯基泰的這一遊牧民族的傳統的波斯名字……我們能從這種奇特的頭飾中得出什麼結論呢？資料顯示這些戴著高聳入雲的帽子的人要麼是神人溝通的媒介，要麼他們本身就是神靈。而且根據圖像證據，最早的戴高帽的形象是神靈。也就是說早期只有神並且可能是在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才戴高帽。既然祭司們區別於其他社會成員，同時為了拉近與神靈的距離他們便也戴神的帽子，可能是為了使他們的職位顯得更突出，當然也是告訴世人他們之所以可以戴這樣的高帽是由於跟神靈的特殊關係，而非普通人能享有。」¹⁹ 這說明「尖頂帽」這一造型其實用性並非主要的，在早期的巫術或宗教中是人神溝通的工具也是神權或皇權的象徵。筆者認為康家石門子岩畫中「尖頂帽」的人物造型不僅是塞人的佐證，也體現了該岩畫所表達的場景可能是某種儀式，具有強烈的巫術或宗教性（原始薩滿教）色彩；這幅岩畫既是儀式的一部分也是儀式的圖像化呈現，即岩畫具有既能記事，又可成事的功能。

¹⁹ 卡爾蓮·瓊斯—佈雷、丁蘭蘭，〈高帽：直通天國〉，《草原文物》，2012 年第 1 期，頁 110-114。

康家石門子岩畫人物造型中還有一典型的特徵就是對男性生殖器的誇張表現，也正是由於畫面中對此的突出描繪，諸多學者的闡釋採用了「生殖崇拜」的觀點，生產和繁衍是遠古人類社會生活中最主要的主題，但人形和生殖器是否是一個時期創作還是後期進行的添加在不同的時空中刻畫組合而成還有待於更為深入的觀察和科技斷代手段的輔助。但整個畫面載歌載舞、突出生殖器的表現似乎展示了先民們祈盼多生多育、人丁興旺、繁榮發展的娛悅場面，這在關於周邊地形和神話傳說的人類學考察中也得以印證。在位置的選擇上，「丘陵為牡，溪穀為牝」成為詮釋康家石門子岩畫生殖崇拜的又一例證。在民間認為生者選擇宅地，或考慮村莊、城鎮的位置時，認為「母形」最好，就是指兩山夾一水的川地，或兩山夾一穀的谷地，認為這種地形有利於人丁興旺，福佑。陰宅的選擇上會選擇女陰似得底凹地形，俗稱「鮮花地」、「蓮花地」、「金盤獻果」，將死者葬於此，生者可以得到底護。此外這裡還有與產子或多子有關的神話，在距離岩刻 100 米處的半塌陷石窟中，有一從縫隙中滲出的泉水，附近的哈薩克牧民稱為「神水」、「淚泉」或「子母泉」，婦女飲用後有助於繁衍子嗣，也有不孕的婦女專程來此，帶上祭品，祭拜，飲用泉水以恢復生育能力，生育男孩。至於這些神話是上古流傳至今，還是今人為附會康家石門子岩畫的生殖崇拜色彩而加以構建和渲染，現已無從得知。



圖 5 (左) 哈薩克唐伯拉岩畫，(中) 康家石門子岩畫，(右) 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刻痕

由於天山一帶自古就是東西文化交流的通道，文化、人口、族群皆比較多樣化，文化的涵化和濡化互相滲透，如：英國的明斯（E. H. Minns）

是研究斯基泰文化的著名學者，他在《斯基泰人和希臘人》一書中指出斯基泰文化和黑海沿岸草原地帶希臘文化之間的傳播關係。²⁰ 康家石門子岩畫與中亞地區的岩畫既有聯繫又有區別，至於康家石門子岩畫與哈薩克唐伯拉岩畫、亞塞拜然的阿布歇隆區（Absheron）和戈布斯坦區（Gobustan）的岩畫之間風格的相似性是否與傳播有關，還有待更準確的岩畫斷代和證據支持，但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如位於哈薩克的唐伯拉岩畫的一幅圖像，在畫面的最下方有一排把手舞蹈的人像在風格上與康家石門子岩畫比較相似，不同的是康家石門子岩畫的把手舞蹈人像刻痕更深，鑿刻而成，刻痕呈「U」型，刻痕上覆蓋有殘留的顏色；而唐伯拉岩畫中的圖像磨刻而成，刻痕較淺；從這兩幅岩畫的製作手法和刻痕而言，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這組圖像早於唐伯拉岩畫中的圖像（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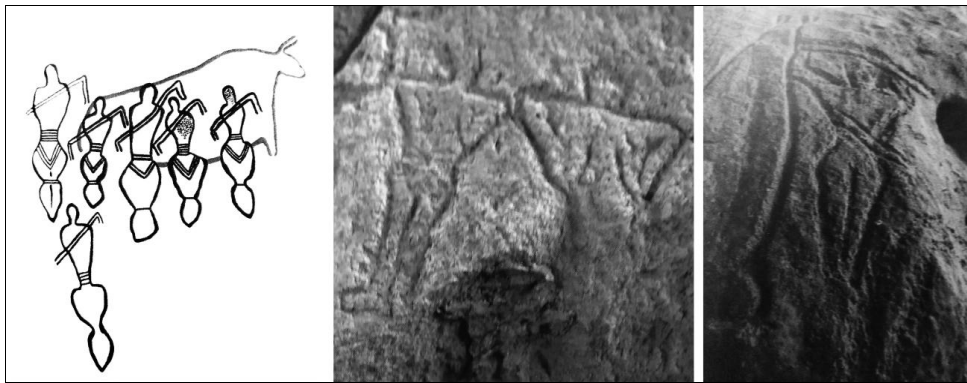


圖 6 亞塞拜然古布斯坦（Gobustan）岩畫

亞塞拜然古布斯坦（Gobustan）的岩畫（圖 6），就其地理區位而言，位於高加索山和裡海之間是通向歐洲的門戶，也是亞洲和歐洲人們遷徙的主要通道。於 200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豐富的狩獵、動物、植物和生活方式（人物）的岩畫圖像從史前時期一直延續至中世紀，古布斯坦共有 6000 多幅岩刻，大量的洞穴和岩棚證據顯示這裡有 15000 年的人類居住或使用歷史。阿納蒂在對古布斯坦岩畫的研究中認為這一地區的岩畫最早可追溯到距今三萬年之久，其風格顯示了歐洲和近東地區文化上的相互影響及關聯，從這一地域不同時期的岩畫中可以發現文

²⁰ E. H.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3).

化的變遷和早期智人遷徙的痕跡。²¹ 古布斯坦岩畫中的女性身體呈圓潤的三角形、臀部呈菱形，從造型上兼具歐洲史前藝術中圓潤豐滿的特徵和康家石門子岩畫中三角形身體的風格。

在康家石門子岩畫周圍分佈著諸多石堆墓、石圈墓，如：位於呼圖壁縣雀爾溝鎮雀爾溝村東南約 15 公里天山山谷中的石門子墓（西北約 25 公里為康家石門子岩畫）。根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資料，石門子墓地共有墓葬 94 座，主要分佈在呼圖壁河西岸的一、二級臺地上，東岸分佈較少。在口腔衛生方面，死者有患牙周炎的現象，未見齲齒，可能與他們的飲食結構中食用較多動物性食物有關。從中也可推測出石門子古代居民的生產方式應是以畜牧經濟為主。²² 呼圖壁東南吐魯番綠洲（盆地）的蘇貝希文化，南面的焉耆綠洲北沿的察吾乎文化農業與畜牧業兼有，其絕對年代基本上都在西元前 1000 年左右至西元前後。他們種植並食用小麥、穀子等作物，同時又飼養羊、牛作為衣食之源；利用綠洲少量的水源採用原始粗放的耕作技術開墾土地、種植作物，過著定居的生活。出土「尖頂帽」女屍的蘇貝希遺址居民多住在半地穴式的房屋，從遺址出土各種毛織的服裝、毛氈、皮革製品、弓箭及大量殉葬的羊推測當地居民從事畜牧和狩獵，制陶、革製造等手工業也較為發達。²³ 察吾乎文化主體墓地是原始大型氏族的公共墓地，其經濟是以畜牧（遊牧）經濟為主，大量陶器的出土表明當地居民過著穩定的定居生活，特別是一些陶器中發現了穀物說明當時已有了原始的農業，在晚期墓葬中出現了鐵器。地緣相近年代相似的蘇貝希和察吾乎文化，其生計方式、習俗信仰及社會結構對於解釋康家石門子岩畫背後的內涵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或者說可以把它們作為康家石門岩畫創作的空間場域。

²¹ Emmanuel Anati, *World Rock Art: The Primordial Language* (Gloscestershire: Archaeopress Archaeology 1994).

²² 張玉忠等，〈新疆呼圖壁石門子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14 年第 12 期，頁 16-17。

²³ 陳戈，〈蘇貝希文化的源流及與其它文化的關係〉，《西域研究》，2002 年第 2 期，頁 15。

彩繪、動物、凹穴、折線紋岩畫研究

康家石門子岩畫不僅具有豐富的人物圖像，還具有鹿、馬、羊等動物圖像以及凹穴和折線紋，在對康家石門子岩畫的調查和研究中應注重整體，不僅要關注其典型的「人物群像圖」也要關注該岩畫點其它的彩繪和岩刻圖像。康家石門子岩畫諸多圖像所包含的不同製作方法和年代關係說明這裡具有長時間的製作岩畫的傳統，這一傳統可能持續了上千年；在不同時代岩畫製作的主題不同，圖像背後所表徵的文化體現了這一地區多元文化的彙集及其在歷史長河中各文化此消彼長相互影響。



圖 7 康家石門子岩畫彩繪、動物、凹穴、折線紋所在岩壁

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大型「人物群像圖」自發現以來持續被外界關注，學界認為這是距今三千年左右的塞人遺存。但在筆者的調查研究中發現，在康家石門子岩畫的岩壁及其岩廈下方的大石上還有多處彩繪和岩刻圖像，其中彩繪岩畫在「人物群像圖」岩壁的西側，距離地面一米左右，多為七八釐米或十幾釐米的小圖形，且已經斑駁不清、能隱約辨析出有動物圖像、人物圖像、騎獵圖像，用色涉及紅色、白色、淡黃色（所呈現出來的淡黃色由於風化的原因和當初作畫時的顏色可能有較大差異）。在距離地面兩米高的彩繪岩畫以西的岩壁上有幾十個岩刻動物圖形組成的畫面，另外在岩廈散落的大石上也有一些岩刻涉及動物、凹穴、折線紋等。由於這些岩繪和岩刻圖像在視覺上不夠突出，且其中動物圖像的年代可能較晚，儘管康家石門子岩畫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已經發現並進入學術研究

領域，但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群像圖」，對康家石門子岩畫中其它圖像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從岩畫點調查研究的完整性和整體性而言，岩畫點所有的圖像都應該納入其中，這也涉及到岩畫研究中關於岩畫點、岩畫幅的劃分等基本問題和岩畫研究方法的整體論問題。

在岩畫研究中如何對岩畫的範圍進行劃分是一個常見的問題，基於對範圍的劃分會衍生出不同地理範疇的岩畫之間關係及風格類型差異的探討。關於岩畫區、岩畫點、組（幅）、圖像的劃分，在國際上通常採用義大利岩畫學家阿納蒂（Emmanuel Anati）的分類方法，他指出：岩畫區通常包括多個岩畫點，岩畫區的劃分往往基於文化上或地形上（山谷、平原、高山）的區隔，兩個岩畫區之間至少間隔 20 公里。而岩畫點通常是岩畫圖像間隔在 500 米以內的岩畫聚集區。²⁴ 關於組（幅）則根據岩畫內容、畫面位置的不同而不盡相同，通常是指多個繪製於同一岩石或岩面上的圖像；圖像多指單個具體岩畫圖形（如：人面像、動物、抽象符號等）。當然在具體的劃分過程中還要考量圖像的疊加、實際的自然環境、周邊的考古遺存、文化的關聯性等因素。具體到康家石門子岩畫作為一個岩畫點，我們應該從整體上對所有圖像進行關注和分析，不能以其中的一幅「人物群像圖」代替整個康家石門子岩畫。在這些不同的圖像中不同的製作方法和年代關係說明這裡具有長時間的製作岩畫的傳統，這一傳統可能持續了上千年，對所有圖像的收集和研究有利於我們從更大的時空框架和整體性的角度對該岩畫點進行研究。所以筆者認為這些不被關注的圖像和「人物群像圖」一樣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或許能為我們破解康家石門子岩畫提供重要的線索。基於此，筆者對康家石門子岩畫中這些「不被關注」的圖像進行了調查和初步研究，並結合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人物群像圖」，對康家石門子岩畫在歷史上的延存時間和各主要圖像的早晚關係進行了思考。

（1）彩繪岩畫圖像

在中國彩繪岩畫最為集中的區域在西南，如廣西花山岩畫、雲南滄源岩畫、文山岩畫、貴州大紅岩岩畫等。另外近些年在東北大興安嶺也發現

²⁴ Emmanuel Anati, *World Rock Art: The Primordial Language*, p. 11.

了一些彩繪岩畫。而中國北方地區、中部及東南岩畫皆以岩刻畫為主。具體到新疆地區，從數量上而言新疆絕大多數岩畫為岩刻，以動物為主，與內蒙、寧夏、甘肅等省份及中亞地區關係密切。目前在新疆所發現的彩繪岩畫主要集中在北疆的阿勒泰地區，共有三處岩畫遺址皆為洞穴類型的彩繪岩畫，自東向西分別是富蘊縣的唐巴勒塔斯彩繪岩畫、阿勒泰市的敦德布拉克岩畫、哈巴河縣的多尕特岩畫。將康家石門子岩畫置於中國彩繪岩畫的視域下進行分析和比較有利於我們對該岩畫點的深入把握，也為天山通道的歷史文化交往提供了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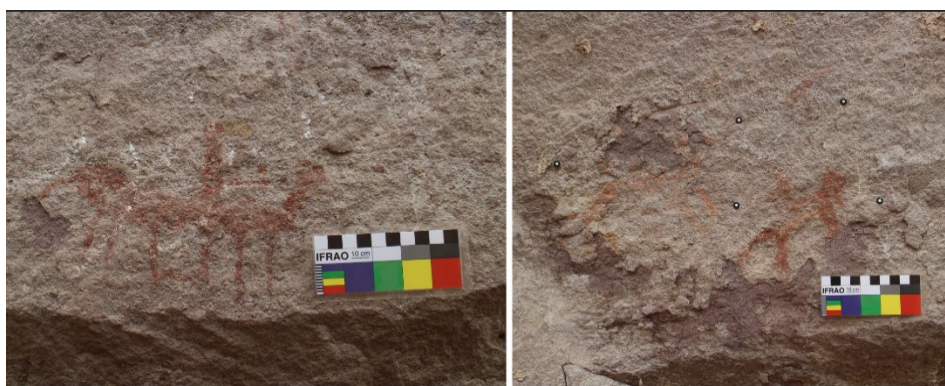


圖 8 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彩繪騎獵圖像

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彩繪岩畫在「人物群像圖」的西側下方，距離地面大約一米高的位置依次排列，圖像以騎獵和動物為主，由於風化嚴重、岩面表皮脫落和人為塗鴉刻畫破壞等原因圖像多已斑駁不清，彩繪岩畫中騎獵圖，一人騎於動物之上（可能是「馬」）（圖 8），圖像以彩繪平塗為主，未見勾勒外形後填色的製作方法。這類騎獵圖在中國西北較為常見，尤其是在新疆分佈廣泛且數量較多，但多為岩刻畫，以彩繪形式出現的騎獵圖較少。在彩繪岩畫中還可識別出人形禱告圖、蹲踞式人形圖；人形禱告圖雙手上舉在頭頂形成一個環形，作祈禱狀。這類圖像在內蒙古的陰山山脈和巴丹吉林沙漠中的曼德拉山中皆是以岩刻的形式出現，且年代較為晚近。蹲踞式人形圖是雙腿下蹲、雙臂展開的，這類圖像的彩繪形式在阿勒泰汗德尕特鄉的岩畫中有發現；此外，在廣西花山、雲南滄源有較為豐富的彩繪類蹲踞式人形；蹲踞式人形的岩刻在新疆、青海、甘肅境內皆有發現，但數量較少。



圖 9 康家石門子岩畫「人物群像圖」中的彩繪部分



圖 10 阿勒泰汗德尕特鄉洞穴岩畫

康家石門子岩畫「人物群像圖」中在部分人像的身體（圖 9）和「對馬」的輪廓位置有紅色彩繪，畫面先刻後繪而成，繪的年代與刻的年代在同一時期或稍晚。阿勒泰地區阿勒泰市汗德尕特鄉洞穴岩畫中有人物和動物的彩繪岩畫圖像，人物彩繪圖像為手臂和雙腿微張的人形，似在把手行走或跳舞。動物圖像類似「馬」在製作的過程中採用先勾勒輪廓再在頭頸部填充顏色的方法。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彩繪騎獵、人物圖像與該岩畫的「人物群像圖」中的彩繪比較而言，分屬不同的風格，人物群像圖更具符號化和抽象性，畫面有濃郁的原始巫術的色彩。而位於西側岩壁上的這些動物和人物彩繪圖形，表達的內容更為生活化，記錄性更強。與阿勒泰汗德尕特鄉洞穴岩畫中的彩繪圖像（圖 10）比較而言，與其中的人物圖像在色彩、用筆和製作方法上較為接近，應為一個時期的作品，而動物彩繪岩畫可能早於它們，這是由於從顏色上而言汗德尕特鄉有些動物岩畫顏色

較深，呈現桑葚色（mulberry-colored），這在北澳大利亞金伯利等地被視為舊石器時代顏料的色澤，²⁵從風格上而言，這種勾勒輪廓填充顏色的岩畫風格在歐洲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

在新疆地區彩繪的數量極少，且集中於阿勒泰山，新疆康家石門子岩畫的彩繪圖像位於天山中段地處阿勒泰山和帕米爾高原之間，也是古代東西交流的重要通道。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彩繪圖像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於這一地域的彩繪體系之中，與北部阿勒泰地區彩繪岩畫、與南及東南的藏青地區彩繪岩畫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聯繫，可能具有過渡性。

（2）動物岩刻圖像

在康家石門子岩畫「人物群像圖」岩壁的西側和地面散落的大石上刻有動物圖像，其風格和製作方法基本和動物圖像一致。在康家石門子岩畫「人物群像圖」岩壁的西側，距離地面約兩米高的位置，有幾十個動物圖像，所刻畫的動物大約十釐米左右，頭皆朝向東，即朝向「人物群像圖」的位置，動物涉及馬、羊、鹿等（圖 11），除畫面左上方的鹿為點狀鑿刻外，該岩面上其餘動物圖像皆磨刻而成，線條比較光滑。鹿形圖像身形與四肢用線條高度概括，形成側面剪影造型，鹿角在圖形中較為突出呈現樹枝狀，這種造型的鹿圖像在岩壁的動物岩刻中也出現，在歐亞大草原也較為普遍，是這一地區鹿岩畫中一種較為常見的風格。在「人物群像圖」岩壁的西側，位置與彩繪動物的圖像距離比較近的地方，有兩個類似羊的圖像一大一小（圖 12），圖像以簡潔的線條高度概括出動物的輪廓，呈側面剪影造型，小圖形位於大圖形的尾部，兩個圖形皆成奔跑裝，動態十足，兩個圖形似母子、又似追逐。在西側岩壁上還有一個羊圖形，身體以直線概括出形態，羊的兩隻羊角呈複綫弧形，圖像造型直線與曲線、單線與複綫相結合，寥寥幾筆躍然石上。在地面散落的大石上，有兩個羊圖形，羊角呈複綫半圓狀，具有程式化的意味，這一特徵在新疆、寧夏、青海等西北地方的羊圖像中較為常見。

²⁵ Huntley, J., Aubert, M., Ross, J., Brand, H. E. A. & Morwood, M. J. (2015), "One Colour, (at Least) Two Minerals: a Study of Mulberry Rock Art Pigment and a Mulberry Pigment 'Quarry' from the Kimberley, Northern Australia," *Archaeometry* 57 (1): 77-99.



圖 11 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動物圖像



圖 12 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羊圖像

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這些彩繪圖像和動物圖像，所反應的內容與「人物群像圖」相異，大多是對狩獵和遊牧文化的一種體現。「俄羅斯學者魏因施泰因認為，西元前第一個千年的中期是遊牧人群在歐亞草原普遍出現、擴展的時期，他們也約在此時出現在蒙古草原北鄰的薩彥嶺—阿勒泰地區。歐洲漢學家雅羅斯拉夫·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也有類似的說法；他認為歐亞草原東部「蠻族」移徙及入侵中國，與草原西部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與塞人（Scythian）的大遷徙有關，而兩者都肇因於約西元前 1000 年歐亞草原上一個新經濟社會形態的產生；這新經濟社會形態便是基於畜養大量馴養動物——特別是馬——的遊牧。這種新經濟浪潮造成新的資源領域瓜分，產生一些向鄰近地區擴土的遊牧武士，也因此讓整個歐亞草原風起雲湧，一端發生變動很快波及另一端」。²⁶ 遊牧部落的頻繁遷徙和部落間的交流促使著文化上的互通和相互影響，在歐亞草原的動物岩刻中風格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時間的早晚上，從共時的角度而言，

²⁶ 鍾焯，《重釋內亞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頁 81。

在廣泛的地域中具有表現內容和風格上的趨同性。

在康家石門子岩畫中還出現了兩對「對馬」、老虎等動物形象，「對馬」為兩匹馬側身豎立，馬頭及四肢相對；老虎身刻折線紋呈奔跑狀；「對馬」與老虎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裝飾風格。在風格造型和製作方法上與岩壁西側和岩下大石的岩刻動物圖形圖像風格差異較大；「對馬」、老虎圖像造型上更為抽象和符號化、具有圖騰的意味，年代早於岩刻動物圖像。岩刻動物圖形更為寫實，刻畫也更為生活化。從製作方法、風化程度和風格特徵而言，「對馬」、老虎的年代較早；岩壁西側和岩下大石的動物圖像較為晚近，是該岩畫點年代最晚的圖像。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岩刻動物圖形與廣泛分佈在新疆和西北陰山山脈、賀蘭山山脈的動物岩刻在風格和造型比較相似，其年代也相當，是對遊牧生活的一種現實摹寫。

（3）凹穴岩畫圖像

凹穴指刻鑿成半球狀，多發現於岩石的水準岩面上，偶見位於垂直或傾斜的岩面之上。在尺寸上，凹穴岩畫直徑通常在 2cm-10cm 之間，深度在 0.5-2cm 之間，²⁷偶爾也有尺寸較大的凹穴岩畫，其剖面大抵呈半球或鍋底狀。凹穴又可分為「杯狀穴」和「淺凹穴」；「杯狀穴」指通常以磨刻手法製作、凹穴直徑與深度均較大的一類凹穴。「淺凹穴」指凹穴直徑和深度相對較小，通常在 6cm 以內的凹穴。凹穴岩畫的空間分佈，也是全球性的，除了南極洲之外，各大洲均有發現，且數量巨大。²⁸此外，凹穴與溝槽（linear grooves）、折線紋、方格紋組合出現的形式，也具有普遍性。凹穴通常被認為在更新世和全新世時期已經出現，具有較長的歷史傳統，在部分地區一直延續至今，凹穴也是世界上目前現存數量最多的岩畫類型。貝納里克認為凹穴、溝槽、圓環、多重同心圓、三叉線、折線紋、波浪線、多重弧線的岩刻技術普遍存在於舊石器時代中期。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凹穴位於印度中央邦的首府博帕爾市東北方 45 公里處的貝特卡岩畫（Bhimbetka rock shelters），²⁹這裡的凹穴岩畫和溝槽發現於

²⁷ R. G. Bednarik, "A Short Ethnography of Cupules," in R. Querejazu Lewis and R. G. Bednarik, eds, *Mysterious Cup Mark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upule Conference*,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2073 (Oxford: Archaeopress, 2010), pp. 109-114.

²⁸ R.G. Bednarik, "Cupules," *Rock Art Research* 2008, 25(1): 61-100

²⁹ 貝特卡岩畫於 2003 年列為 UNESCO 世界遺產，貝特卡岩畫可分為五個岩畫點，共

舊石器時代早期的考古地層中。³⁰

在中國凹穴岩畫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和中部平原，其中河南最為集中，數量最多。此外，在遼寧鞍山、江蘇連雲港、臺灣萬山也有一定數量的凹穴。就形式上而言，中原地區的凹穴岩畫組合形式更為多樣，數量更多，有的凹穴與溝槽、折線紋、方格紋、渦旋紋、同心圓等圖像共同出現（圖 13）；凹穴岩畫附近常見石棚、石圈和疊石等。就目前新疆的岩畫統計資料而言，所發現的凹穴並不多，這也與對凹穴的認識有關，先前在對岩畫的調查中常不把凹穴列為岩畫的範疇，直到河南凹穴岩畫的大規模發現，隨著凹穴岩畫的報導和研究的深入，凹穴岩畫才逐漸進入岩畫調查研究的視域之中。在先前關於康家石門子岩畫的調查研究中尚未發現關於該凹穴的研究，根據筆者的調查，該凹穴為「杯狀穴」（cup marks）直徑約 11 釐米，深約 7 釐米，通體敲鑿法（direct percussion techniques）製作而成、凹穴的壁面光滑。（圖 14）



圖 13 （A）鞍山市玉巒山莊西凹穴、（B）新鄭市具茨山「梅花狀」凹穴、（C）連雲港市將軍崖岩畫中的「杯狀穴」

400 多幅彩繪岩畫；這裏的文化序列從舊石器時代早期一直延續到中世紀的早期。

³⁰ 於 1969 年，Wakanakar 挖掘了禮堂岩石。最底層提供了阿舍利文化工具（手斧、劈刀、各種刮板、齒狀物、刀、凹位、薄片和刀片）。中間層生成了舊石器時代中期的石英砂石工具，頂層是細粒石英的中石器時代工具。



圖 14 新疆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凹穴

目前關於凹穴的解釋已有上百種，涉及星象、血祭杯、聖水杯、性穴、太陽、月亮、氣候變化、道路、對於生死或戰爭的記錄。陳兆復認為「凹穴在古代的東方宗教中，特別是在古代及後來的印度宗教中，在祭祀的雕像中，大都與崇拜母親——土地的多產有關，象徵整個生命的開始。奧德柯拉尼科娃在她的《西伯利亞和北美太平洋岩畫》中，曾介紹北美印第安人婦女將生孩子的时候，丈夫要上山刻制環形凹穴，以祈求生育順利。世界許多地方發現的凹穴岩畫，是作為生殖崇拜的符號存在的。而在日本和韓國發現的凹穴岩畫則被直接稱為「性穴」。湯惠生在〈玦、闕、凹穴以及蹄印岩畫〉一文中，談及凹穴岩畫，認為是通天的象徵，連結凹穴的溝槽則是通天的通道，凹穴是中國古代薩滿文明中以「通天」為核心的信仰體系的遺存物。³¹ 具體到康家石門子凹穴，尚不能準確判斷其內涵，但無論是作為生殖崇拜的象徵還是薩滿文明的象徵，都和「人物群像圖」產生了意義上的聯接。考慮到其製作方法和其它地區凹穴的年代，筆者認為該凹穴是康家石門子岩畫中較為早期的圖像，與「人物群像圖」之間的早晚關係尚不好確定，但早於彩繪和岩壁西側及散落大石上的動物圖像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4）折線紋岩畫圖像

與凹穴岩畫在同一塊岩石的背面（該岩石東側高 60cm，西側高 85cm，凹穴面向南、折線紋面向北與動物岩畫所在的岩面對），有數

³¹ 湯惠生，〈玦、闕、凹穴以及蹄印岩畫〉，《民族藝術》，2011 年第 3 期，頁 97-102。

條自東向西的折線紋呈平行狀排列，根據觀察和刻痕可見折線紋為人工製作的產物，用敲鑿法刻制而成，線條已經較為光滑，刻痕呈「U」字形。（圖 15）與上文中提及的凹穴一樣，該折線紋岩畫之前也未被列入康家石門子岩畫的範疇。就製作方法、風化程度而言，折線紋可能與凹穴製作於同一個年代或稍晚，但同樣早於彩繪和動物圖像。



圖 15 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折線紋

在岩畫解讀中，儘管我們可以把圖像置於岩畫「篇章結構」中，但在有些方面對意義的解讀仍然很模糊。猶如當索圖拉（Sautuola）的小女兒第一次看到阿爾塔米拉洞穴頂部的公牛形象時，會辨識出來；這並不意味著她能讀懂數萬年前坎塔布里亞（Cantabria）的象徵和意義體系，而只是看懂了具象的圖像所指示出的內容。儘管大量的具象性岩畫圖像為我們的解讀提供了指徵性，但是當我們面對「凹穴」、「折線紋」等抽象圖形時闡釋就變得困難，且難以驗證。目前關於岩畫中這類圖形的實證主義解釋，有必要提及南非岩畫學家路易士·威廉姆斯（James David Lewis-Williams）的神經心理學和薩滿教理論，他也是目前唯一從神經心理學實驗的角度去解讀岩畫的學者。

路易士·威廉姆斯和湯瑪斯·道森（Thomas Dowson）在金山大學從神經心理學的角度對岩畫進行了研究，著重關注人類神經心理學上的普遍認知模式和薩滿教之間的聯繫，尤其是基於人神經系統的結構而產生的幻覺類型。他們用醫學和民族志材料分析了歐洲舊石器時代的岩畫，並在歐洲和非洲的岩畫研究中引起了廣泛的影響。他們在金山大學建立了針對致幻劑研究的實驗室，並建立了在致幻劑作用下意識狀態不同階段的神經心理學模型。這一模型有力地證明了主體的幻覺和意識狀態之間的關係，就全球的尺度而言，雖然各個地區存在文化、環境上的差異，但這一理論的普遍適用性是以人類在神經學上的同一性為基礎的。正是基於神經心理

學實驗室的實驗資料，路易士・威廉姆斯證明了為何在全球的狩獵—採集社會中藝術形式會如此的相似，闡明了「折線紋」等這類抽象圖像是薩滿教的產物，是薩滿通神狀態下通過「內視」所看到的圖像的摹寫。筆者認同威廉姆斯的觀點，在各地區廣義的薩滿教盛行階段，折線紋是內視現象產生的圖像，並延續至後世。但折線紋無論是在地域的廣度和時間的跨度上都極為宏大，從北半球的愛斯基摩人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亞土著藝術，從史前的陶器、岩畫到當代原住民地區的藝術皆有出現，對於這種紋式的探討還要放在具體的當地文化場域之中。考慮到這一地區塞人的薩滿教傳統和「人物群像圖」的薩滿內涵，凹穴、折線紋可能是早期薩滿教的產物。

縱覽康家石門子岩畫主體圖像的刻痕、風格和疊壓關係，筆者認為它應該不是在一個時期完成的，而是有一個製作的持續期並不斷添加；「對馬」的圖像年代較早，「人物群像圖」次之，其中「人物群像圖」中的人形在製作年代上還可細分。根據對康家石門子岩畫周邊考古遺存和考古學文化分析，筆者認為康家石門子岩畫主體圖像是距今 3000 年左右大型氏族公社宗教儀式的產物，是在遊牧與農業兼具的文化形態下產生的，表徵了氏族權利和生殖崇拜的思想，也是薩滿教的遺存。從表現風格上「人物群像圖」與中亞岩畫具有一定的文化關聯性，但由於新疆地區石器時代的文化及與中亞之間的關係尚不清晰，康家石門子岩畫與中亞岩畫之間具體關係和傳播路徑尚不可推判；動物圖像與寧夏、內蒙、甘肅及中亞存在著廣泛的聯繫都是遊牧文化的產物；凹穴、折線紋在全球範圍內有著廣泛的存在，是人類早期共同的意識觀念的產物。

在傳統的對於康家石門子岩畫的研究中皆專注於「人物群像圖」，本研究彌補了該岩畫點其它圖像的調查，將其納入康家石門子岩畫的範疇，從更為「整體」的視角對這一岩畫點進行調查研究。根據岩畫的製作痕跡和風化程度，筆者認為康家石門子岩畫中凹穴、折線紋較為古老，但與「人物群像圖」之間的年代關係尚不好確認，也不排除凹穴與折線紋可追溯至距今萬年的可能性。根據現有的研究資料「人物群像圖」基本斷代為距今三千年左右的塞人遺存，但在群像圖中仍有年代的早晚關係；另外「對馬」、老虎的年代可能早於人像。康家石門子岩壁西側和岩廈大石的岩刻動物圖（不包含「對馬」和老虎）在距今一兩千年，甚至更晚近一

些；當然，這些動物圖像我們還可以細分出更多的風格類型對應不同的時間區間和文化。彩繪岩畫與岩刻分屬不同的體系，其準確年代有待於釉系等科學斷代的測定，根據目前的資料綜合判斷其年代晚於凹穴和折線紋，早於岩刻動物，與「人物群像圖」中的彩繪部分的早晚關係尚不能準確判斷。

年代的早晚不應成為評判岩畫價值的唯一標準，無論是人類早期的岩畫還是較為晚近的岩畫，都是當時生活的人們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反映。一個地區岩畫的製作往往是一個「時間段」而不是一個「時間點」，這個時間段可能會持續上千年，即岩畫的製作在某一地可能是具有長時間的傳承和延續過程。因此在分析的時候要避免圖像和時間的「錯構」，「岩畫在製作時間上的延續性」要求從「歷時」的角度結合生態變遷和社會歷史文化的演進，把岩畫的圖像風格和意涵看成是流動的、變化的。這不僅在分析區域岩畫時應該關注，在分析某一岩畫點或某一幅圖像等小範疇的岩畫（圖像的疊加關係）時也尤為不能忽略。同時，由於新疆的地緣位置連接亞洲大陸的東西，自古眾多族群依天山道、準格爾盆地邊緣、阿勒泰山道而遷徙，各文化要素流變交匯形成了豐富的物質遺存樣貌，對康家石門子岩畫的研究要注重岩畫區域間的「共時」關係。從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人形中可以看出與中亞文化之間的關係，彩繪岩畫與阿勒泰、藏青彩繪之間的關係，動物岩畫在整個歐亞草原及中國西北地方動物岩畫中的關係。岩畫研究需要以科學實證的態度通過不斷的交叉互驗，使其無限接近岩畫所在創作年代的「真相」，去嘗試著理解當初創作者的「情感」與「意圖」，以及岩畫創作儀式的情景與過程；才能更好的在當代社會結構中推動岩畫價值的發掘，使作為古老物質文化遺產的岩畫在當代綻放光彩。

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岩畫的價值

康家石門子岩畫具有高度的藝術審美價值和歷史文化價值，基於此在當代社會具有較高的旅遊開發意義，因加大宣傳力度和保護力度，讓廣大群眾受益於岩畫的歷史文化和審美薰陶、激發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強化文化構建共同體意識。

康家石門子岩畫的藝術審美價值

岩畫是一種人類最古老的「原始視覺語言」（Primordial Visual Language）。³² 史前岩畫就是現代文明的「源頭活水」，中國史前審美意識主要通過先民的造物、繪畫體現出來，特別是通過岩畫這種形式將先民的內在審美意蘊和外在對生活熱情洋溢的讚頌鮮明生動地表現在畫面上。³³「岩畫揭示了人類的抽象、綜合和理想化的思維能力。」³⁴「岩畫是靠著藝術想像力使情感具象化。處於原始時代的人類，無公害的污染，無人為的羈絆，任想像力自由馳聘。他們所創造的原始藝術，淳樸無話，猶如陳年的醇酒，流香日溢。絕非現代藝術所能比擬。」³⁵ 它的線條、造型、敘事等形式以及意象等方面的特點，時時刻刻地都被後代人所借鑒。

康家石門子岩畫造型簡潔、抽象、充滿象徵意味，是早期先民精神生活的表現，創作者利用線條、排列、均衡、對比、變化、節奏、對稱、疏密、抽象等手法創構出「具有意味的形式」；表達著他們對於繁衍生息的力量、對於現實生活的描繪、對於理想世界的塑造。康家石門子岩畫在審美上具有線條之美、造型之美、敘事之美和抽象之美。

康家石門子岩畫的線條之美，康家石門子岩畫基本由線條繪製而成，以線寫形、以線成面，無論是其主體的人物圖像還是非主體性的動物圖形在跨越幾千年的延續中，都是以線條的形式對圖像進行表現。粗狂有力、簡潔概括的線條呈現了先民對現實物象的生命體驗和情感抒發，通過高度的提煉和概括形成「有意味的形式」。正如宗白華先生所說的那樣：「以最簡單的線條結構表示宇宙萬象的變化節奏。」³⁶ 以最古老的老虎圖像為例，以弧線勾勒出老虎的外形，以折線形成虎身的紋飾，耳朵呈兩個並列的三角形，尾巴呈向上彎曲的半圓弧形，突出的生殖器與身體呈現出

³² （意）埃馬努埃爾·阿納蒂（Emmanuel Anati），《世界岩畫-原始語言》，張曉霞、張博文、郭曉雲、張亞莎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12。

³³ 劉程，《中國史前岩畫藝術的審美特徵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20年，頁44。

³⁴ （意）埃馬努埃爾·阿納蒂，《世界岩畫：原始語言》，頁3。

³⁵ 陳兆復，《古代岩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頁4。

³⁶ 宗白華，《宗白華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109。

「打破」關係。畫面在弧線與折線、穩定的三角形和動感的弧形、身體的整體性與生殖器的突出感之間畫面節奏十足，一隻老虎躍然石上，加之古樸的鑿刻痕跡，猶如它穿越時空從遠古向我們奔跑而來。

康家石門子岩畫的造型之美，蓋山林先生在《中國岩畫學》一書中認為：岩畫藝術家極力促使自己的視線與被觀察之物保持垂直性，所以，原始先民常常以側面來表現動物，以正面去呈現人面或者人物的造型形態。³⁷ 在康家石門子岩畫中，正是遵循了這一規律；人像皆以正面呈現，動物圖形皆以側面的形式呈現。在人形圖像中用倒三角形表現上身、用菱形表現下身、上肢或上或下地揮舞著、所塑造出來的造型有著很強的動態韻律。在康家石門子的動物造型中，皆是用線條勾勒的側面剪影。其中「對馬」和老虎身上有線條，具有裝飾意味和強烈的符號化特徵；羊、鹿等只刻畫了外輪廓，以簡潔的筆法生動形象的表達了動物的輕快動態。

康家石門子岩畫的敘事之美，康家石門子岩畫用最原始的鑿刻技術通過線條組成的形體表達原始時代族群祭祀的場景和舞動的情節。呈現出盛大的祭祀活動場景，描繪著原始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生命活力。人形是康家石門子的主體圖像，呈正面造型，宗白華說：「正面畫多與觀者相對，與觀者發生關係，又含有做作狀態；……正面畫像的眼光，為觀者眼光所阻，故其眼光極為近的。……正面像表現 active 之狀態，眼光與觀者相接觸，能振動觀者意志。」³⁸ 在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無論望向哪一個人形，這個人形似乎都在注視著觀者，可通過「眼神」進行情感的交流。

康家石門子岩畫的抽象之美，德國心理學家 W·沃林格在《抽象與移情—對藝術風格的心理學研究》一書中認為：「原始藝術本能是把純粹的抽象作為在迷惘和不確定的世界萬物中獲得慰藉的唯一可能去追求的，而且原始藝術本能用直覺的必然性從自身出發創造了那種幾何抽象，這種幾何抽象是人類唯一可及的對從世界萬物的偶然性和時間性中所得解放的完滿表達。」³⁹ 由於這些幾何符號直接指向的是原始社會中的現實造

³⁷ 蓋山林，《中國岩畫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5 年），頁 247。

³⁸ 宗白華，《宗白華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569。

³⁹ （德）沃林格，王才勇譯，《抽象與移情—對藝術風格的心理學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42。

型，憑藉著先民對現實造型的抽象概括和構思能力，它們可以幫助先民模擬現實中的具體物象，在客觀物象與反映它的幾何符號之間架構起一種間接性的物象對應關係。⁴⁰ 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人形和動物都由抽象的線條和幾何造型構成，有著高度的概括與凝練，在極簡的形式中體現了豐富的內涵。

康家石門子岩畫的歷史文化價值

正如王炳華先生所言：「從我們接觸到的資料看，康家石門子岩畫如此大型雕刻畫面，在國內，是目前僅見的一幅；從世界範圍看，也未見到如此宏大規模、明白清晰的有關原始社會生殖崇拜的畫面的報告。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這在新疆地區已見的岩畫資料中，是十分值得注意，需要特別保護的一處遺跡，具有重大的科學價值。它清楚表露的十分豐富的思想內涵，在研究原始社會史、原始思維特徵、原始巫術與宗教、原始舞蹈、原始雕刻藝術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許多學科領域，都具有不可輕估的意義。形象一點說，它是當之無愧的雕鑿在天山岩壁上的，原始社會火氣的一頁思想文化史！因為沒有後人的潤色、增刪，還保留著原始社會晚期當年人們的樸實、純淨，現實著他們的追求、祈禱，記錄著他們野性的呼喊與歡樂，表現著他們的美學追求與藝術實踐，猶如攝、錄像一樣保留著他們當年的生動形象……這就較之任何古樸的文字，都更為明白、清楚地顯露了它的思想內涵。」⁴¹ 康家石門子岩畫因其稀缺性成為史前文化中不可代替的遺址，生動的人形和動物組成大型的敘事場景，是先民們對宗教儀式的摹寫，記錄著早期社會的文化樣貌，對康家石門子岩畫的研究有助於更好的理解史前社會的祭祀儀式、社會形態、宗教信仰；也是舞蹈、美術史中不可多得的珍貴材料。

黃文弼在《高昌陶集》序言中寫道：「吾人相信東西文化之推進，確曾經過新疆，新疆如水管，一方為水塔，一方為龍頭，水塔之水，必須經過新疆，然後至龍頭。故吾人欲研究東西文明之推進，非在新疆尋覓痕跡

⁴⁰ （加）吉納維芙·馮·佩金格爾，《符號偵探：解密人類最古老的象徵符號》（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年），頁217。

⁴¹ 王炳華，〈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生殖崇拜岩雕刻畫〉，《昌吉岩畫》，《昌吉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二輯，1990年，頁131-132。

不可，此為無可懷疑之事也。」⁴² 新疆自古以來作為東西溝通的要道和歐亞草原上的重要一環，文化多樣性遺存豐富。以康家石門子為代表的新疆岩畫數量豐富、風格多樣、兼具岩繪和岩刻、製作時間跨度大從上古時代到歷史時期皆有，與中國西北的青海、寧夏、甘肅、內蒙；與俄羅斯和中亞諸國在岩畫的造型、風格、彩色、主題上既有聯繫又有差異。由於新疆自古就是東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和橋樑，位於十字路口的康家石門子岩畫展現了多文化交融、匯合的形貌。在史前民族遷徙、文化交流方面都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康家石門子岩畫的保護與經濟旅遊價值

康家石門子岩畫數千年來在風侵雨浸之下能夠保存下來，且圖像相對清晰，未泯滅於茫茫歷史長河之中已實屬不易。康家石門子岩畫於 1990 年成為新疆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2013 年成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已經建設成集保護、研究、旅遊、宣傳為一體的景區，圖像週邊建設有防護網。康家石門子岩畫，特別本文所討論的主體圖像位置距離地面較高，不易造成人為破壞，崖壁兩側修了引水槽，雨水和積雪融水通過引水槽可流至地面，避免了水浸對畫面和色彩造成的傷害。目前，康家石門子岩畫最主要的風化原因是新疆地區風沙較大造成的風蝕以及晝夜溫差、季節溫差造成岩體的張力變化容易導致岩面產生裂隙或剝落。

康家石門子良好的保護措施，使得岩畫圖像至今清晰可見，為開發經濟旅遊價值打下了基礎。天山從帕米爾高原巨大的造山運動中奔逃而出平均海拔 4000 米，在雪線之上，水資源豐富；康家石門子岩畫處於海拔 1300-1800 米之間的低山濕潤草甸地帶，源自天山融雪的呼圖壁河、雀兒溝河縱橫南北，河水終年流淌滋潤著大地。這裡山戴雪冠、林木蒼翠、冰川密佈、河溪發育、自然環境宜牧宜農，康家石門子岩畫所在的山系阻擋了西北的寒風，使山下的草甸草場就算遇到大雪的嚴冬也綠草茵茵，形成了理想的冬季牧場。站在丹霞地貌形成的山頂眺望，星星點點的氈房、珍珠一樣的羊群、奔跑的駿馬、彷彿是天堂裡的畫面。康家石門子岩畫周邊山水景色優美，牧民生活其中，可連帶開發整合成旅遊資源，以此拓展康

⁴² 黃烈編，《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頁 109。

家石門子岩畫的文化價值和知名度，強化其歷史文化的教育意義；並可開發成學生、黨員、各類團體的歷史文化教育和美育實踐基地、使其教育和保護、文化歷史和經濟實踐形成良性的迴圈。

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岩畫與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是指個體或群體對自己所遵循的文化符號、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念等所進行的一種回應和確認。文化認同更多表現在對歸屬文化的價值肯定與認同。文化是一種符號，公民通過對這些符號體系的記憶與認可，從文化象徵意義上將國家發展歷程中的符號在情感上進行反復確認，從而給心理找到歸屬，形成對自己國家的認同。國家通過對文化的有意識建構，把國家概念深深根植全體公民共同價值觀念中，促使形成公民一致的情感表達和國家認同。康家石門子等新建歷史文化遺產，是新疆文明的物質遺存，是這一區域文化認同的重要載體，並應通過文化實踐者的能動性將區域文化認同整合進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之中。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文物是歷史記憶的載體，而歷史記憶被認為是凝聚族群認同這一根本情感的紐帶；康家石門子岩畫等新疆岩畫是這一區域遠古先民的精神和物質雙遺存。在康家石門子岩畫中人形群像展現了男女交媾、宗教儀式、祭祀歌舞，畫面中造型誇張的身體和生殖器表達著對繁衍生息的渴望、部落人口興旺的祈願；老虎、鹿、羊等動物圖形展現了當時人們以狩獵為生的圖景。畫面描摹性和敘事性兼具，古樸生動的鑿刻痕跡在岩壁上表達著當時的社會文化生活和祭祀信仰；是我們追溯祖先起源和理解部落社會的重要通道。梁啟超說：「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⁴³ 錢穆說：「斷斷無一國之人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而其國其族猶可以長存於天地之間者。」⁴⁴「故欲知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以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⁴⁵ 深入發掘康家石門子等新疆物質文化遺產的歷史文化意義，推動構建區域文化認同和文化自豪

⁴³ 梁啟超，《梁啟超史學論著四種》（長沙：嶽麓書社，1998年），頁241。

⁴⁴ 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引論：頁33。

⁴⁵ 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上），引論：頁3。

感，並將其作為中華文明重要的組成要素，以深厚的歷史底蘊支撐社會主義文化自信。

從民族融合的角度而言，由於新疆的地緣位置連接亞洲大陸的東西，自古眾多族群依天山道、準格爾盆地邊緣、阿勒泰山道而遷徙，各文化要素流變交匯形成了豐富的物質遺存樣貌。康家石門子岩畫是上古先民文化的沉澱，是這一區域早期文化交流交往融合的見證。康家石門子岩畫的人像造型在甘肅、青海一帶的岩畫中可見其相似風格的遺存，尤其是頭戴尖頂帽的薩滿式人物形象在新疆地區的切木爾切克文化、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古墓溝—小河文化中都有出現，在阿爾泰山、天山、賀蘭山、陰山等地區岩畫中也有出現；根據推測這些人物形象不僅時代相近，而且還存在著聯繫，可能具有共同的薩滿特徵的信仰底層。老虎的造型和製作手法在寧夏賀蘭山岩畫中可見相似風格的遺存；「對馬」的造型和製作手法在內蒙古陰山中可見相似風格的遺存；岩壁西側和岩廈大石的岩刻動物圖形與廣泛分佈在新疆和西北陰山山脈、賀蘭山山脈的動物岩刻在風格和造型比較相似，其年代也相當，是對遊牧生活的一種現實摹寫。康家石門子岩畫中的凹穴、折線紋圖像，在青海、河南有著廣泛的分佈，其中以河南的分佈密度最高。康家石門子岩畫是上古西域文化與寧夏、內蒙、青藏地區及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見證。攜刻在岩壁上的畫面，記錄中華大地早期文明的互動，彼此融合，從「滿天星斗」到「多元一體」，形成「最初的中国」。

從文化實踐者能動性的角度而言，文化是既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歷史積澱與記憶繼承，在人改造自然、社會和自身的過程中，日益形成的穩定性的行為方式和固定活動是文化的重要構成。許紀霖認為現代社會的文化認同應該是一種新的建構性認同方式，即不是靜態地對歷史或現實的文化價值的認定，而是以一種積極的、參與的、建構的方式，通過對什麼是好的共同體文化的開放性討論，比較各種文化價值的意義，在一種動態的過程中逐步構建共同體的文化認同。⁴⁶ 康家石門子岩畫，作為地方和國家重要的歷史文化資產，應積極實現文物資源國家認同的作用，通過將岩

⁴⁶ 許紀霖，〈文化認同的困境——9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反西化思潮〉，《文化與哲學》，1996年（5），頁102。

畫遺產參與地方文化治理過程中加強對於公民國民意識的引導和激發，促進觀者對該文化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提升地方文化的軟實力。康家石門子岩畫的審美價值、歷史文化價值、以及經濟旅遊價值的開發，要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交流機制、社會參與、媒介傳播和心理融合等多個路徑維度進行探索，構建出一套科學的增強文化傳播和文化認同強化路線；逐步構建出一套綜合性、可持續、可調整的實施機制。

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對於一個社會群體而言，文化認同的產生是建立在共同意識的營造上面的，這同時也是一種身份的界定。⁴⁷ 岩畫在製作之初就具有既能記事，又可成事的屬性，至今岩畫在文化教育方面仍發揮著「成事」的積極作用。在新疆對康家石門子等歷史文化遺產的發掘、研究、保護是促進「文化潤疆」進行認同建設的基礎要素。新疆歷史文化遺產作為「多元一體」格局中的要素，要充分挖掘其史學教育、審美教育的意義，在發揮文化實踐者能動性的動態過程中促進岩畫遺產的保護、宣傳與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建設。

⁴⁷ 趙旭東，〈文化認同的危機和身份界定的政治學——鄉村文化復興的二律背反〉，《社會科學》，2007年（1）：頁54-62。

嘸噠族屬蠡測

劉學鈞

前輔仁、中原兼任教授
中國邊政協會名譽理事長

摘 要

中世紀稱強於北亞之嘸噠其族屬如謎，向來各家有不同說法或云是白匈奴，或稱高車別部、或謂大月氏之種，也有直指係鮮卑之族，均未能成為定論，惟其源於金山之陽，初役屬於柔然，之後逐漸壯盛，進入廣義西域（今中亞），威服該地諸小國使之納貢稱臣，由是成為廣義西域之霸主，與波斯薩珊王朝展開長期戰爭，威震中亞；在漢文史傳中或稱嘸噠，或作挹怛、嚙噠、歇噠、挹闐、厭達、厭怛、滑……等，要皆其首領「厭滯夷栗陁」之省稱，而北亞大草原原是諸多游牧民族之大融爐，許多民族均為若干民族混融而成，對其族源，甚難作明確之釐清，即以中亞早住民族吐火羅而言，在十三世紀之後已不見蹤影，蓋已融入諸多入侵民族之中，本文擬就中亞民族混融，史傳上所見嘸噠試對其族源作一蠡測。

關鍵詞：嘸噠、柔然，大月氏、宋雲行記，突厥

前言——北亞草原為民族大融爐

所謂北亞或中亞，係指東起大興安嶺西側，西至鹹海甚至裏海以東、北起貝加爾湖一線，南至長城，在此一廣袤無垠地區，其地形、地貌乃至氣候均差異不大，在近代交通工具發達之前，其生活模式（也可稱之為文明或文化）均受生存空間自然條件之制約，儘管民族不同，但生活模式均

大致相同（如逐水草而牧，住穹廬善騎射……等），因此民族意識並不強烈，如某一民族強大時，其他民族往往皆自稱為某族，如匈奴強大時，西域諸引弓之民皆稱匈奴，之後鮮卑強大，草原上諸游牧民族又自稱鮮卑，突厥情況亦復如此。

在北亞大草原上諸多逐水草而牧之游牧民族，既然其生活模式因受自然條件之制約而大致相同，因此在語言詞彙上互相借用，乃成為必不可免之現象，我人絕不可因此而判定某族與某族因有若干詞彙相似或相同，遽而認定兩者同族，《史記》，兩《漢書》曾以漢字音譯十多個匈奴詞彙，且均為名詞，近代若干學者遂據此大作文章，以此等詞彙中有若干個與後世之突厥語相似，遂據而認定匈奴為突厥種；也有學者認為有若干詞彙與近代蒙古相似，遂徑而認定匈奴與蒙古同源共祖，與東胡肅慎之情況亦復如此，此種看法極不妥適、近代日本學者白鳥庫吉曾於其所著《匈奴民族考》一文中，¹ 列舉《史、漢》曾以漢字音譯匈奴詞彙「撐犁」、「孤塗或屠」、「單于」、「昌頓」……「暝蠡」、「服匿」等十七個匈奴詞彙，並加以分析：

（以所列十七個匈奴詞彙漢字音譯）屬於蒙古語者二、
 Turk 語者二，Tunguse 語者三，Turk 語 Mongol 語共通者一、
 Mongol 語 Tunguse 語共通者四，Mongol 語 Turk 語 Tunguse 語
 共通者五，故 Mongol 及 Tunguse 語言在匈奴語中多於 Turk
 語，是可據而知者。因 Tunguse、Mongol、Turk 三民族在 Ural-
 altai 民族中有極密切之關係，故此等語言，若究其語源，則互
 相類似，是理所當然者，毫不足怪也。職是之故，雖匈奴語中
 有二國語或三國語共通，亦不能斷定此民族為三民族之混合團
 體。²

¹ 《匈奴民族考》係 1939 年上海中華書局以《歷史叢書》之一以小冊子予以出版，原署編者為何健民（何氏來台後曾任省立博物館館長），在序文中並未指名原著及譯者為誰，但經詳查後，原著者為日人白鳥庫吉，譯者為何健民，又查知白鳥氏原著刊載於 1923 年巴黎《亞洲雜誌》第 202 期，原名《匈奴起源考》，後易為《匈奴民族起源考》，於 1923 年又刊載於日本《史學雜誌》第 18 期。此文復又輯入林幹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列頁 184~226。

² 見《匈奴史論文選集》，頁 212。

白鳥氏之看法是正確的，但有若干學者以匈奴語中有若干詞彙與突厥語同，遂斷定匈奴為突厥族，與東胡語、蒙古語情況亦若是，實不妥適，語言固然是民族識別條件之一，但絕非唯一條件，試看今日美國之非裔、亞裔、拉丁裔……均操美式英語，我人並不認同此等非裔、亞裔、拉丁裔均為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再看今天漢語中也有不少外來語之音譯如沙發、馬達、布丁、巧克力、蘇打……等，就認定漢人操印歐語？更不妥適者，認為匈奴語有若干詞彙與突厥相似或相同，遂認定匈奴為突厥族，此種祖孫倒置情況，極不妥切，充其量也僅可說突厥、東胡、蒙古可能含有匈奴之血胤（基因），絕不能說匈奴是突厥、東胡、蒙古族。

另者，對北亞草原上之游牧民族與游牧政權需分開看，以匈奴為例，必須將匈奴帝國與匈奴族分開看，匈奴族為匈奴帝國之統治民族，除單于外，許多重要官職必須由匈奴族出任如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等，在匈奴帝國內有許多被統治的非匈奴族，如丁零（即後來之敕勒、鐵勒、高車）、小月氏（未隨月氏西遷之月氏族稱小月氏，並與羣羌混融後，成為後盧水胡）、東胡甚至較西邊之塞種人，均成為匈奴帝國之人民，但並不是匈奴族。鮮卑、柔然（或作芮芮、茹茹、蠕蠕）、突厥盛時情況亦復如此。此外，在北亞大草原上民族混融之情況極為普遍，個別游牧政權統治者之體質特徵，不能被解讀為整個統治民族之體質特徵，如突厥乙息記可汗（名科羅），史傳稱其「狀貌多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瑠璃。」³其體質特徵確實甚為奇特，尤其「眼若瑠璃（同琉璃）」與黃種人（學名為蒙古利亞種，但易與蒙古族混淆，故稱黃種人）之體質特徵迥異，但絕不等於整個突厥族之體質特徵皆如此，此點相當重要，且進一步證明北亞大草原實為諸多生息其間游牧民族血胤混融之大融爐。

另外還有一點很值重視，在中古時代北亞游牧各政權派出之使者，未必就是統治者之同族人，甚至中原王朝也是如此，如北魏後期已是西魏時（實權操諸宇文泰手中），派往初崛起之突厥之使者，既非鮮卑人，也非漢人，而是酒泉西域胡安諾槃陁為使⁴（安諾槃陁為來自今中亞昭武九姓之安國西域胡，寓居酒泉），由是可知北亞游牧政權所派出之使者，未必

³ 見《周書》卷五十《異域下·突厥傳》標點本，頁 909。

⁴ 見《北史》卷九十九《突厥傳》標點本，頁 3286。

與統治者為同族，因而也不宜從其所派出使者之容貌或體質特徵，據以判斷該游牧政權統治者民族之容貌或體質特徵。

以上所述諸點實為研究嚙噠之先決條件，如不能有上列認識，則對嚙噠之研究或將「誤入歧途」。

見於記載之嚙噠

嚙噠如同謎一樣，無論中國史傳或西方文獻，對此族之記載，均語焉不詳，以漢文文獻而言，就有不同寫法，茲以表列方式呈現如次：

名稱	出現文獻
嚙噠	魏書
滑	梁書、南史
嚙噠	周書
挹怛	隋書、新唐書
歇噠	洛陽伽藍記
挹闐	西番記
厭達	西陽雜俎
悒怛	冊府元龜
厭怛	續高僧傳

雖然有如此多不同字之音譯，除《梁書》作「滑」外，其餘雖用字不同，實皆讀音相近，應係一音之不同諧譯，至於《南史》、《梁書》作「滑」，也有所本，據《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稱：「（東漢）順帝永建元年（順帝劉保首個年號，元年為西元 126 年），（班）勇率（車師）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班勇係班超之子，時為東漢西域長史），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北虜指匈奴），破之，（班）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為（車師）後王」八滑為（車師）後部親漢侯。」⁵

按八滑係車師後部貴族，據《南史》卷七十九《夷貊下，滑國》直認滑國為西域車師後部，《南史》對「滑」有如下之記載：

⁵ 見《後漢書》標點本，頁 2930。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班）勇上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天監十五年（天監為梁武帝蕭衍年號，其十五年為西元 516 年），其王厭帶夷栗陀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普通亦梁武帝年號，元年為西元 520 年），遣使獻黃師子（即獅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西元 526 年），又奉表貢獻。

魏之居代郡（魏，指鮮卑拓跋部所建之魏），滑猶為小國，屬蠕蠕（即柔然），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渴盤陀、罽賓、焉耆、龜茲……等國，開地千餘里。……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為帶。女人被裘，……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為居，東向開戶。……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為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言語待河南人譯而後通。

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又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⁶

此項史料對滑國情況，有頗為詳細之描述，其中尤值注意者，其一為兄弟共妻，其二為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所謂河南人，係指吐谷渾而言，以其聚居於黃河之南，故有是稱，也見《南史》標點本頁 1977，而吐谷渾者，初為人名，乃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因所部與慕容廆所部門馬，慕容廆曾斥責之，吐谷渾憤而率其所屬七百家（或云一千七百家）西走，落腳於今青海湖黃河之南，威服群羌，至其孫葉延在沙州（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南縣），建立慕克川總部，置司馬、長史等官，乃以祖吐谷渾之名為「國號」，《南史》《梁書》稱之為河南人，其所操之語言，當為鮮卑語，不過吐谷渾與羣羌混雜而處，其語言必然混入頗多羌語，是則滑人之語言或為鮮卑語，或為羌語。

按《南史》係唐李延壽所撰，《梁書》係唐姚思廉所著，在年代上較

⁶ 見《南史》標點本，頁 1984。

《魏書》為晚（《魏書》為北齊魏收所撰），嚙噠最早見於正史為《魏書》，此書有關嚙噠之記載為卷一百二《西域傳·嚙噠》稱：

嚙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金山即今之阿爾泰山，位於新疆東北近外蒙古），在于闐之西（于闐，今新疆和闐），都烏許水南二百餘里（烏許水，今阿姆河）……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俗兄弟共一妻，……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眾可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為屋，夏遷涼土，冬就暖處。……其人兇悍，能鬥戰。而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為大國。與蠕蠕婚姻。

自太安以後（太安為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年號，西 455～459 年），每遣使朝貢。……永熙以後（永熙為西魏孝武帝元修年號，西元 532～534 年），朝獻遂絕。⁷

《魏書》所載嚙噠情況與《南史》、《梁書》大致相同，按在西元四世紀之前，匈奴始終為北亞草原上最強盛之游牧武力，致使若干游牧民族冒稱匈奴以自壯，嚙噠初役屬於柔然「猶為小國」，其後稍壯盛，自金山而南進入西域，乃冒稱匈奴，西方文獻以嚙噠人膚色較為白皙，遂稱之為「白匈奴」，顯然已知其非匈奴，雖然嚙噠人較為白皙，但絕不能以此就認定其白種人（學名為高加索種），須知鮮卑族慕容部也以皮膚較為白皙，而稱之為「白虜」，但鮮卑乃是東胡，其為黃種人已是定論，不能以其膚色較白而指其為白種人。

《魏書·西域傳》早已亡佚，經宋時劉恕等兼採《北史》等史傳加以補充（詳見注 7），成為今本之《魏書·西域傳》，已非魏收原著之樣貌，經大陸知名學者余太山詳細比勘後，認為其原貌應是：

嚙噠國，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至高

⁷ 見《魏書》標點本，頁 2278～2279。但魏收原著《魏書·西域傳》在唐宋間已亡佚，今本《魏書·西域傳》係宋仁宗趙禎嘉祐六年（西元 1061 年）由劉恕等人採《北史·西域傳》補入，而《北史》又係取材於魏、北周、北齊、隋各代正史，今人余太山認為應是：「嚙噠國，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至高宗時已八、九十年矣（高宗係北魏文成帝），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認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

宗時已八、九十年矣。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⁸

凡是史傳所稱「別種」或「別部」者，已表明其非同類，此處稱「嘸噠國，高車之別種」也等同指明其非高車（按高車係丁零、敕勒系民族），如是可知嘸噠非敕勒系民族，上引余氏整理後之《魏書·西域傳》如屬正確（本文認為應為正確），據之推算，從源出塞北，自金山而南，至北魏高宗時已八、九十年，接北魏高宗即文成帝拓跋濬（西元 452～465 年在位），嘸噠首次朝魏為文成帝太安二年（西元 456 年），如往上推九十年約為西元 366 年，且再看《魏書·西域傳·粟特國》：

粟特國，在蔥嶺之西，……一名溫那泣，……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⁹

嘸噠西徙後，冒稱匈奴，一般而言以三十年為一世，九十年恰為三世，因此上引「匈奴」殺粟特國王而有其國的「匈奴」，應不是匈奴，而是嘸噠，此項推測應可成立，依同書同傳「悅般國」所載：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為（東）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在今中亞薩馬爾罕之北），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龜茲，今新疆庫車屬阿克蘇地區是則前段「在烏孫西北」，應為「在烏孫之南」）。地方數千里，眾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¹⁰

可見被東漢竇憲擊破之北匈奴，向西過康居再向西北越過奄蔡（阿蘭聊）與當地土著民族混融，而後西向歐洲，其羸弱不能西去者，留住龜茲，建立悅般國，並未在今中亞停留，因此《魏書》所載滅殺粟特國王者，不是匈奴，而是嘸噠。至於《隋書》卷八十三《西域傳·挹怛》的記載略為：

挹怛國，都烏汧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兄

⁸ 見余太山《嘸噠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頁 15。

⁹ 見《魏書》標點本，頁 2270。

¹⁰ 見《魏書》標點本，頁 2268。

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為角。¹¹

以上各史傳所載錄嚙噠（挹怛）之情狀，多為輾轉抄錄，惟有北魏後期孝明帝元詡時（西元 516～528 年在位，但其時由胡太后掌握實權），命敦煌人宋雲與僧人惠生於孝明帝神龜元年（西元 518 年）冬十一月出使西域，於次年十月初入嚙噠國，曾面見嚙噠王，宋雲東返後，將見聞錄為行紀，史稱《宋雲行紀》，但此書已亡佚，幸北魏季世陽銜之（一般均作楊銜之）¹²在其所著《洛陽伽藍記》一書，在該書卷五《城北》中將《宋雲行紀》全文輯入，此為首次直接與嚙噠人接觸之記錄，可稱之為「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茲將之引錄如次：

（神龜二年西元 519 年）十月之初，至嚙噠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為屋，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為一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此國不詳，或謂今之鐵爾胡忒 Tirhut），北盡勅勒（即敕勒），東被于闐（今和闐），西及波斯（今伊朗），四十餘國皆來朝賀。（嚙噠）王張大氈帳，方四十步，周迴以氈毼為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四金鳳凰為牀腳，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惟有此法，不見音樂。

嚙噠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帶一角（帽、帶同戴），長八尺，奇長三尺（奇同袞），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為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有角，團圓垂下，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

四夷之中，最為強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煞生血食，

¹¹ 見《隋書》標點本，頁 1854。

¹² 堅持為陽銜之之理，見拙撰〈從《洛陽伽藍記》看六世紀初華之中亞〉一文，該文輯入拙著《從古籍看中亞與中國關係史》（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9 年），頁 160～163。

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歌噠國去京師二萬餘里。¹³

以上為宋雲面見嘸噠國王之描述，其中「見大魏使人，再拜跪詔書」可視為宋雲自美之詞，嘸噠既是「四夷之中最為強大」，且「周迴四十餘國皆來朝賀」，似不可能「再拜跪受詔書」，當為宋雲上呈《行紀》時自美之詞。除此之外，其餘當係宋雲所親眼目睹者，應屬可信，但並未提及嘸噠有夫兄弟婚之俗，僅提到「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有角（指帽上有角）」。按宋雲係北魏後期之人，其出使西域在西元六世紀初，其《行紀》當完成於同一時代，而陽銜之係西元六世紀中葉之人，與宋雲係同時代略晚幾年，其所著《洛陽伽藍記》均早於《魏書》、《梁書》、《隋書》，因此其可信度應高於上述諸正史。諸正史均載嘸噠採行夫兄弟婚（或稱一妻多夫），按此制唯吐蕃（即藏族）中某些地區有此婚俗，以是遂有人據以推測嘸噠源於吐蕃，如近代史家呂思勉於其所著《兩晉南北朝史》一書即持此說。¹⁴按夫兄弟婚或一妻多夫，實由於經濟條件之制約，用一妻多夫制以抑制人口增加，不得已而採行之婚制，而嘸噠「四夷之中，最為強大」、「周迴四十餘國皆來朝賀」，應無經濟困難問題，且《宋雲行紀》僅稱「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有角……」並未如《隋書》所說：「兄弟共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為角。」此所以稱嘸噠行夫兄弟婚者，或因《南史》曾稱滑國「少女子」遂想當然演繹出「兄弟共妻」之說，縱使嘸噠果真「少女子」，但以其「四夷之中最為強大」，大可從別國娶女子，無需採一妻多夫制，因此本文懷疑嘸噠一妻多夫之說為不可信者。此外，據《隋書》、兩《唐書》所載西域昭武九姓諸國也無一妻多夫之說。

嘸噠族源蠡測

嘸噠為謎一樣之民族，其族源可說是眾說紛云，莫衷一是，約略而言可歸納為：月氏說、高車說、車師說、康居說，柔然說，匈奴說、突厥說、伊朗說等，茲分別略為析說如次：

¹³ 見陽銜之《洛陽伽藍記》（臺北：華正書局，1980年），頁298。

¹⁴ 見呂著《兩晉南北朝史》（臺北：開明書局，1974年），頁876～879。

（一）月氏說

此說首見於《周書·異域傳下》稱：「嚙噠國，大月氏之種類，在于闐之西，……刑法、風俗與突厥略同。」¹⁵《隋書·西域傳》稱：「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里，大月氏之種類也。」（見注 11），按大月氏乃月氏在漢初匈奴擊破原聚居於敦煌、祁連一帶，西徙今新疆西北伊犁河一帶者，稱之為大月氏，之後烏孫在匈奴支持下，再擊大月氏，復西遷入今中亞兩河之地，滅大夏而有其地，建大月氏國，都於今阿姆河南之藍氏城，張騫曾到其地停留年餘，大月氏雖佔有河中地區，但在人數上未佔優勢，仍委由當地五個翕候統治，未久，五翕候中之貴霜翕侯併吞其他四翕侯，建立貴霜王朝，取代大月氏而統有廣義之西域，但漢文史傳仍稱之為大月氏國，月氏之族，據當代學者余太山研究，認為是塞種，¹⁶而塞種乃是操印歐語系之白種人，則此說等同指嚙噠為白種人，也即與伊朗說同，大陸學者馬小鶴撰有《嚙噠族屬伊朗說》，¹⁷其所持最大論證為：嚙噠人皮膚較為白皙、嚙噠錢幣上之嚙噠王頭像，類似白種人。本文首節已提出北亞大草原為諸多游牧民族血胤大融爐，且鮮卑慕容部也因膚色較為白皙，而被稱為「白虜」，以膚色作為識別民族之條件，並不可靠，如印度人普遍膚色偏黑，但其為白種人；再以錢幣上嚙噠王頭像之體質特徵，類似白種人而言，北亞大草原既為許多民族血胤之大融爐，某幾個人體質特徵類似白種人，不等同整個民族都是白種人，本文首節也提到突厥乙息記可汗其體質特徵異於一般突厥人，絕不能指整個突厥族都是如此；且《南史》稱滑國（即嚙噠）人「其言語待河南人（指吐谷渾）譯然後通」，語言雖非識別民族的唯一條件，但確是一重要條件；在《宋雲行紀》中，宋雲面見嚙噠王，如嚙噠王體質特徵具有白種人「深目、高鼻、多鬚之特徵」，當會記錄下來，但在《行紀》並未提到其體質特徵，可見其容貌與一般黃種人無甚差異，故而未提；綜而言之，指嚙噠人與大月氏或伊朗人同，實難成立。

¹⁵ 見《周書》標點本，頁 918。

¹⁶ 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頁 52～69。

¹⁷ 此文輯入馬著《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429～479。

（二）高車說

高車為敕勒（丁零）之族，按丁零分佈地域極廣，大抵東起貝加爾湖，西至鹹海甚至裏海，南抵長城，在貝加爾湖一帶者為東丁零，在西邊者為西丁零，盜蘇武羊者為東丁零，此一民族內涵極為多元，據《魏書》卷一百三《高車傳》稱：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勅勒，
諸夏以為高車、丁零……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¹⁸

此段史料應注意者乃「北方以為勑勒（按即敕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按《魏書》係北齊魏收所撰，其實自北魏孝文帝全面華化後，早已自認乃是華夏正統，而視南朝「島夷」，因此魏收《魏書》所謂「諸夏以為高車……」之諸夏乃指北朝而言，並非習慣上之諸夏（指漢人所建之王朝），此點以往鮮少有人注意到，且北朝時與敕勒接觸（含戰爭、受降或交易）如高歡手下大將斛律金即為敕勒人，且吟出《敕勒川》之歌，因此知敕勒人俗乘高輪車，故稱之為高車；南朝因地理之阻隔並未直面敕勒人，不知其俗乘高輪車，多稱之為鐵勒，此也為吾人應注意者。

高車在地緣上確與嘸嗟有關（《魏書》指嘸嗟原出於塞北），但《魏書》又稱「其（指嘸嗟）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見注 7），又明言嘸嗟「亦曰高車之別種」。既是「別種」，等於說嘸嗟不是高車，何況兩者語言也不同，因此高車說亦不成立。

（三）車師說

此說緣於《梁書》·《南史》稱嘸嗟為「滑國」，據《梁書·西北諸戎傳》稱：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漢元年（東漢順帝劉保年號，永建元年為西元 126 年），八骨從班勇擊北虜有功（班勇係班超之子，時任東漢西域長史；北虜指匈奴），（班）勇上八滑為（車師）後部親漢候。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天監十五年（天監為梁武帝蕭衍年號，其十五年為西元 516 年）其

¹⁸ 見《魏書》標點本，頁 2307～2308

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

關於八滑事蹟本文第二節曾引《後漢書·西域傳》有所說明，於此不贅，可能《南史》或《梁書》將車師後部特定人物「八滑」，誤認為是一個部落，而將八滑省稱為滑，認為是嚙唃之先，並進而稱六世紀初之王為厭帶夷栗陁遣使南朝梁貢方物。

此說欠妥，《梁書》稱「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前文已提到凡史傳上提到某族之別種或別部，即以表明其非某族，而車師（今庫車）乃是吐火羅人，係操印歐語系之白種人，嚙唃人膚色雖較為白皙，如同鮮卑慕容部之較多白皙，但仍為黃種人，「滑國」人苟如《梁書》、《南文》所稱為車師之後裔，則其操印歐語系之吐火羅語，但《南史》又稱：「其（滑國，即嚙唃）言語待河南人（即吐谷渾）譯而後通」，豈非前後矛盾。《梁書》或《南史》所以如是記載既非來自滑國使者，也未注明其依據所在，今人余太山推測或係來自裴子野之憶測，以八滑為滑，¹⁹而《梁書》竟採其說，而《南史》因襲之，可見嚙唃源於車師之說全無可信之處。

車師說既不可信，則康居說更不可信，此說見於唐杜祐《通典·邊防典九·西戎五》、《嚙唃（挹怛國）》條，引韋節《西番記》云（韋節西元 497～569 年，字處玄，號華陽子，京兆杜陵人，今陝西西安，北魏宣武帝元恪時任東宮侍書）：

親問其國人（其指嚙唃），並自稱挹闐，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闐抄其後重，此或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年代綿邈，莫知根實，不可得辨也。²⁰

按《漢書》卷七十《傳常鄭甘陳段傳·陳湯條》載陳湯伐北匈奴郅支單于事，其原文為：

……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烏

¹⁹ 見余太山《嚙唃史研究》，頁 18，又裴子野（西元 469～530 年），字幾原，河東聞喜人，今山西省運城市聞喜縣，為南朝梁時人，撰有《方國史圖》，《梁書》有傳，稱「又漢定遠候虜，八滑從，此其後乎？（此指滑國）」，可見出於憶測。

²⁰ 見李錦繡、余太山著《通典西域文獻要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182～183。

孫)大昆彌千餘人，驅畜產甚多。²¹

韋節誤將抱闐作挹闐，一字之差失之千里，康居說之不可信於焉可知。

(四) 柔然說

本文首節曾提到匈奴帝國與匈奴族要分開看，同理柔然汗國²²與柔然族也應分開看，接柔然汗國盛時，汗國內有許多不同之游牧民族，如敕勒、高車，突厥（為柔然鍛制武器，柔然視之為鍛奴），嘯嗟乃至西域許多綠洲國家，均受柔然統治，因此如嘯嗟源於柔然汗國，實毫無意義；如指嘯嗟與柔然族同源共祖，則找不到任何證據。據《魏書》卷一百三《蠕蠕傳》稱：

蠕蠕，東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神元指鮮卑拓跋部先祖力微，相傳在位五十八年，其時代約在曹魏至司馬晉時，見《魏書·序紀》，標點本頁 3~5），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氏，……穆帝時（穆帝為拓跋猗盧，約在西元四世紀初），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眾，自號柔然，而役屬於國（指鮮卑拓跋部）。²³

可知柔然之木骨閭（郁久閭）本身為鮮卑族，但其「收合逋逃得百餘人」，未必都為鮮卑族，至車鹿會時，始有部眾，更不可能均為鮮卑族，及至社侖稱丘豆伐可汗，其所部更是龐雜。何況《魏書·西域傳》明指「其（指嘯嗟）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因此柔然說也不能成立。

(五) 突厥說

關於突厥族，實為敕勒之一支，只是崛起強大後自稱「突厥」，有強大、剛毅，成熟與旺盛之意，一如匈奴自稱是天之驕子一樣，之後此支敕

²¹ 見《漢書》標點本，頁 3011。

²² 可汗一詞為柔然社侖所首創，等同之前匈奴之單于，時為西元 402 年，從此始有汗國一詞。

²³ 見《魏書》標點本，頁 2289。

勒系民族遂稱為突厥，及其建立東、西兩大汗國後，許多草原游牧民族皆冒稱突厥族，至今中亞地區各民仍自稱為突厥族，至於突厥族之源起，有：狼之子孫說，源於索國之狼說、平涼雜胡說、海神後裔說及高昌北山狼裔說等，²⁴在地緣上與嚙嚙之源出塞出，自金山而南，頗有關聯，遂指認嚙嚙源出於突厥，按《魏書》僅稱「嚙嚙原出塞北，自金山而南」，並未指出塞北何處，「自金山而南」也僅是指經今阿爾泰山而南下，並未稱停留於金山，而突厥是否源出於金山，至今尚未成為定論，蓋敕勒系民族分佈地區極為寬廣，絕不止金山一處，最大問題是嚙嚙早於突厥登上政治舞台，指嚙嚙源於突厥，乃是祖孫顛倒之說法，顯不妥適，西人泰伯里（Al-Tabari）更稱巴赫蘭五世時入侵薩珊波斯的嚙嚙人為突厥人，²⁵按突厥崛起後，曾聯合波斯攻擊嚙嚙，待攻滅嚙嚙後，始有攻打波斯之事，泰伯里之說時序顛倒，不可信。

雖然《周書·異域傳下》稱：「嚙嚙國，大月氏之種類，……刑法、風俗與突厥略同。」本文首節提到在近代交通工具發達前，各民族之生活習俗，均受其生存空間自然條件之制約，北亞大草原其面積雖極寬廣，但地形、地貌差異不大，因此民族雖眾多，但其生活模式均大同小異，僅「刑法、風俗與突厥略同」而斷嚙嚙為突厥，實無說服力。

（六）其他各說

有些論者認為嚙嚙為匈奴，此說不確，蓋在北亞大草原上如某族強大，就有若干游牧族冒稱某族，匈奴乃是早期北亞大草原上最強大之游牧政權，以致諸引弓之民皆號匈奴，嚙嚙也冒稱匈奴，西方以其膚色較為白皙，而稱之為白匈奴，可見已明知其非匈奴，此說無可信之處。另有些人認為嚙嚙源於蒙古，此說除祖孫顛倒之外，更忘了蒙古乃亞洲最晚登歷史舞台之游牧民族，嚙嚙被突厥攻滅時，蒙古（兩《唐書》稱之為蒙兀或蒙瓦）尚處於諸多室韋中之一部，仍為初民時代，且蒙古初期生存空間在今額爾古納河（內外蒙交界處，為黑龍江之上游），與嚙嚙之地理位置相差太遠，無論在時間或空間上嚙嚙與蒙古均無交集，兩者應無任何血胤上之

²⁴ 關於突厥起源詳情，可參見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2年），頁39～42。

²⁵ 見余太山《嚙嚙史研究》，頁22。

關係。又或者諸史均提到噉噉行一妻多夫制（夫兄弟婚），與吐蕃某些地區相類，而認為噉噉與吐蕃同族，其實《宋雲行紀》並未提到噉噉行夫兄弟婚，且上文對此已有分析，於此不贅。

本文首節曾提到北亞草原乃是民族之大融爐，對許多民族已難於追溯本源探究其族源，如蒙古鐵木真崛起後，攻滅操突厥語系之克烈、乃蠻及諸多林木中百姓，此等被征服之諸多民族漸次蒙古化，而成為蒙古別支，其中克烈部成為衛拉特蒙古中之土爾扈特部，試問今日土爾扈特蒙古，究竟是突厥系民族或蒙古族，想必很難作出明確之認定，今日中亞哈薩克斯坦共和國諸民族中，仍有克烈、乃蠻名號，但已全然哈薩克化。對噉噉族源之探討，也應作如是觀。法國學者勒尼·格魯塞（René Grousset）於其所著《草原帝國》一書中稱：

在草原邊際的一角落發生一點小小的騷動就會在這個無限大地帶的民族遷徙的四面八方不斷地引起最難預知的後果。²⁶

可見在北亞大草原上任何一點騷動，都會引起一連串意想不到之後果，民族血胤、文化都在此種情形下產生混融，如所周知語言雖非識別民族之唯一條件，但絕對是一個重要條件，《南史》稱滑國人（即噉噉人）「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河南人指吐谷渾，其統治階層為鮮卑慕容部，而慕容部以膚色較為白皙，被稱為白虜，此點又與噉噉被稱為白匈奴合，今人朱學淵於其所著《中國北諸族的源流》一書中指出：

在出土的噉噉錢幣上，鑄有王名 Akun、Hephtal、Katuphe 等，其中，Akun 顯然是鮮卑語的『兄長』……『阿干』一字；Hephtal 即族名 Ephthalio。²⁷

鮮卑語稱兄長為「阿干」於史有據，上文曾提到鮮卑慕容部慕容廆與其庶兄長吐谷渾因所部門馬失和，吐谷渾乃率其所部西徙，慕容廆對此頗有悔意，乃作「阿干之歌」以示懷念。²⁸ 而《釋氏西域記》稱：

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即敦煌），東南四百里阿

²⁶ 是《草原帝國》魏英邦譯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53。

²⁷ 見朱學淵《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69。

²⁸ 見《晉書》卷九十七《西戎·吐谷渾》標點本，頁2537。

步干鮮卑東流至金城河為大河。

對此全祖望釋之曰（全祖望 1705～1755 年、浙江寧波人，為清代史學家）：「阿步干者，鮮卑語也。慕容廆思其兄吐谷渾，因作『阿干之歌』，蓋胡俗稱其兄曰阿步干，阿干者，阿步干之省也。」²⁹ 如是朱學淵指嘸噠錢幣上之 **Akun** 為阿干，如無誤，則嘸噠之骨幹為鮮卑，又多一證。

按鮮卑族自東胡被匈奴冒頓單于擊破後，向東逃亡，鮮卑族藏匿於今大興安嶺，因稱大鮮卑山，烏桓（或作烏丸）藏匿於烏桓山（東胡係部落聯盟，主要有鮮卑、烏桓兩大民族，係因人名山，非因山名人，詳情可參看劉學鈞《鮮卑史論》（臺北：南天書局，1994 年）及《大興安嶺傳奇·鮮卑列國》（臺北：風格司藝術創作坊，2012 年），從此消失於歷史舞台二、三百年，東漢時鮮卑有檀石槐者領導鮮卑趨於強大，東漢想封之為王與和親，均為所拒，其盛時疆域廣袤，分疆域為東、中、西三部，其中部從右北平以西到上谷（約為今河北省張家口地區懷來縣）有十幾個邑落，以柯最、關居、慕容三人為帥，其中慕容乃慕容部之首領，可見慕容部鮮卑已進入張家口地區，之後檀石槐死，其帝國隨之崩解，大部分慕容部回到遼西，很可能其中一支進入塞北，與當地早住民族混融，並逐步向西發展，又與高車、柔然（其本身即為多民族之混合體）、等諸多民族混融，遂染其習俗，但仍保留其原有之語言，因此本文認為嘸噠之領導階層，也即骨幹為鮮卑族慕容部，但廣大之部眾則為草原上諸多游牧之族，其情形一如吐谷渾（河南人）之統治階層為鮮卑族慕容部，但廣大之被統治羣眾則為羌族，當然此項推測，乃筆者師心之見，不敢認為絕對正確。

嘸噠之衰亡

嘸噠形成時大約分布於今阿爾泰山以南到天山東部一帶，其時約為西元四世紀，其時中國為諸胡列國時代，初時只是一個小部落臣服於柔然，游牧政權有一特質，就是對被統治之異民族，總是盡可能之奴役、剝削，因此被統治之異民族一旦累積足夠力量時，不是叛變就是逃亡。大約於西

²⁹ 見陳連開〈鮮卑史研究的一座豐碑〉一文、文載大陸《民族研究》雙月刊，1982 年六月號，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

元五世紀初，嚙嚙循月氏向西遷徙路線進入今中亞兩河地區（錫爾河、阿姆河之間，或稱河中地區），征服當地早住民族粟特人，成為河中地區統治者，粟特人或稱昭武九姓諸國；中亞，早住民族，此族似乎天生命定被外來民族征服統治，近代大師級學者王國維於其所著《西胡考、西胡續考》中說之甚詳，王氏說：

西域人民，以國居東西之衝數被侵略，亦遂專心職業，不復措意政治之事，是故希臘來則臣希臘，大夏月氏來，則臣大夏月氏，嚙嚙來則臣嚙嚙……突厥來則臣突厥，大食來則臣大食，雖屢易其主，而人民之營其生活也如故。³⁰

嚙嚙人占據中亞河中地區後，自稱匈奴，但以其膚色較為白皙，西方史家遂稱之為白匈奴，大約在西元五世紀二十年代，向南攻打貴霜帝國（漢文史傳仍稱之為大月氏國），之後更向外開疆拓土，征服吐火羅、巴達赫尚、克什米爾、喀布爾、犍陀羅乃至旁遮普；其時雄距大漠南北之柔然，在北魏多次征討後，逐漸衰微，嚙嚙乃乘機向東占領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諸綠洲，對此，《南史》卷七十九《夷貊下·滑國》有如下之記載：

滑國者（即嚙嚙），……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渴盤陀、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句般等國，開地千餘里。³¹

從此嚙嚙成為廣義西域之強國，而其時中國正處於南北朝對峙時期，對西域事務，心力兩拙，此也客觀條件有利於嚙嚙，正在無往不利情況下，又向呼羅珊進攻，企圖掠奪波斯財富，但在謀夫地方，被波斯王巴赫蘭五世擊敗，嚙嚙王及其妻且被俘，不得已只好與波斯請和，並簽訂和約，以塔里寒為邊界³²。

波斯巴赫蘭五世過世後，由其子伊嗣俟二世（或作耶斯提澤德）嗣立，（西元 438～457 年在位，中國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至文成帝拓跋濬，

³⁰ 此二文輯入王著《觀堂集林》（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頁 606～620，上引文字在頁 615。

³¹ 見《南史》標點本，頁 1984。

³² 見王治來《中亞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49。

南朝宋文帝劉義隆至孝武帝劉駿），又與嚙噠發生多次戰爭，互有勝負，伊嗣俟死後，由其次子霍爾穆茲三世嗣立，其兄卑路斯恐被害逃往嚙噠求庇護，這對嚙噠而言，等同手握「奇貨」，乃以兵助卑路斯，奪得波斯王位，原期望卑路斯能成為傀儡，任由嚙噠擺佈，但卑路斯即位未久，即不甘於尸位素餐成為嚙噠的棋子，於是與嚙噠發生衝突，終至兵戎相向，惜卑路斯屢戰屢敗，卑路斯乃向東羅馬帝國求助，拜占庭給予大量金援，支持其長期與嚙噠作戰（拜占庭不願嚙噠強大，欲以波斯消耗嚙噠），因此雙方戰爭綿延多年，西元 480 年，卑路斯欲進攻嚙噠控制下之大夏故地——巴克特里亞，結果兵敗被俘，最後交付大筆贖金給釋，更將邊界塔里寒割讓予嚙噠。

四年後，波斯卑路斯重整旗鼓，又率軍攻打嚙噠，不料落入嚙噠所預設之陷阱，結果波斯全軍覆沒，卑路斯且命喪沙場。卑路斯死後由其弟洛格斯嗣立（西元 484～488 年在位），與嚙噠進行談判，結果波斯向嚙噠進貢三年，等同成為嚙噠之藩屬國。

西元五世紀中葉，嚙噠入侵北印度，及至五世紀末至六世紀初，嚙噠攻滅興都庫斯山以南犍陀羅及印度河流域之寄多羅王朝子孫之若干小邦，此時（西元 520 年），正是北魏使者宋雲出使西域，見到嚙噠國王之時（宋雲見嚙噠國王詳情上文已有敘述，於此不贅），《宋雲行紀》雖提面見嚙噠王，但未提到其名字，不過下距唐三藏法師玄奘赴印度取經，不及百年，玄奘東返後，與其弟子辨機將西行在天竺及東返經歷撰多《大唐西域記》一書，在此書卷四《磽迦國》曾提到〈奢羯羅故城及大族王興滅故事〉稱：

數百年前，有王號摩醯邏矩羅（醯，音西，古稱醋為醯），（自注唐言大族），都治此城，王諸印度。³³

此處「摩醯邏矩羅」係梵文 Mahirakula 之音譯，mahira 其義為「太陽」，kula 其義為「族」，全名意義應為「日族」，《大唐西域記》自注為「大族」，顯然是將梵文 Maha（義為大）與 Mahira 混淆了。按

³³ 見玄奘、辨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355。

Mahira Kula 為「白匈奴人」（嚙嚙自稱匈奴，以膚色較白，而被稱為白匈奴），³⁴此人之父頭羅曼就是嚙嚙統治北印度時，印度石刻及錢幣上頭像之人。³⁵此時印度摩揭陀國王婆羅阿迭多（Baladitya）崇信佛法，而嚙嚙不奉佛法，嚙嚙王率兵前往討伐，反而兵敗被俘，但旋即獲釋，惟其王位已被其弟所據，嚙嚙王摩醯羅矩羅乃北投迦濕彌羅國（即克什米爾），不久就矯殺其國王而自立，³⁶更乘勢西討犍陀羅國，潛兵伏甲，遂殺其王。據《大唐西域記》稱摩醯邏矩羅在犍陀羅之惡行：「國族大臣，誅鋤殄滅。毀窣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³⁷

此時已是西元六世紀中葉，嚙嚙聲勢已如強弩之末，東方金山（阿爾泰山）南之突厥族（敕勒系民族之一支）正在崛起，上文曾提到游牧政權對被統治之異民族，總是盡情奴役與剝削，時柔然汗國稱強於大漠南北，鐵勒（即敕勒）、突厥均在柔然統治之下，突厥為柔然鐵工（冶鐵製造兵器），西元 545 年（西魏文帝元寶炬大統十一年、南朝梁武帝蕭衍大同十一年），西魏派酒泉西域胡安諾槃陀出使突厥，突厥國人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³⁸時鐵勒不堪柔然之暴虐統治，將起兵叛柔然，邀突厥共襄盛舉，但突厥首領土門竟邀擊鐵勒，破之，盡降其眾五萬餘落（每落即一帳篷，通常以每落以五人計，是五萬餘落約有近三十萬人），頓時壯大，且自恃有功於柔然遂向柔然求婚，柔然可汗阿那瓌大怒，派使者到突厥辱罵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同注 37），土門也怒，殺柔然使者，遂叛之，突厥猛然崛起，銳不可當，土門於西元 552 年（西魏廢帝元年、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三年）正月，土門發兵擊柔然，大破之於懷荒北（懷荒為北魏所建六鎮之一，其當今河北省張家口市張北縣北），柔然阿那瓌自殺，突厥從此稱霸於大漠南北，更進入西域，幾乎每戰均勝，更聯絡波斯，對嚙嚙形成東西夾擊之勢，為了堅定結盟，突厥木杆可汗以女兒嫁波斯王庫思老一世（西元 531～579 年在位，或作

³⁴ 見《大唐西域記》季羨林等注，頁 359。

³⁵ 具王治來《中亞史》，頁 51。

³⁶ 見王治來《中亞史》，頁 51，王係引自《大唐西域記》，見季羨林等校注本，頁 361～362。

³⁷ 見季羨林等校注本《大唐西域記》，頁 362。

³⁸ 見《周書》標點本，頁 908。

奴細爾汪），雙方決定於西元 553～558 年間，大舉進擊嚙噠，果然大敗之殺嚙噠王，突厥波斯瓜分嚙噠國土，雙方同意以阿姆河為界，河以北歸突厥，河以南屬波斯，嚙噠從此消失於政治舞台。

結語

如謎一般之嚙噠終於走進了歷史，成為東西方史傳上模糊的一段記載，各史傳之執筆者，均未曾與嚙噠人有過接觸或見過嚙噠人，其筆下所載之嚙噠事跡，多沿襲前人或他史之說，甚或出於臆測，唯有北魏末期宋雲曾親到嚙噠國，且曾面見嚙噠王，及其皇妃乃至諸大臣之妻，其所撰《行紀》並未提到嚙噠王之體質表徵，更未提其一妻多夫之婚俗，各正史問世時間均晚於《宋雲行紀》，稱嚙噠行一妻多夫制，不知其所其本者為何？

嚙噠被突厥、波斯聯軍攻滅後，固然退出政治舞台，但為數眾多之嚙噠人未必死亡殆盡，必然融合今中亞各民族之中，因此今日中亞各民族之體質表徵，既有東方黃種人（即蒙古利亞種）之特徵，也不乏具有白種人（即高加索種）之特徵，也有不少是兩者之混融，嚙噠人之血胤仍存在於中亞諸多民族之中，此乃可以肯定者。

滿洲史言隨筆集

甘德星 著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

蔡名哲 編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學博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科會助理研究學者

甘德星老師，1954 年 9 月出生於香港，畢業於臺灣大學歷史系，師從李學智、陳捷先等學者。之後赴日本京都大學擔任研修員，師承谷川道雄、河內良弘、萩原淳平諸位專家。1984 年，甘老師負笈美國，進入哈佛大學東亞系攻讀碩士及博士學位，原預定由傅禮初（Joseph Fletcher）指導，但因傅禮初逝世，轉由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與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指導。在攻讀博士期間，甘老師亦曾赴中國大陸向愛新覺羅·瀛生、劉建新等諸位老師學習。1994 年，甘老師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隨後於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任教，並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兼任助理教授。2004 年，甘老師至臺灣的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任教，直至 2020 年退休。

甘老師的博士論文 “Manchu-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A Reappraisal” 主要探討清朝入關前與藏傳佛教之間的關係。此外，老師在清朝正統論、歷史語言學及新清史的學術史等領域亦多有著述，並有數篇尚未刊登的研究仍在進行中。然而，近日聞知甘老師不幸辭世，門生故舊無不惋惜。甘老師學問淵博，然許多研究心得尚未整理出版。為發揚其學術遺產，編者從甘老師生前經營的網站「中正大學滿洲研究」挑選甘老師的學術隨筆，並輔以自身過往在甘老師課堂上的見聞，以及自身對相關課題的研究心得與補充，編纂成文，期望其學術遺澤得以惠及後世學界。

本文此次挑選三個子題，以甘老師網站上曾出現的「滿洲史言」一詞為題名，以標楷體字表示甘老師所著的文字，新細明體則是編者的文字，

註腳亦秉持此原則。原文的標題與子題，略有更動，但盡量選用甘老師曾用過的詞句與標題。老師原文註腳形式為隨筆形式，本次編輯除無法確定出版項者，多改為頁下註，註腳內容多是照錄甘老師提供的資訊，編者查核了部分註腳原文，若有出入則寫於按語。

滿文字典裏沒有的字和詞

編者按：甘老師在課堂上常說要增補現今的滿文字典，因為在閱讀過程中發現太多現今滿文字典沒有的辭彙，或者是依據現今字典的釋義也難以解釋的辭彙。甘老師曾將相關成果，整理出版成〈滿文字典內沒有的字和詞〉一文，收錄在廣定遠·孔果洛先生主編的《渤海與肅慎》一書，有興趣的學友可再參閱。¹以下自「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網」摘錄三則未收錄於〈滿文字典內沒有的字和詞〉的短文。

1. 銀行、兌換券 (menggun-i xōdai qōwaran, ²xōlašara boji)

自乾隆《御製五體清文鑑》刊行以後，清朝就沒有再編製過大型的滿文字典，光緒時刊行的《清文總彙》基本上是綜合康熙時編成的《清文彙書》及乾隆時編成的《清文補彙》二書而成，銀行、兌換券這些晚清才出現的新詞，自然就不會在清代的字典裏找得到。現在的滿文字典又多據清代的字典編製而成，沒有收錄銀行和兌換券這兩個詞自是必然。

1907 年，大清銀行發行了票值伍元的兌換券，其上的銀行一詞滿譯作 menggun-i xōdai qōwaran，而兌換券則譯作 xōlašara boji，先漢後滿。有些兌換券的版本，因筆畫不清，xōlašara 一字中的 <ša> 音節，似多寫一牙，<ša> 變成了 <šan>。清季滿文沒落，於此又得一證。

編者按：其中 menggun 為銀，xōda 則多指與商業有關的事情，加上-

¹ 甘德星，〈滿文字典內沒有的字和詞〉，收於廣定遠·孔果洛，《渤海與肅慎》（臺北：台灣英文新聞股份有限公司，2020），頁 461-486。

² 編者按：現今學界多運用穆麟德轉寫法轉寫滿文文獻，然甘教授生前致力於推廣一套新的轉寫法，以區別滿文不同的轉寫符號。本次出版不更改老師之滿文轉寫法，為便於讀者閱讀，以下說明兩轉寫法之主要差異：穆麟德轉寫法的 k，甘老師區分為 q、k，g 則為 γ 與 g，h 為 x 與 h，ū 為 ô。本文為便於讀者閱讀，編者所書寫的滿文亦採用甘老師轉寫法。

i 為所有格，qôwaran 常見為軍營或者是圈起來一個地方的意思。乾隆朝《御製增訂清文鑑》則增加了一個意思：官方衙門收藏或製作貢物、官方用品的地方。在安雙成的《滿漢大辭典》中，則可以見到寶泉局為 boo ciowan jixai qôwaran，³銀行以 qôwaran 命名或許與此脈絡有關。xôlašara 為交換的意思，boji 則為契約之類的意思，在清代的漢文對應詞即包含「券」字。

2. 觸 (aliyan)

滿文本《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中，aliyan 一字，乃佛經用語，但字典無載。北京大學雍正滿漢蒙藏四體本的經文「無色、無香、無味、無觸、無法」，其滿文對譯為 boco aqô. jilyan aqô. wa aqô. amtan aqô. aliyan aqô. ging aqô qai。東洋文庫乾隆藏滿漢三體本的經文「無色、聲、香、味、觸、法」，滿文對譯為 dursun aqô. jilyan aqô. we sic aqô. amtan aqô. aliyan aqô. jaqa aqô qai。二者經文略異，但 aliyan 的漢文對譯皆作「觸」。

在佛典中，滿文 aliyan 一字常和蒙文 kürteküi 對譯，如 nadan aliyan-ige bu/doloyan kürülçeküi-yin ner-e/七觸名。但其字源其實來自另一蒙文字 aliyan~alayan，其義為手掌，再由此而轉化為「觸」，⁴其對譯梵文為 spraštavya，⁵對譯藏文則為 reg-bya，二字之意皆為「觸」。

編者按：甘老師常於課堂上提及滿文中有許多受外來詞彙影響的辭彙，此即一例。這些詞彙雖只是個別詞彙，但對於了解佛經文本彼此的源流與影響，常為極佳的切入點。

3. 親老公 (banjixa eiigen)

滿文本《金瓶梅》的第二回，頁 30a/169 中，王婆對西門慶說潘金蓮是有家室的人：「Tede banjixa eiigen bi」（他有 banjixa eiigen）。

但句中 banjixa 這個字不好翻譯。翻查胡增益的《新滿漢大辭典》，

³ 安雙成，《滿漢大辭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8），頁 447。

⁴ F. Lessing, *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p. 28, 32, 1160.

⁵ Raghu Vira, ed., *Pentaglot Dictionary of Buddhist Terms - In Sanskrit, Tibetan, Manchurian sic, Mongolian and Chinese*.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1961.

頁 72，共有 11 種解釋：1. 生、生育、生養；2. （血緣）親的、親生的、同胞的；3. 長得、生得；4. 活、生活、過日子；5. 生存；6. 相處；7. 長、生長；8. 養活、養育；9. 產生；10. 出現；11. 作法、行事。」⁶不過，這 11 項的解釋中，沒有一種是適合的。其中較為接近的就只有第 2 項，即（血緣）親的、親生的，如 banjixa ama（生父）、banjixa deo（胞弟）。可是，丈夫（eiigen）並非血親，這裡的 banjixa，應是假借漢文「親」的意思，說明潘金蓮和她丈夫（武大）間的姻親關係。這可從《金瓶梅》的漢文本得到證明。滿文 banjixa eiigen，漢文原文即對譯作「親老公」。

編者按：在編者的閱讀經驗中，記得滿文亦會以 banjixa deo 與 muqôn-i deo 一類的辭彙，區分親兄弟與族內兄弟，惟目前找不到當時閱讀的史料，先記於此。

「滿文羅馬字拼寫法芻議」補記⁷

編者按：甘老師畢生一直提倡滿文應有一套新的轉寫法，其說詳於〈滿文羅馬字拼寫芻議〉一文。然而甘老師對於 zi'、si'、c'i' 的符號的創製，並未於該文中詳論，且所創符號與該文略有不同。這幾個符號甘老師曾於課堂上與學生一起討論，編者亦為其中一員，遂勉強能知老師所指。今挑選老師在網站上的相關文字，輔以自己的說明，便於讀者掌握。

Z 與 Zi'

羅杰瑞的滿英字典，依穆麟德的方法拼寫，將滿文音節 zi'(dzi) 轉寫為 dz，如 dz（子）；dz ming jung（自鳴鐘）。⁸

⁶ 字典中尚有一列作第 12 項的解釋：地位、職務。但 banjimbi 是動詞，不是名詞，此處的釋義有待商榷。編者按：編者所用為該字典修訂版，相關內容為胡增益，《新滿漢大辭典（修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頁 120-121。修訂版已無第 12 項意思。

⁷ 編者按：甘老師生前似已撰成此文，曾在學術會議上宣讀，惜編者亦未見該文。編者此次所選，為自身曾在甘老師課堂上學習過，因此略微知曉老師邏輯的幾篇文字，但這些文字是否出現於老師宣讀的會議論文，編者不得而知。今先借用此標題，整理老師未公開出版的幾篇轉寫法說明。

⁸ Jerry Norman, *A Concise Manchu-English Lexic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 編者按：筆者所用的修訂版滿英辭典中，未見到此詞條。

西方學人，如美國哈佛大學的歐立德 Mark Elliott、夏威夷大學的陸西華 Gertraude Roth-Li (*Manchu: A Textbook for Reading Documents*, p.26)，亦師從其說。

東方學者如日本的《鑲紅旗檔・乾隆朝》taidz；⁹《米國議會圖書館所藏滿洲語文獻目錄》Meng dz，¹⁰韓國學者如《譯註清語老乞大新釋》mengdz，¹¹大陸東北師範大學的劉厚生、台灣故宮博物院的莊吉發等亦寫作 dz。

不過另一些日本學者，如天理大學的河內良弘（《滿洲語文典》）及大陸學者如中央民族大學的季永海等（《滿語語法》）則將之轉寫為 dzi。其實，dz 只是表示塞擦音 affricate 的輔音字母，並不包括其後的元音。因此，後接元音字母 i 時，應拼做 dzi (zi')，一如 dz 加 a 時得拼做 dza，dz 加 e 時得拼做 dze，dz 加 o 時得拼做 dzo，dz 加 u 時得拼做 dzu 一樣。應注意的是，滿文沒有 dz 加 ū 的音節 dzū(zô)。

學者將 zi'(dzi)錯誤轉寫作 dz 多少跟穆麟德有關。在他所編寫的文法書中，裡頭「滿文字母轉寫表」所開列的「外字」tulergi hergen，¹²有的是字母轉寫，有的則是音節轉寫，其中的 ts'i(c'i'')，更是以字母 ts 轉寫整個連體音節。書中的文法部分，沒有清楚說明這些「外字」的拼寫原則，後附的文章選讀也沒有示例，以致學者多無所適從。

用 dz(z)來拼寫音節 zi'應始自日本學者神田信夫、岡田英弘、松村潤等人。他們編譯的《滿文老檔》在 60 年代初出版。這和台灣滿文研究開山祖廣祿及其學生李學智開始摸索研究《無圈點老檔》同時（1962）。為

⁹ 神田信夫、岡田英弘、松村潤、細谷良夫，《鑲紅旗檔・乾隆朝》（東京：東洋文庫，1983），頁 38。

¹⁰ 松村潤編，《米國議會圖書館所藏滿洲語文獻目錄》（東京：東北アジア文獻研究會，1999），頁 4：A13。

¹¹ 최동권, 《譯註『清語老乞大新釋』》（서울：박문사，2012），頁 1：3a/101。

¹² 有關「外字」的意思，《御製增訂清文鑑》云：Taiizung Genggiyen Su Xôwangdi Manju hergen-ci tulgiyen. Niqan hergen-i mudan-de teiisulebume banjibuxa si' c'i j'i-i jergi hergen-be. tulergi hergen-be sembi.. 見 Xan-i araxa nonggime toqtobuxa Manju gisun-i buleku bithe, nadaci debtelin, bithei xacin, dehi duiici，收於《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四百六十，83-254:44b。編者按：此段《御製增訂清文鑑》的釋義，內容為「太宗文皇帝在滿洲字以外，對應漢字的音所編造的 si'、c'i、j'i 等字，稱之為 tulergi hergen（外字）」。老師引用的滿文釋義，清太宗的帝號的 Su 應為 šu。文中舉例的三個外字，穆麟德轉寫法分別是 sy、cy、jy。

了翻譯這批剛發現的無圈點滿文老檔，廣祿參考了這些日本學人的研究，因而因利乘便，也借用了他們的轉寫法。其徒羅杰瑞又師承其說，以致謬說流傳，至於今日。

C'

Jerry Norman, *A Comprehensive Manchu-English Dictionary* 採用穆麟德的拼寫法 (p. xii)，但對「外字」的轉寫與穆麟德的規定並不完全相符。我以前已談到 Norman 使用 dz ㄗ(z)+i' 的錯誤，現在再談一談 Norman 用 ts ㄗ這個符號來表示在滿語中的漢語送氣塞擦音 c' 的問題。

c'i"

有關滿語中表示漢語的送氣塞擦音，穆麟德分別用 ts' 和 ts 兩個符號標示，其中的 ts' [tsʰ] 明顯是借用自 Wade-Giles 拼寫法中的 ts' (「'」表噴氣)，而 ts 則是其「變體」，用來跟漢語送氣塞擦音與舌面前元音結合後因音變出現的舌尖前元音(apicale) i'' [ɿ] 連寫。不過，穆麟德在他的專著 *A Manchu Grammar with Analysed Texts* (1892) 中並沒有多加說明，因此 Norman 不小心錯用 ts 這個符號來表示所有滿語中的漢語送氣塞擦音並不奇怪。

si"

順便提一提滿語嘶擦音 sibilants 「外字」的 z, c'，這些字母皆源自字母 s ㄙ。字母 s 是清音，z 是濁音，s 字符前另加的直槓是用來表示聲音氣流受阻，聲帶同時振動而濁化的現象，c' 是送氣音，其字符前突出的小橫槓是用來形象地標示氣流的噴出。c'i'' ㄘᠢ''，si'' ㄙᠢ'' 與 zi' 中的 i' 與 i'' 則是字母 i 的變體。依照滿文 i 原字的設計，我用 i' 標示只用一筆的腳韻 i (zi')，兩筆的腳韻 i (由直寫改為橫放字中)，則用 i'' 來標示(c'i'', si'')，以分別和這兩個字符的形狀相對應。

Z 與 zi'

滿文這三個「外字」很難不讓人想起朝鮮諺文的 ㄱ[s]、ㄴ[ts]、ㄷ[tsʰ] 三個字母。《訓民正音解例本製字解》(發行於 1446 年) 謂：

「入而不，不而六」，三字母的內在聯繫一如滿文，「外字」後出(1632)，二者的承襲關係頗堪玩味。(參看《聽雨叢談》，卷十一，「滿洲字」，頁

216)

ii

滿文雙元音 ii，用穆麟德的拼寫法，只簡化作 i。穆麟德的滿文拼寫法基本上使用「音寫法」，而不是「轉寫法」，這是穆麟德拼寫法的錯誤根源。有關這一點，我在本網站已論之詳矣。

滿文中有些特別字，如 kuīiii，若按穆麟德的拼寫法，將 ii 轉寫作 i，只能拼寫作 kuii，還原時，按腳韻只用單字母 i 的規定，末音節 ii 將少了一個元音字母 i。¹³

雙元音 ii 其實有其特別功用，如 lii 是用來作避諱字，若轉寫成 li 則失去其原來意義。拼寫老滿文、滿文梵字時也得用到 ii。（見《同文韻統》〈天竺字母譜〉）。

滿文雙元音 ii 乃源自古典蒙文的 yi，之所以轉寫作 yi，而不是 ii，是因為蒙文這個雙元音最初寫作 yi，即 ii < yi。蒙文用「轉寫法」將雙元音二字母全部標出，是考慮到「轉寫法」的可還原性。蒙文和滿文一樣，也有一些不符合正書法的例子，如 naiman 乃蠻/八（非 nayiman），可見使用較嚴謹的「轉寫法」有其必要。

再論穆麟德雙元音〈ii〉的拼寫法：腳韻的 ii vs i

在滿文《八旗滿洲鈕祜祿氏通譜》中，有的人名拼寫，頗為特殊，如 Ušiii 五十一。¹⁴

若用穆麟德的拼寫法，ušii 便不能準確還原為 ušiii，ušiii 所以在末音節用 ii 是因為這個 ii 出現在前音節元音 i 的下面；但按正書法，這是不正確的。出現在腳韻的 i，只能寫作單 i，如 jai 這個字，音節末的 i 雖然出現在元音 a 下面，但因為作為腳韻，所以不可寫作 ii。

穆麟德的滿文拼寫法基本上使用「音寫法」，而不是「轉寫法」，這是穆麟德拼寫法的錯誤根源。有關這一點，我在本網站已論之詳矣。

¹³ 參看 Kam, Tak-sing, "The Romanization of Early Manchu Regnal Names", *Studia Orientalia*, vol. 87, pp. 133-148.

¹⁴ Hoong Teik Toh, *Materials for a Genealogy of the Niohuru Clan with Introduction Remarks on Manchu Onomastics* (Wiesbaden: Harrasowitz Verlag, 2005), p.59.

此汗非彼汗 (.n)

滿文「御製剿滅台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碑文行 22-23：

22. Tuttu suduri bithede. Sung gurun-i R'in Zung Xan-i foryon-i jai mudan K'ang Ding-ni sucungya aniya niyengniyeri aniya biyai ice-de šun-be jetere-de teisulebuhe turgunde. Si" Tiyan Yamun-i xafan Yang Wei De. anayan-i biya-be šanyan muduri aniya-de obume guribuci. šun-be jeterengge. utxai aniya biyai yôsin-de ombi seme baiixa manggi. Xan hendume. anayan-i biya bisirengge. coxome abqai erin-be tob obume

故史載宋仁宗朝第二次康定元年春正月朔當日食，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

23. irgen-i baiita-be afaburengge. jaqanjame jailabuci ombio sefi oxaqô seme araxabi.

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

文中有關宋仁宗朝康定元年春日食一事全段為引文。故漢文謂「史載」，滿文則以 suduri bithede（行 22）...seme araxabi（行 23）的形式表示。滿文《清實錄》為貼近漢文原文，又將之改作 suduri-de araxangge。引文中 Xan 字出現二次。句前 R'in Zung Xan 的 Xan 字沒有加點。這並不符合以加點的字母 n 作區隔上下尊卑的規制。滿文《清實錄》於重抄時，雖然改正了碑文中沒有加點之誤，但同句後的 Xan hendume 的 Xan 字，儘管指的並不是乾隆，《清實錄》卻沒有加點。

滿文碑文乃按漢文而來，文中的「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一段，原出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戊子，權知司天少監楊惟德等言：來歲己卯閏十二月，則庚辰歲正月朔日當食。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前正月之晦。上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頁 2874）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象緯考》又據之謂：「楊惟德等言來歲閏十二月，則庚辰歲正月朔日當食，請移閏於庚辰，則日食在前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文中唯一不同的是，馬端臨將「上」字改為「帝」字。

此即清代有關宋仁宗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一事之所本。《大清會典事例》（第 11 冊，頁 1062）如是，本碑文亦如是。

由此可見，滿文碑文此處第二次出現的 Xan 字指的是宋仁宗無疑，其字母 n，應加點而沒加點。值得注意的是，滿文資料此處所反映的是漢人的思維，而並非內陸歐亞的文化。

編者按：甘老師所用的 z 符號，穆麟德轉寫法作 dz，發音為注音符號的ㄗ的輔音。許多學者將 zi' 直接拼寫為 dz，原因或許是 zi' 被當作 z 的單獨形式，應是認為兩者都讀ㄗ音，但是 z 應該只是輔音部分，不包含母音的[ɿ]。甘老師認為滿文轉寫法應盡量避免使用兩個羅馬字符來代表一個滿文字符，因此選用 z 代替 dz。同時 z 既然可以接 a 等其他母音，那 zi' 的下半部分 i'，應為母音 i 的變體，老師遂以 i' 符號表示之。穆麟德轉寫法的 ts'，其單獨形式的 ts' 符號，發音為注音符號的ㄘ，老師基於避免用兩個羅馬音代表一個滿文字的原則，改用 c' 符號代替 ts'，老師過去提及 z 與 c' 符號的差異在於最右方的一橫，猶如噴氣的提醒。同時，老師亦提醒 z 與 c' 都是 s 變體。三者也剛好對應注音符號的ㄗㄘㄙ的輔音。其中ㄙ音，穆麟德轉寫法作 sy，老師認為其子音依然是 s，但母音形式則為 i 逆時針 90 度的變體，因此以 i'' 符號表示。按照此邏輯，zi' 一字遂拼為 c'i'。甘老師此文涉及滿文外字字母的造字邏輯，即便接受與運用其轉寫法者較少，但其中分析字母的造字邏輯值得一讀。其說盡量以羅馬字母一符號對應滿文一符號的原則，在未來若訓練 AI 閱讀滿文時或許亦有助益，此文也或許能對未來研究者結合電腦科技，需要重新造字時，能提供符號選用的一些參考。另外，甘老師說明雙元音 ii 的兩個例子，字型上前兩個 i 均為長牙，第三個 i 卻是短牙，最後 i 則是字尾形式，滿文在行書體中 ii 確實會寫為一短一長，但此處卻略有不同。編者曾從馬騰（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老師處學習到滿文人名中出現短牙，但不讀 a 或 n，僅作為區隔符號的例子，也就是甘老師這所謂第三個 i，可能是區隔音節的短牙，學者目前提倡以'轉寫，如 uši'i、kui'i。「此汗非彼汗」一節，甘老師討論的是 n 符號有時在左方出現一點，以示避諱。甘老師對此符號，轉寫為.n。編者自身所見，比如漢朝（Xa.n gurun），韓愈（Xa.n ioi），以及蒙古部族的汗等會與滿文 Xan 字混淆的

字，有時便轉寫為.n。相關用例並非只有 Xa.n 字，比如編者見過滿文音譯「傳」一詞時，寫為 juwa.n，以避免與 juwan（十）混淆的例子。另外，甘老師新版轉寫法中，提倡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與句子的開頭，首字應該大寫。

滿文轉寫的連接號

後綴，特別是格助詞，因與前字關係緊密，按傳統的「照寫法」，應用連接號將兩者連接起來。後綴和格助詞與前字的深層關係，可從後綴及格助詞有時與前字的連寫得知，即使後綴及格助詞有時與前字分開寫，其原來的連寫形式於入關前的老滿文檔案中也有所反映。

使用連接號的另一個好處是可與正字作一分隔，如滿文的「他」i 與格助詞的-i，be「伯」與格助詞的-be，se「歲」與表複數的後綴-se，在加了連接號後，兩者因而易於區別，不至混淆不清。

滿漢合璧《三國志》卷一云：saiin qafasa usin-i bade waliyabuci-be angya-de Yoo Šôn-i gisun gisureme beye jergici laqçaxa yabun-be yabumbi/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其中 waliyabuci 後面的 be 得用連接號相連成 waliyabuci-be，因為這是後綴。

-cibe（雖然、即使）的部分，否則這個 be 容易被誤會為表示代名詞「咱們」（編者按：應為咱們）的 be。¹⁵

書名《字法舉一歌》Zi' fa gioi i-i bithe 中的-i，與地名 Da Lii I 大里杙中的 i，清楚說明了連接號所能起的辨別作用。滿文 giya i 兩字，加了連接號，成 giya-i，意即「街的」，可與不連寫的 Giya I，即嘉義，作明顯的區隔，不至相混。外文名字，如在《異域錄》中出現的 G'a-g'a-rin ma-ti-fi fiyoodor-ioi-ci'（噶噶林馬提飛費多爾魚翅 Князь Матвѣй Петрович Гагáрин），音節間加上連接號後，則知其形成的字串自成一個整字，較為清晰。

編者按：-cibe 為滿文後綴詞，接於動詞詞幹之後，表示「雖然」之意，分寫為 ci-be 十分少見，甘老師藉著此例說明滿文轉寫時連接符號的作用，表示這些詞並非單獨作用的辭彙。使用連接符號並非甘老師轉寫法

¹⁵ 彭婉柔，〈滿漢合璧《三國志》卷一的 waliyabuci be 中的 be 是什麼意思？〉，刊登時間：2015/2/26，查閱時間：2024/10/11

的特例，編者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滿文課中，見到授課老師烏雲畢力格老師亦使用此符號。另外，甘老師藉 Da Lii I 此音譯詞來說明倘若沒有轉寫符號，只看轉寫容易以為是「大里的」之意。此種音譯地名之 i，通常以單獨形出現，編者這幾年看到一些學者開始使用大寫 I 來表示。

滿文拾零

1. 文化的「隔」：一輪紅日

多年前，上滿文課時，教到其中一句話：emu muheren-i gese fulgiyan šun，有同學問文中的 emu 是限定後面的 muheren 還是 šun 呢？上星期，為了這句話，又和這學期修滿文課的同學討論了好幾個小時。

理論上，兩者都合乎滿文文法，但我們的文化背景告訴我們，前者才是正解。漢文有「一輪紅日」的慣用說法，如果不懂得這個慣用說法，很容易把這個句子理解為「一個/ 像輪子一樣的/ 紅太陽」。

首先，漢語「一輪紅日」的說法是約定俗成的，不能說成「輪紅日」。滿文句子中的 emu 明顯是依據漢語的「一」字翻譯而來的。滿語不必將「一輪紅日」中的「一」字說出。¹⁶滿文班上的蒙古同學巴登其其格告訴我，蒙古語也不需要。

再者，「一輪紅日」中的「輪」字是個只起單純修辭作用的量詞，¹⁷與表示單位的真正量詞有別。但既然是量詞，「輪」字一如三斤肉、七個人、十元錢中的「斤」、「個」、「元」這些表示單位的量詞一樣，與前面的數目字緊密聯合。

因此，「一輪紅日」不能理解為一/輪紅日，正確的斷句應為一輪/紅日，「一」限定「輪」，「一輪」再限定紅日，「一」與紅日無關。滿文的 emu muheren-i gese fulgiyan šun 既從漢文而來，那麼較切合漢文原意的翻法應是「像一個輪子一樣的 / 紅太陽」，而不是「一個/ 像輪子一樣的/ 紅太陽」。

滿文的正確斷句是 emu muheren-i gese/ fulgiyan šun。

編者按：老師此文討論的是一輪紅日的「一」究竟限定後方那個名

¹⁶ 胡增益，《新滿漢大詞典》，頁 551

¹⁷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頁 709。

詞，倘若限定的是「輪」，那個 *emu muheren-i gese fulgiyan šun* 的翻譯則是「像一個輪子一樣的紅太陽」，倘若限定的是「日」，那翻譯則是像「輪子一樣的一個紅太陽」。老師指出一般滿文類似這樣的句子不會加 *emu*，只要寫為 *muheren-i gese fulgiyan šun*（像輪子一樣的紅太陽）即可，再加上種種論據，認為 *emu*（一）所限定的是 *muheren*（輪）。

2. 康熙 51 年諭土爾扈特 *Ayuki* 阿玉奇汗敕書之滿文誤記：*enen* 與 *aya*

在阿拉騰奧其爾的近著《清朝圖理琛使團與異域錄研究》後附有一康熙 51 年 4 月 20 日諭土爾扈特阿玉奇汗滿蒙文敕書。¹⁸

此敕書較罕見，滿蒙文對譯，無漢文，其中第 4-5 行的 *šajin ergengge-be taiifin-i jiryacun-de isibure, saiin algin abqai enen adali wasinjire jaqade* 中的 *enen* 一字，意為「後裔」，但其意與前後文明顯並不協調。

阿拉騰奧其爾說汪玉明先前將之翻譯做「雨」，¹⁹全段譯作「勝譽如同天雨降下」，故依其說。其實，汪玉明的翻譯應是據蒙文本的 *qur-a*（雨）一詞而來。上引文的對譯蒙文作 *šasin amitan-u tusa amuyulan-un qamuy küsel-i qur-a metü oroyulqu kemen*（第 4 行）雖然不是逐字對譯，但從文意可知 *enen* 應即蒙文敕書內的 *qur-a*。由於滿文 *enen* 與 *aya*（雨）兩字字形相近，故應是筆帖式抄寫滿文時出錯所致，蒙文為原本。

編者按：滿文的 *enen* 與 *aga*，均為三個牙的字，差別僅在於 *enen* 開頭的 *e* 中軸線較長，*n* 左邊應有一點，抄寫者應是誤加了此點。老師此文從滿文的字型與書寫習慣填補滿文錯字，對於填補滿文錯漏字有方法論的意義。

3. 承德大成殿/門滿蒙文匾額

河北熱河文廟在承德市西大街城隍廟東，佔地 2.89 萬平方米。建於清乾隆 41 年至 44 年(1776-1779)，與山東曲阜孔廟、北京孔廟並稱中國三大孔廟。

上世紀 60 年代，熱河文廟除廡殿、齋房、尊經閣、講堂、崇聖祠等

¹⁸ 阿拉騰奧其爾，《清朝圖理琛使團與異域錄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 525。

¹⁹ 阿拉騰奧其爾，《清朝圖理琛使團與異域錄研究》，頁 96-97。

建築物外，整體建築大都遭到徹底破壞。本世紀初，熱河文廟按照原有建築的布局，進行復原，工程歷時4年有餘，於2011年夏完工。

由於平定台灣林爽文之亂在文廟籌劃，因此大成門外左面東壁西嚮嵌有乾隆53年御製的《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記功石刻，惜文革時被毀，現已無法復原。

大成門上的滿、蒙文牌匾「大成門」，與其後的「大成殿」牌匾，河北承德熱河文廟管理處皆誤將之書作佛家的「大乘」*amba kulge/yeke kölgen*。

根據承德市文物局古建隊王玉森處長所言，匾額是參考承德地區寺廟的牌匾復刻，從匾額上所用的字體可見，這應是普寧寺的「大乘之閣」牌匾。

雖然大成門、大成殿匾額的滿文部分後來已更正為 *Amba Šangyan Duqa/Deyen*，但2011年夏，在我到訪時，文廟剛開放，蒙文部分依然錯作大乘門/殿 *Yeke Kölgen Qayaly-a /Ordo*。

按蒙文正書法，「門」一般寫作 *qayaly-a*，不作匾額上的 *qaqalq-a*。

編者按：甘老師此文論證了一個當代再造文物的滿文錯誤，顯示製作者可能因為漢文的「大成」與「大乘」的音近，而誤將後者的滿蒙文寫法移植到前者。此雖是一個當代錯誤，但在填補滿蒙文錯漏字時有其方法論意義，亦即製作者可能因為對應語言的諧音而犯錯，此現象本身橫跨多語言，且是因語言讀音近似而不是字面意思的雷同所導致。

4. 滿文《三國志》的誤譯：*alban šeulegen-be nonggifi*/造作賦稅

滿文《三國志》，順治七年刊印。雍正年間刊行滿漢合璧本的滿文部分與之同。

參與翻譯與校勘工作的除祁充格 *Kicungge* 外，尚包括范文程、剛林、馮銓、洪承疇、寧完我、宋權、能圖、葉成額、查布海、索那海等人。祁充格，烏蘇氏，世居瓦爾喀，初隸滿洲正白旗，後改隸滿洲鑲白旗。歷任禮部啟心郎、弘文院大學士，為《明史》等書的總裁官之一。

滿漢合璧本卷一頁4b/66云：*Geli Xông Du Men-i fejile. buya niyalma-be isabufi. alban šeulegen-be nonggifi saiišabumbi*。其對譯漢文為：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稅，見寵於時。

其中的 *alban šeulegen-be nonggifi*/造作賦稅一句，頗為突兀。查其所據之漢文底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亦作「造作賦稅」；唯此句乃轉錄自《後漢書·楊震列傳》：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²⁰

由此可知，「造作賦稅」句原作「造作賦說」。引文中所謂的「鴻都門」，指的是鴻都門學，此學乃東漢靈帝所立，為宦官借之以與士族勢力相抗衡之所，其學之一為雕虫小技，壯夫不為的漢賦，以別於士族所重的儒學。

祁允格等人未經複查原典，上面的滿文翻譯乃承襲漢文底本的誤刻，以致「賦說」變成了意義完全不同的 *alban šeulegen*（賦稅）。

編者按：甘老師此文亦深具方法論的意義，可見漢文因為字型的近似，再翻譯成滿文時便因襲相關的錯誤。上一篇文章是因為音近所致，本篇則是字型的類似而導致，均顯示滿文在與其他語言交流時的複雜面向。*Geli Xông Du Men-i fejile. buya niyalma-be isabufi. alban šeulegen-be nonggifi saiišabumbi* 一句若譯為白話，則是：又在鴻都門下，聚集小人，增加賦稅而被誇獎。*Šeulegen* 一詞在當代字典查不到，甘老師另有專文考證該字為 *šulehen*（稅）的音變。²¹

5. 《滿洲實錄》中的標點符號：*Bulxôri omo-de ebišeme genehe. Fiyangyô saryan jui*（去布勒瑚里湖沐浴的幼女）

滿文的標點符號，可加可不加，且用法並不規範，主要在表示語氣停頓，與現代標點表示語意中斷或完結者不同。這從《滿洲實錄》可得到證明。

《滿洲實錄》的版本甚多，有二體及三體。現先就北京第一檔案館三體本及東北（滿洲國版）三體本作一比較，以說明之。北京本《滿洲實錄》（頁7）卷一云：「*Mini beye-be fulgiyan tubihe obufi emu enduri-be saqsaxa-i beye ubaliyambufi fulgiyan tubihe-be yamafi. Bulxôri omo-de ebišeme genehe (.) Fiyangyô saryan jui etuku-de sindafi jio seme*

²⁰ 《後漢書》，卷54〈楊震列傳 第四十四〉

²¹ 甘德星，〈滿文字典內沒有的字和詞〉，頁482。

taqôrafi.....」。但東北本《滿洲實錄》的記載卻與之略異。在同一段的引文中 ubaliyambufi/ fulgiyan 間有標點，但 genehe/ fiyangyô 間卻沒有標點，同段的 obufi 應可加標點，不過兩本皆無。

再看作為三體本底本的二體本（遼寧省檔案館，頁 017），句中的 obufi 有標點，但 ubaliyambufi/ fulgiyan 和 genehe/ fiyangyô 間卻沒有標點。

由此可見，滿文標點符號的使用，隨意性極大，而且句子中插入的標點並不表示語意終結，更不妨礙標點前後文意的有機連繫，如 genenhe (<genembi) 這個 *nomen perfecti* 對其後的名詞 fiyangyô 起限定作用，兩字間的標點符號非用作區隔，否則句子語意不清，也無法正確翻譯。

編者按：滿文標點符號通常一點被轉為逗號，兩點者轉為句號，但本身的使用極不規範，也不能與今日的逗號與句號等同。甘老師本文開端所舉之例，倘若將 genehe 的標點當作句號或逗號解，就無法看出該字與後面名詞的限定關係。編者過去處理《西洋藥書》時，亦發現該書有重複的篇章，字詞幾乎完全相同，但標點符號的位置卻十分不同。這表示這些標點符號如甘老師所言是語氣停頓的作用，隨使用者、抄寫者的習慣來使用。日本學者在轉錄標點符號時，也將所謂雙點符號轉為「：」，而不轉為句號。甘老師轉寫法則是一點轉為.，兩點轉為..。

6. 讀《滿洲實錄》*Manju-i yargiyan qooli: fulingya banjixa emu xaxa jui / ĵayayabar törögsan uqun köbegün*

今（20 日）與諸生讀《滿洲實錄》。讀至卷一之 dembei ferguwecuke fulingya banjixa emu xaxa jui jifi tehebi seme alaxa manggi 處（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6），其中的 fulingya banjixa 二字間，似另加工具格助詞-i 為佳，否則難以順暢翻譯。河內良弘師譯之曰：「不思議な，天命が生んだ一人の男の子」似仍難脫原來句式之羈絆（《滿洲語文語文典》，頁 175）。

課後複查二體《滿洲實錄》，其文亦同（頁 015）。再複檢三體本之蒙語部分，同段作 asuru qayiyamsiy-tu ĵayayabar törögsan uqun köbegün irejü sayumu keme ügüleküi-dür.（頁 6）；蒙文《清實錄》之文，雖與之略異，但其中的 ĵayayabar törögsan（以天命所生）二字相同（*Dayičing*

ulus-un mayad qaoli，頁 25 下，行 15），此二字即滿文的 *fulingya banjixa* 的對譯，但蒙文 *jayayabar* 一字，其後另加工具格-*bar* (*jayaya (n) -bar*)，以示二詞之關係。

二體本為入關前舊籍的重鈔本，遣詞用字較為古雅，不書格助詞即其因乎？抑此為鈔錄者無心之失乎？

編者按：*fulingga* 在當代字典標示形容詞，若加上-*i* 則成為副詞，其意「天命地生」，略感難解。此處 *fulingga* 甘老師認為應當作名詞，加上工具格-*i*，則有「以天命所生」之意。

7. 讀清語老乞大

《老乞大》始修於元代，原只有漢文本，滿、蒙文本乃後來續作。元朝漢文古本，1998 年在韓國大邱發現，此即「諺解」本中所說的「舊本」，一般稱之為舊本《老乞大》、原刊本《老乞大》、古本《老乞大》、元代漢語《老乞大》。

最近與諸生讀《清語老乞大》，用的版本是莊吉發先生漢譯，胡格金台先生審定的本子，譯筆暢順易懂。該書 1976 年由台灣文史哲出版社出版。卷一第 25 句「*sibiya tatafi bithe šejilere guwebure bithe burengge adarama?*」旁的漢譯作「抽籤背書，怎麼給免帖？」。²²不過，細看原文，似非此意。在課堂上，即告知諸生應注意句中的並排結構，其緊要處在句後的-*ngge*。

課後即翻查大邱發現的元朝珍本。本中該句作「怎生是撒簽背書？怎生是免帖？」；後出的諺解本亦作「怎的是撒簽背書？怎的是免帖？」。再複查《蒙語老乞大》，該句譯作 *yakiĭi sibay-a suγulĭü bičig čaĭilamu yayun-i keltürükülkü bičig aĭi*。句中的怎生、怎的、*yakiĭi* 與 *yayun-i* 即滿文本 *adarama* 的對譯，由此可見余言之不誤也。下一句（第 26 句）即是此二問句的回應，可以為証：

25 *Sibiya tatafi bithe šejilere. guwebure bithe burengge adarama?*

怎生是撒簽背念書？怎生是免帖？（古 1 左）/怎的是撒簽背念書？怎的是免帖？

²² 莊吉發，《清語老乞大》（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頁 8。

26 Niyalma tome emte cuse mooi susihe weiilefi, meimeni xala gebu-be arafi emu sibiya dobton-de tebumbi. Qadalarasusai sibiya dobton jajifi acinggiyame. terei dorgi-ci emke-be tatambi. Tataxangge we oci utxai šejilebumbi. Šejilehengge saiin oci sefu guwebure bithe emke-be bumbi. Tere guwebure bithe-de ilan moo tantara-be guwebu seme arambi. Geli terei ninggude temgetu hergen arambi. Aiiqabade šejileme muterakô ohode. guwebure bithe tucibufi tatame waliyafi. nenehe šangnan-be weiile-de fangqabume tantabure-be guwebumbi. Aiiqabade guwebure bithe aqô oci, urunaqô ilan moo tantabure-be alimbi.

每一個竹簽上寫著一個學生的姓名，眾學生的姓名都這般寫著，一個籤筒兒裏盛著。教當直學生將籤筒來搖撼動，內中撒一個。撒著〔誰〕〔的〕，便著那人背書。背念過的，師傅與免帖一個。那免帖〔上〕寫著免決三下，師傅上頭畫著押字。若再撒簽試不過，將出免帖來毀了，便將功折過免了打。若無免帖，定然吃三下。（古 1 左—2 右）/每一個竹簽上寫著一個學生的姓名。眾學生的姓名都這般寫著，一個籤筒兒裏盛著。教當直的學生將籤筒來搖動，內中撒一個，撒著誰的，便著那人背書。背念過的，師傅與免帖一個。那免帖上寫著免打三下，師傅上頭書著畫押。若再撒簽試不過，將出免帖來毀了，便將功折過免了打。若無免帖，定然吃打三下。

編者按：此處甘老師提醒的是滿文的平行句型，滿文會有句型平行，在最後一個句子才加上共用的附加成分的現象。sibiya tatafi bithe šejilere guwebure bithe burengge adarame 一句，可以斷句在 šejilere，但也可以跟後方的 bure 平行，亦即兩個句子都以-re 銜接之後的 ngge，讓「抽籤背書」跟「給免帖」成為平行句，提問者是同時詢問這兩者如何進行。

8. 「滿洲性」Manchuness 一詞的滿文翻譯是 manjurarengge 嗎？

柯嬌燕（Pamela Crossley）以為「滿洲性」Manchuness 一詞在滿文為 manjurarengge。其實，此字按元音和諧律應寫作 manjurarangge，即 manjurambi 的動名詞；manjurarengge 為柯氏的誤記，滿文無 manjurarengge 一字。俄國滿文文法編者 Liliya M. Gorelova 指出

manjurarangge 這個字，可（編者增添：在某處著作）找到用例，²³但卻不敢遽以為非，而只婉轉地說 manjurarengge 是 manjurarangge 的變體。²⁴此外，滿文 manjurambi 的意思是「裝作滿族人」，²⁵與柯嬌燕所說滿洲性 Manchuness 的語意並不完全吻合。

編者按：manjurambi 一詞在《御製清文鑑》與《御製增訂清文鑑》中，只有“manju gisun gisurere-be manjurambi sembi”的釋義，意為「說滿洲話」，這與 manchuness 所表述的意思確實不完全等同。

謹以此文追憶並紀念甘老師的諄諄教誨，期望能藉由這種形式，將老師尚未正式刊登的研究片段保留下來。若此文能對後續的史學研究有所助益，作為老師的學生，深感欣慰與榮幸。

甘德星教授著作目錄

期刊論文

1. 〈孰是孰非：歐立德《乾隆帝》一書中滿文翻譯的對錯〉，《編譯論叢》12:1（2019.3），頁 77-106。
2. 2018，〈身體、語言、族群特質：愛新覺羅·瀛生的滿洲認同研究〉，《滿學論叢》第七輯，北京：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
3. 2017. "The Term Mongyol Revisited."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60, No. 1-2, pp. 183-206.
4. 2000. "The dGe-lugs-pa Breakthrough: The Uluk Darxan Nangsu Lama's Mission to the Manchu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44 No. 2, pp. 161-176.

²³ P. G. von Möllendorff, *A Manchu Grammar with Analysed Texts*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2)，頁 32（正確的頁碼應是頁 31）。

²⁴ 見 Liliya M. Gorelova, *Manchu Grammar* (Leiden, Boston, Köln, Brill, 2002), p.26，注 18。

²⁵ 見胡增益：《新滿漢大詞典》，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頁 527。

5. 1999. "The Romanization of Early Manchu Regnal Names." *Studia Orientalia*, vol. 87, pp. 133-148.
6. 1999. "The Sino-Manchu Inscription of 1630 in Honour of the Uluk Darxan Nangsu Lam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vol. 4.

專書論文

1. 2014, 〈康熙遺詔中所見大清皇帝的中國觀〉, 汪榮祖主編,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 桃園: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頁 109-114。2014 (2 刷)、2015 (3 刷)、2017 (4 刷)。
2. 2011, 〈滿洲漢化: 臺灣乾隆御碑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編, 《清代滿漢關係研究》,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頁 603-612。
3. 2006, 〈「正統」之源: 滿洲入關前後王權思想之發展與蒙藏轉輪王觀念之關係考辨〉, 汪榮祖、林冠群主編, 《民族認同與文化融合》, 嘉義: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 頁 119-174。
4. 2003, 〈滿洲語文語文典, (日)河內良弘著〉, 閻崇年主編, 《20 世紀世界滿學著作提要》, 頁 311。
5. 2003, 〈滿洲語文語辭典, (日)福田昆之編〉, 閻崇年主編, 《20 世紀世界滿學著作提要》, 北京: 民族出版社, 頁 294。
6. 2001, 〈滿文羅馬字拼寫芻議〉, 閻崇年主編, 《滿學研究》, 第六冊, 北京: 民族出版社, 頁 50-68。
7. 1997. "The Spread of Tibetan Buddhism to Mongolia before the Manchu Era." *Mongolia: Tryst of Change and Development*, New Delhi: Vision & Venture.

研討會論文

1. 2016.11.4-5. "The Term Mongol Revisited", 第五屆漢化、胡化、洋化: 傳統社會的挑戰與回應國際學術研討會, 嘉義: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頁 119-139。
2. 2015.11.20, 〈「新清史」再思: 大清是個帝國嗎?〉, 「清史研究新

趨勢」工作坊，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3. 2014.9.9-14. "The Term Mongol, Revisited."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Institute of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The Far Eastern Branch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Vladivostok, Russia.
4. 2013.6.15-16, 〈「滿文羅馬字拼寫法芻議」補記〉, 「黑龍江省滿語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慶典」暨「國際滿通古斯學學術研討會」, 黑龍江：黑龍江省滿語研究所。
5. 2012.12.6-7, 〈從滿漢文康熙遺詔看清朝皇帝的中國觀〉, 第三屆漢化・胡化・洋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香港：香港浸會大學。
6. 2012.11.30, 〈從滿漢文康熙遺詔看清朝皇帝的中國觀〉, 「清帝國性質工作坊」, 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人文中心。
7. 2011.10.27-28, "The Term Mongyol Revisited," 「元代以來漢蒙的歷史與文化」研討會, 國立台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蒙古國立大學合辦。
8. 2010.8.30-9.1, 〈「滿文羅馬字拼寫法芻議」補記〉, 「滿學：歷史與現狀」國際學術研討會, 北京：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 頁 21-28。
9. 2010.8.28-29, 〈滿洲漢化：臺灣乾隆御碑研究〉, 清代滿漢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頁 81-89。
10. 2010.6.5, 〈回憶、身體、語言：愛新覺羅・瀛生的滿族身分建構〉, 第二屆「漢化、胡化、洋化：傳統社會的轉型與適應」國際學術研討會, 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頁 127-140。
11. 2007.7. "The Establish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in Early 17th Century Manchuria."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Domestication of Buddhism, Ulaanbaatar, Mongolia, jointly held b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 pp. 8-9.
12. 2006.12, 〈清代台灣滿文文獻研究之一〉, 田野、文獻、臺灣史工作坊, 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
13. 2005.8.26-28, 〈「正統」之塑造：清初「傳國玉璽」之出現、鈐印及

記述〉，故宮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北京：故宮博物院。

14. 2003. "Source of Legitimation: the Title Cakravartin and Manchu Kingship in the Pre-conquest Er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icization, Barbar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 December 12-13.
15. 2003. "Manchu Kingship during the Hetu-ala Period."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chu Studies, Fu-shun, China. August 22.
16. 2000. "Some Remarks on the 1630 Inscription in Memory of the Uluk Darxan Nangsu Lama."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ungus 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ies, Hailar, China, September 10-12.
17. 2000. "Deciphering Some of the Unrecognizable Words found in the 1630 Inscription in Memory of the Uluk Darxan Nangsu Lama."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chu-Tungus Studies, Bonn, Germany, August 28- September 1.
18. 2000. "The dGe-lugs-pa Breakthrough: The Mission of the Uluk Darxan Nangsu Lama to the Manchus."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g History, Peking, China, August 23-25.
19. 1999. "A Standard Manchu Romanization System: A Proposal." The 42nd Meeting of 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Prague, Czech Republic, August 22-27.
20. 1999.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a Standard Manchu Romanization System."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chu Studies, Peking, China, August 9-13.
21. 1999.8, 〈滿文羅馬字拼寫法芻議〉，第二屆國際滿學研討會，北京：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
22. 1998. "The Romanization of Early Manchu Regnal Names." Writing in the Altaic World: 41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held at Majvik Castle, Kyrkslätt, Finland,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July 5-10.

23. 1998. "The Mahakala Cult and Manchu Legitimacy."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ongolian Studies, Kökeqota, Inner Mongolia, China, August 18-21.
24. 1997. "The Term Mongyol Revisited."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ongolists, Ulaanbatar, Republic of Mongolia, August 12-17.
25. 1997. "The Patron-Priest Relations between Qubilai Qan and the 'Phags-pa Lam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Yuan History and Sung-Yuan Culture, Canton, China, May 18-23.
26. 1996. "Ch'ing Lamaist Policy before 1644."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ng-Ch'ing History, Tientsin, China, August 1-4.
27. 1995. "The Spread of Tibetan Buddhism to Mongolia before the Manchu Er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ngolists, New Dehli, India, February 20-24.

翻譯

1. 1982, 〈陳福霖、孫中山與國民黨改組的起源〉(Ch'en Fu-l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uomintang Reorganization," in *China in the 1920s*), 《中國現代史論叢》, 第 10 輯, 台北: 聯經出版公司, 頁 55-83。
2. 1982, 〈中國國民黨與大後方: 戰時四川〉(Robert A. Kapp,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and the Great Rear Area: Wartime Szechwan," *Chinese Republican Newsletter*, Vol. 1, No. 1, Oct. 1975), 《中國現代史論叢》, 第 9 輯, 台北: 聯經出版公司, 頁 221-229。
3. 1982, 〈建立革命基地的困難: 孫中山與 1923 年的廣州〉(Martin Wilbur, "Problems of Starting a Revolutionary Base: Sun Yat-sen and Canton, 1923," *Chung-yang yen-chiu-yuan chin-tai shih yen-chiu-so chi-k'an*, Vol. 4, hsia-ts'e), 《中國現代史論叢》, 第 7 輯, 台北: 聯經出版公司, 頁 37-82。
4. 1980, 〈析評施堅雅編近代中國社會——書目類編〉(Edwin G. Beal, "Review Symposium: The Skinner Bibl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 Socie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XV, No. 2, [1976]), 《中國現代史論叢》，第2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頁267-278。
5. 1980，〈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民族主義、改革與共和革命〉(Ernest P. Young, "Nationalism, Reform, and Republican Revolutio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ed. James Crowley), 《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頁45-79。

研究計畫暨報告

1. 2014，《台南市清乾隆漢滿文御碑古物價值之調查成果報告書》，臺南市文資處委託計畫。
2. 2013.08-2014.07，「蒙古一詞再探」，國科會，計畫編號：NSC102-2410-H194-016。
3. 2010，〈台灣「乾隆滿漢文御碑」譯寫〉，項潔主編，《國立台灣大學典藏古碑拓本：台灣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頁1-59。
4. 2007，「清代台灣滿文文獻研究（二）」，國立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個別型研究計畫。
5. 2006.08-2007.07，「清初『正統』之塑造：『傳國玉璽』、登極大典、歷史記述」，國科會，計畫編號：NSC95-2411-H194-014。
6. 2006.04-12，「清代台灣滿文文獻研究（一）：台灣滿文文獻研究——以南台灣為主」，國立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研究計畫。
7. 2006，「清代台灣滿文文獻研究（一）：滿文康熙起居注台灣史料摘錄」，國立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研究計畫。
8. 2006，《愛新覺羅·瀛生傳略：從滿洲王爺到共和國平民》，財團法人純智文教基金會。
9. 2004，《十七世紀初期滿洲正統之確立與大黑天神之關係考辨》，財團法人純智文教基金會。

書評

1. 2002. Review of Pamela Crossley, *The Manchus* (Oxford: Blackwell, 1999)

i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XXXVII, No. 1 (1999),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pp. 89-92.

學位論文

1. 1994. "Manchu-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A Reappraisal." 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滿文碑文轉寫

1. 《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林爽文碑》
(<https://dl.lib.ntu.edu.tw/s/rt/media/5086515>)
2. 《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
(<https://dl.lib.ntu.edu.tw/s/rt/media/5086519>)
3. 《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
(<https://dl.lib.ntu.edu.tw/s/rt/media/5086520>)
4. 《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
(<https://dl.lib.ntu.edu.tw/s/rt/media/5086516>)
5. 《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
(<https://dl.lib.ntu.edu.tw/s/rt/media/5086517>)。

甘德星教授論文載點：

<https://manjugisun.blogspot.com/2024/10/blog-post.html>

官話而不是滿語：乾隆《御製增訂清文鑑》及其在朝鮮和日本的改易 *

馬騰（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著

波士頓學院利瑪竇中西文化史研究所特藏部圖書館員

蔡名哲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科會助理研究學者

滿語是清帝國的官方語言，而滿語傳至朝鮮王朝以及江戶日本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十八世紀北京為了提升滿語相對於帝國境內其他語言的地位而進行的辭書編纂工作。除了滿語之外，北方漢語方言，又稱作官話，也在這些辭書編纂中出現，但卻是位於從屬於滿語的位置。日本及朝鮮學者使用由清朝出版的書籍編纂新書，但與清朝書籍不同的是，日本和朝鮮的書籍是以漢語白話文為中心來編纂。必要時，他們甚至將清朝官書當作漢文的知識來源，而非作為滿文的知識來源。

滿語辭書編纂在日本及朝鮮的歷史，呈現了清朝在十八世紀透過軍事征服與積極的文化政策所實現的帝國力量增長，使部分帝國主要語言在域外變得更為人所知。這波清朝語言的向外輻射延伸到了歐洲，在該處，習滿語者發現滿語較漢文親切且簡單，¹因此即使滿語不是漢文的替代品，也可做為入門。²然而，相較於歐洲，滿語辭書編纂工作最終增進的是漢語官話在東亞區域政治的重要性，而非滿語的重要性。

在二十世紀早期，官話成為相對弱勢的中華民國的國語，而官話也在

* 原文 Mandarin over Manchu: Court-Sponsored Qing Lexicography and Its Subversion in Korea and Jap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7.2 (December 2017), pp.363-406. 此中文標題為馬騰老師根據漢文的語境所改定。本文原為譯者參與中央民族大學魏建東老師組織的外國學者論著計畫成果之一，翻譯過程中，馬騰老師、蘇日朦、吳曼竹與林書寧審校了譯文，李升洙協助了韓文人名與文章名的翻譯，特此致謝。

¹ Joachim Bouvet（白晉），*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La Haye: Meyndert Uytwerf, 1699; rpt., Tianjin, 1940), pp. 78, 85.

² 可見錢德明（Joseph-Marie Amiot）對《盛京賦》的譯者序，該書乃由乾隆皇帝所作，出版資訊為(Paris: N. M. Tilliard, 1770), pp.iv-v。

今日被認為是代表中國的語言。然而，我認為在 1800 年左右的幾十年，漢語官話之所以被當作國際語言，是因為它作為日本及朝鮮學者接觸不同語言之間的仲介。即便在滿人統治中國的高峰，日本及朝鮮學者也唯有透過官話才能接近清統治者的語言。

為了說明這個透過官話學習滿文的過程，我著重於一本由許多朝鮮王朝與江戶日本的學者在語言研究中對一本清廷御製的滿漢分類辭典（thesaurus）的使用。（我使用 thesaurus 是因為這本辭書依據詞彙的意義編排）。³ 《御製增訂清文鑑》（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h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於 1773 年為了規範與推廣滿語而刊印。⁴ 這本滿漢合璧書籍事實上是《御製清文鑑》（Han i araha manju gisun-i buleku bithe）的續篇。《御製清文鑑》於 1708 年由北京宮廷印製出版，內容完全無漢字，其漢文名稱被追溯為《御製清文鑑》（由於後來的合璧續作標題）。確實，根據一位消息靈通的旁觀者，《御製清文鑑》編纂者的主要目標是「擁有完整滿語的集成，以使其未來不會消失」。⁵

清廷後續也編纂包含其他語言的語言學工具書，而滿語依然是位於這些出版品的中心位置。⁶ 滿漢合璧的《御製增訂清文鑑》亦是如此。《御製增訂清文鑑》首次出版於 1773 年，後來經過修訂。由於印數不少，該

³ Carla Marella, "The Thesaurus," in vol. 2 of *Wörterbücher: Ein internationales Handbuch zur Lexikographie*, ed. Franz Josef Hausmann et al.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0), pp. 1083–94.

⁴ 傅恒編，《御製增訂清文鑑》（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h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原書 32 卷，補編兩卷），1773 年，再製版由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5 年。此版為 1778 年《四庫全書薈要》的再製本。

⁵ Dominique Parrenin (巴多明), "Lettre du Père Parrenin [sic], Missionnair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à Messieur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en leur envoyant une traduction qu'il a faite en langue Tartare de quelques-uns de leurs ouvrages, par ord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t adressée à M. de Fontenell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et Secrétaire perpétuel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in vol. 19 of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1738; rpt., Toulouse: Sens/Gaudé, 1811), p. 230. 這裡所描述的分類辭典是《御製清文鑑》（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北京：武英殿，1708）。我使用原雕版印刷的微縮膠片，被註記為《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御製清文鑑》，4 冊，[1709]；天理圖書館所藏滿文圖書，系列一，MC 4 LING IX 4150 號，收藏於德國哥廷根格奧爾格·奧古斯特大學的下薩克森州立與大學圖書館。

⁶ 舉例而言，在春花著作中所描述的書即是如此。春花，《清代滿蒙文詞典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頁 110-119。

書散佈甚廣。⁷ 儘管其預期的功效是推動滿文的知識與使用，朝鮮與德川日本的學者有時卻因為書中包含的漢語官話而對其產生興趣。

基於對滿漢《御製增訂清文鑑》編纂的研究，我認為在近代早期歐亞大陸的兩端，學者同樣關注外語學習，且此種關注也表現在學習滿語的興趣上面。尤其因為清代是國際聯繫增強與印刷散佈廣泛的時代，這種歷史背景更促進了這種對外語的關注。為了說明《御製增訂清文鑑》的來源及其預期的功效，首先我將討論清代中國漢語文言文與白話文共存的現象，其次我將簡要描述滿語研究在北京的發展。在分析《御製增訂清文鑑》於日本及朝鮮的滿語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後，我認為東北亞學者對滿漢合璧出版品的使用，推動了一種語言位階，而在這個位階中，白話漢語官話佔據中心地位，並非清廷致力推廣的滿語。在結論中我將比較東北亞和歐洲學者的作品，以說明東北亞著重於漢語官話、而近代早期歐洲著重於滿語的現象。

最後，我要強調，滿語與漢語官話的國際傳播表明漢語文言並非二十世紀以前東亞唯一的國際語言。更進一步說，從不同語言群的流傳與研究顯示，漢語文言文曾經作為東亞的共同語言，但最終卻被不同的民族語言取代，這是東亞區域內方言化的結果。

文言文與白話文，漢文與滿文

滿文是在一個多語言的情境中作為一種書面語出現，在此情境中，漢文的文言文與白話文是重要的元素。最終，漢文與滿文的接觸使得漢文的白話文更大規模地被印刷出來。本節概述滋養滿語的多語環境，以便解釋為何日本及朝鮮學者如此使用《御製增訂清文鑑》。

書寫滿語是十七世紀時由女真語言的其中一支、參考畏吾兒—蒙古文字後被創造出來。其為清帝國的國語。從十七世紀中葉到 1911 年，滿洲

⁷ 這篇序言落款乾隆 36 年 12 月 24 日（1772 年 1 月 28 日），刊印時間應該為 1773 年左右。關於刊印時間，可見今西春秋，〈清文鑑—從單體到五體〉，《朝鮮學報》39/40（1966），頁 134。分類辭典被廣泛研究過，可見 Larry V. Clark 與 Hartmut Walravens 編，*Bibliographies of Mongolian, Manchu-Tungus, and Tibetan Dictionaries* (Wiesbaden, Ger.: Harrassowitz, 2006), pp. 118–19。關於版本數量與時間，舉例而言，可見今西春秋，〈關於增訂清文鑑的各版本〉，《史林》23.4（1938），頁 219–226。（譯者按：本文原文未載《朝鮮學報》一文，此文為馬騰審閱譯稿時所加）

皇室與他們的貴族夥伴統治中國及部分內亞地區，因此滿語成為一種行政工具及與對手和屬民的區別標誌。在中原本部，滿文與漢文共存，而在北方，漢文大致出現兩個種類：文言與白話。文言與白話在中國之外的東亞地區也有使用的歷史。

文言漢文是基於中國古代王朝的經典，同時吸收了許多近期的表現形式。過於簡單的說，直至二十世紀初，其是主導高雅書寫的媒介。漢文的文言文在東亞的角色，其重要性常被拿來與後羅馬時代歐洲的拉丁文相比。⁸ 當東亞知識份子跨境相逢，他們通常交換以文言漢文寫成的筆記溝通（所謂的「筆談」）。然而漢文的文言文形式在不同時間與空間並不一致（即便這方面還有議題待研究），其也不是唯一用於東北亞區域交流的語言。

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前葉，一種稱作官話的漢語口語在日本和朝鮮的重要性提升，幾近成為區域語言，雖然他的影響力仍然比文言文小很多。作為權威性的口頭語言，官話比白話文的書寫形式更變化萬千。官話公認的發音方式隨時變易，而白話文本並不需要使用這公認的標準發音也能被正確閱讀。然而，如同我將說明的，日本及朝鮮的學者認識到，北京出版的滿漢合璧書籍中的書面白話文紀錄了一種特定的發音，而他們將此視為清廷公佈的正音。

語言學家現在認識到，此種官話包含了南方官話的特徵，且與北方本地語言不同，⁹ 但清廷的滿語研究學者並未意識到官話有江淮方言的基礎，本文提到的日本及朝鮮學者同樣未意識到北京方言與官話之間的差異。本文並非要討論《御製增訂清文鑑》所傳遞的漢文發音與當時的北京方言的相近程度。在本文中，我用「白話文」指稱以近世口頭語言為基礎的書面語。這種書面語與日本及朝鮮文人熟悉的儒家經典文言文的差異很大。同時，我使用「官話」強調使用表音文字（例如滿洲文字或者朝鮮諺文）拼寫北方發音以標誌漢文讀音的書寫材料，這種標音方式導致讀者也

⁸ Peter Kornicki, "The Latin of East Asia?" (Sandars Lectures in Bibliogra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Cambridge, UK, March 10, 2008), <http://www.lib.cam.ac.uk/sandars/kornicki1.pdf>.

⁹ W. South Coblin, "Guānhuà 官話,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vol. 2 of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De-Med*, ed. Rint Sybesma (Leiden: Brill, 2017), pp. 327-333.

用北方發音拼讀。

漢語方言的書寫和發音形式尚未固定，但是這種不統一的形式在十八世紀因為中文小說的流行而大量地觸及日本與朝鮮的民眾，在日本，更是因為中國僧侶的來到而使漢語方言更加流行。鮮為人知的一些較為激進的朝鮮學者認為朝鮮人也應該學習口說漢語方言（這裡指的是官話）。¹⁰ 因此，漢語方言在東亞的影響力持續增加，甚至超過滿語。《御製增訂清文鑑》在朝鮮和日本的歷史表示，滿文傳入中國最終導致了漢語方言的增強。¹¹

因此，漢語方言在東亞的影響力增加，而這一趨勢是獨立於滿語發展的。也就是說，滿文傳入中國以及其在中國的傳播，最終促進了漢語方言的增強。

清廷贊助的滿語研究

十八世紀的滿洲菁英建立了一個包含了藏文、回文、托忒文、蒙古文及許多漢語的方言及其他語言的廣大內亞帝國。他們以華北城市北京為首都，並將大部分世襲的軍事力量（旗人）駐紮於該地。基於實際和理想的雙重理由，清廷及其臣僕編纂了集兩種、三種甚至更多語言的辭書。滿語在這些作品中，總是位於中心位置，如同滿洲皇帝及其北京的都城位於國家行政與官方文化的中心。

雖然多數多語種的出版品是被理念所推動，宮廷投入滿語研究也有其實際層面的原因。八旗軍隊與其家屬，在尚未入主中原之前，已包含了某些北方白話漢文的口語使用者。¹² 在十八世紀中葉，北方漢語方言（當時尚未被視為標準的官話）¹³ 可能已成為旗人之間口語溝通的主要語

¹⁰ 趙成山，〈18 世紀後半至 19 世紀前半朝鮮知識份子的語文認知傾向〉，《韓國文化》第 47 期（2009），頁 190，<http://www.dbpia.co.kr/Journal/ArticleDetail/NODE01262443>。

¹¹ 譯者按：最後二句直譯為「漢語方言在東亞的影響力增加，而這一趨勢是獨立於滿語發展的。也就是說，滿文傳入中國以及其在中國的傳播，最終促進了漢語方言的增強。」馬騰審閱時補充了相關資訊並改譯如此。

¹² 岡田英弘（Okada Hidehiro），“Mandarin, a Language of the Manchus: How Altaic?” 收於馬丁·嵇穆（Martin Gimm）、斯達里（Giovanni Stary）、Michael Weiers 編，*Historische und bibliographische Studien zur Mandschuforschung*, (Wiesbaden, Ger.: Harrassowitz, 1992), pp. 165–87。

¹³ 文通編，存之堂著，《圓音正考》（北京：三槐堂，1830）。寫於 1743 年，以滿人

言。¹⁴ 清廷在十八世紀對滿語的使用和形式之所以高度關注，部分原因是旗民之間日漸模糊的語言分界。因此《御製增訂清文鑑》應被理解為清廷對於旗人滿語能力退化的回應，以及清楚認知應該堅持滿語作為普遍帝國的首要語言的崇高地位。¹⁵

1708 年，清廷在康熙皇帝的命令下出版了第一本滿文研究《御製清文鑑》（雙語分類辭典《御製增訂清文鑑》的前身）。這本原創、單語的文鑑，被構想為在旗人日漸增加使用漢語的情境下刺激滿語使用的工具。¹⁶ 從清廷參與滿語研究開始，其公開目的便是強化滿語。然而，當《御製清文鑑》問世時，市面上早有許多由滿漢文教育者出版的滿文工具書以及滿語教科書，以服務一個多語溝通的社會。這些書籍幾乎都是滿漢雙語合璧，這表示了他們的對象是漢語圈的滿語學習者。

然而，漢文在這些書籍中通常是以翻譯或是切音（提供接近滿文發音的漢文字）的形式出現，這產生一個意外的結果，亦即刊印來教學滿文的書籍同時也傳遞了漢文的某種形式。在音節上，切音的漢文字「從京韻」。¹⁷ 在文法上，滿文的格助詞被定義為官話中的一或數種助動詞，舉例來說，滿語的與格介詞「de」被當作官話的「給」字。¹⁸而在字典

讀者為目標，確切說明漢字的純正讀音。

¹⁴ 見 Chieh-hsien Ch'en（陳捷先），“The Declin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1),” 收於 Walther Heissig（海西希）編，*Altaica collecta: Berichte und Vorträge der XVII.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3.–8. Juni 1974 in Bonn/Bad Honnef* (Wiesbaden, Ger.: Harrassowitz, 1976), p. 139；Mark C. Elliott（歐立德），*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95。

¹⁵ 關於滿洲領導階層的普遍帝國的意識形態，可見 Pamela Kyle Crossley（柯嬌燕），*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¹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起居注》冊 1（排印版，康熙 12 年（1673 年）4 月 12 日），（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93-94。感謝張勉治（Michael Chang）提供這條材料。

¹⁷ 廖綸璣，《十二字頭引》（滿：juwan juwe uju），收於廖文英，張自烈編，《正字通》（1671；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 年再版），頁 1a。沈啟亮：《箋注十二字頭》（滿：Giyan ju ši el dzi teo）（北京：Fukui zhai, 1701），頁 1a，不完整抄本，藏於梵諦岡使徒圖書館，編號 BORG. CINESE 351.7。

¹⁸ 舞格，《滿漢字清文啟蒙》4 卷本，卷 3（北京：弘文閣，1730），頁 1a。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電子本，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ho05/ho05_02852/。

中，滿文詞彙經常被翻譯成白話，而不是文言文。¹⁹單語的《御製清文鑑》代表了破除這種操作的嘗試。然而在乾隆朝，宮廷清楚認知到其為一個統治雙語乃至多語的政權，從而放棄了透過單語出版推廣滿文的策略。

儘管《御製增訂清文鑑》是合璧的，但該書的目的依然是強化滿文，而非漢文。在編書的過程中，清廷運用許多方法首崇滿文。在《御製增訂清文鑑》的目錄以及主要內容中，滿文均是排在首位。如同乾隆皇帝的序言所指出，《御製清文鑑》已「依國語分類排纂」²⁰，類似的，《御製增訂清文鑑》，「每門首著國語，旁附漢字對音。」²¹

然而，某種特定的漢語形式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同早期的家刻、坊刻的參考書和教科書，從其定義文所用的單字、句法與標音可以看出，《御製增訂清文鑑》所用的漢文形式正是朝廷所使用的官話。文法上，其使用了官話中的虛字（就是官話的「的」、「了」），而非文言文中的「之」、「矣」等。編纂者認為這樣的語體最適合用於翻譯他們讚揚為清晰且簡單的滿文。皇帝在《御製增訂清文鑑》的序言中表述此書使用「俗解」（滿文：*sesheri suhen*），即白話的解釋；確實，滿文解釋並不包含見於 1708 年《御製清文鑑》的經典引語。²² 在註解中，編者「詮釋具以日用常言，期人共曉。」²³ 使用漢語的白話文反映了這樣的抉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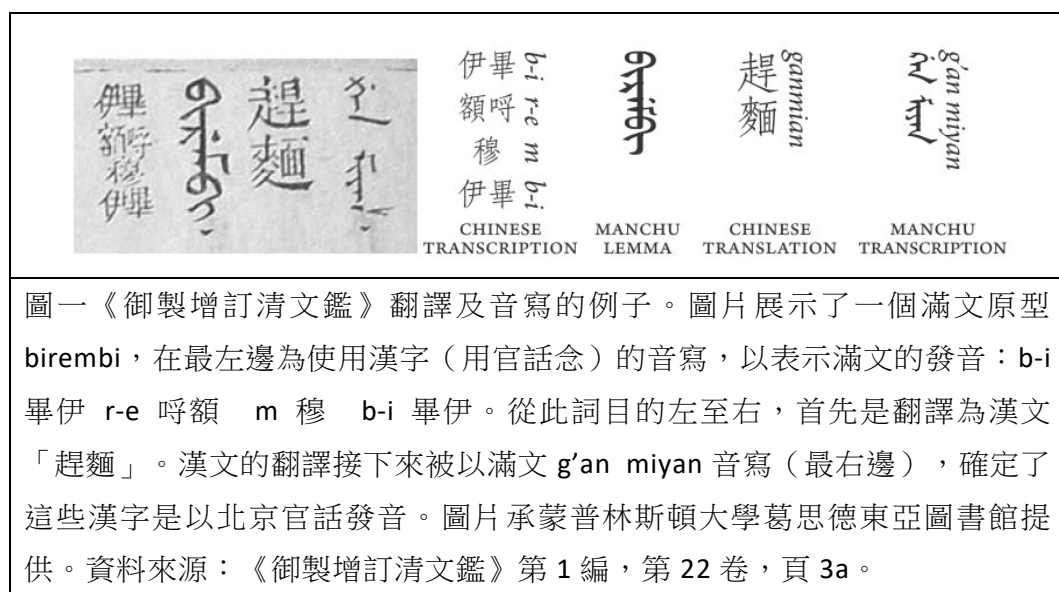
¹⁹ 舉例而言，沈啟亮，《大清全書》（滿：*Daicing gurun i yooni bithe*）（1683 年；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 年再版）。

²⁰ 乾隆皇帝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序言（滿：*šutucin*），冊 1，頁 11b。

²¹ 乾隆皇帝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序言，冊 1，頁 13a。

²² 譯者按：馬騰後來重讀漢文史料，發現過去對此段史料有所誤解，提醒譯者在中譯本更正，以確保讀者能夠準確理解原意。乾隆序言原文若依據滿文斷句為「詮釋具以日用常言期人共曉，其俗解摭拾陳編章句，及以之乎者也為文者悉汰之」，因此「俗解」是《御製增訂清文鑑》清除的對象。序言的滿文將「俗解」譯為 *sesheri suhen*，意為「俗氣的解釋」。

²³ 乾隆皇帝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序言，冊 1，頁 14a。可見 Loretta Kim（金由美），“Illumination and Reverence: Language, Identity, and Power in the Prefaces of the Manchu ‘Mirrors,’” Carsten Naehrer、Stephen Wadley 編，*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nchu Studies*, vol. 2: *Studies in Manchu Linguistics* (Wiesbaden, Ger.: Harrassowitz, 2007), p. 91。



更清楚的是，滿文字母旁的切音被加在漢文解釋的旁邊，表示了漢文是以官話發音來讀的。舉例而言，滿文的 *tumpanahabi*，解釋為「當厭惡地說一個臉大的人時，叫做 *tumpanahabi*」（滿文是 *dere amba niyalma be icakūšame hendumbihede, tumpanahabi sembi*），被翻譯為「臉胖得可厭」，而在其邊上有使用滿文字母注記的官話發音 *lian pang de keyan*。²⁴ 同時，在文鑑裡的滿文字也使用漢字標音，這些標音採用了一套精心且規律的音寫體系，此種轉寫方式讓一個音節可以用至多三個漢字完成標音，而這些漢字是用官話發音。²⁵ 圖一中的例子展示了此種「三合切音」技巧的運作。²⁶

乾隆朝《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者亦注意到了使用另一種語言的文字來表示其他語言發音的音寫方式，他們表示《清文鑑》讓讀者得以「因漢文可以通國書，因國書可以通漢文。」²⁷ 皇帝亦盛讚：「俾等量者，不

²⁴ 乾隆皇帝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序言，冊 1，頁 13a-b。

²⁵ 《御製增訂清文鑑》，冊 1，卷 11，頁 17b-18a。

²⁶ 漢文為三合切音，滿文 *ilan acangga hergen i ešeme mudan*。皇帝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序言，冊 1，頁 13a-b。亦可見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馬騰)，*“Alphabets avant la lettre: Phonographic Experime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1.3 (2016): 238-46。

²⁷ 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二》（1789 年；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再版），卷 41，頁 356。

爽苗髮，而字之淆於不得其音者尠矣。」²⁸ 從乾隆的話可以知道，他認為讀者會使用官話來讀漢文切音；相反地，讀者若使用滿文切音來學習漢文解釋的正式發音，也會因而學習官話。

《御製增訂清文鑑》是清朝滿語研究的產品，而此本著作在日本及朝鮮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清朝出版史上，其代表了分類辭典試圖包含大量語言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其實在該書出版之前就已經開始，而在之後二十年繼續發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兩部滿文分類辭書完成於 1790 年代左右：其中《御製四體清文鑑》包含了滿文、蒙古文、漢文與藏文，《御製五體清文鑑》還添加了回文。滿文在所有宮廷辭書都是排在首位的語言。²⁹

有些產生於此時期而無宮廷直接參與的多語辭典同樣也將滿語排在首位。其中一本，原本出版於 1780 年，作者富俊（滿文：Fugiyūn）是一位高階蒙古旗人及官員，該書呈現了各滿文詞目的漢文與蒙古文翻譯。³⁰ 然而，在富俊完成於 1797 年卻沒有刊印的四體字典中，他首重蒙文，將其個別譯為托忒文、滿文與漢文。³¹ 但整體而言，在 18 世紀由宮廷出版的眾多多語種工具書中，滿文都作為首要語言而被使用。

由於清代的工具書或語言教科書中的滿文是通過漢語方言（通常是指官話）來進行翻譯、標音和描述的，因此通曉漢語方言變成為學習滿文的必要條件。這種潛藏在書中的滿文與漢語方言的連結輸入到日本及朝鮮，

²⁸ 乾隆皇帝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序言，冊 1，頁 13b-14a。

²⁹ 江橋，《乾隆御製四、五體〈清文鑑〉編纂考》，《滿學研究》輯 6（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頁 130-137；*Auf kaiserlichen Befehl erstelltes Wörterbuch des Manjurischen in fünf Sprachen „Fünfsprachenspiegel“: Systematisch angeordneter Wortschatz auf Manjurisch, Tibetisch, Mongolisch, Turki und Chinesisch*, ed. Oliver Corff et al., 7 vols. (Wiesbaden, Ger.: Harrassowitz, 2013), v. 1, pp. xxiv-xxvi；春花，《〈御製五體清文鑑〉編者及編纂年代考》，《滿語研究》2014 年第 1 期，頁 28-33。

³⁰ 富俊（敬齋），《三合便覽》（滿：Ilan hacin i gisun kamcibuha tuwara de ja obuha biṭhe）（蒙：Gurban jūil-ün üge qadamal üjehüi-dür kilbar bulγaysan bičig），卷 12，1780，北京 Minggui tang，1792。（譯註：敬齋並非富俊的字號，而是其父的字號，其父姓名應為明福。可見蔡名哲，《本計是圖，審所先務—〈百二老人語錄〉中的認同與記憶》，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2010，頁 98-101。）

³¹ 富俊，《蒙古托忒彙集》（滿：Monggo tot hergen i acamjaha isabu[ha biṭhe]）（蒙：Mongyol tod üsüg-iyer neileltüküli čuyla[γsan bičig]），油印本，北京大學圖書館，編號：NC 5980.6 3624。關於富俊字典的描述，可見春花，《清代滿蒙文詞典研究》，頁 314-317；故宮博物院編，《同文之盛：清宮藏民族語文辭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 48-49，之中有幾張圖片。

導致這些地方的讀者也需要具備基本的漢語方言知識。然而，如我所說的，日本及朝鮮學者使用這些出現在滿語工具書中的漢文方言的方式，可能與原作者設想的目的不同。

在朝鮮王朝的滿語研究與官話

在十八世紀的朝鮮王朝，清朝的東北地區在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同時也包含語言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為外交目的，口譯人員被政府指派研究與翻譯滿文。此外，除了口譯員外，朝鮮的士人一般認為必須理解東北的地理與清朝的通訊。為了因應中原漢人叛變成功的可能，朝鮮官員與關切時勢的士人渴求能夠讓他們用以保衛北疆的知識，因為若是滿洲人從北京撤退，率領他們的八旗軍可能借道或入侵朝鮮半島。³²

在不穩定的朝鮮—清朝關係下，滿語研究始終帶有政治意圖。在這樣的背景下，十八世紀朝鮮所編纂的四種參考書籍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清代中國出現的滿文分類辭典的影響。以十八世紀的《漢清文鑑》（한청문감, Han-Ch'ŏngmun'gam）為例，漢城官方的口譯員創意地運用清朝的資料來源，編纂了將漢語方言置於滿語之前的參考書。

官方對於朝鮮半島之外的語言的興趣早於滿洲人興起之前。朝鮮政府自十四世紀晚期開始，常設一群通曉中原流行語言（譬如蒙古語或官話）的行政人員。³³在十五世紀，朝鮮宮廷創造一種新字母（現在稱為韓字，한글, han'gŭl）以定義在其統治內的漢字正音，從而鞏固朝鮮王朝在境內的統治以及在以明朝為中心的新國際秩序中的位置。³⁴

³² Bae Woosung (裴佑晟), "Literature on Manchuria during the Qing Period and Korea's Perception of Manchurian Geography during the Late Joseon Period,"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5.2 (2008): 55–84.

³³ Sixiang Wang (王思翔), "The Sounds of Our Country: Interpreters,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Early Chosŏn Korea," in *Rethinking East Asian Languages, Vernaculars, and Literacies, 1000–1919*, ed. Benjamin A. Elman (Leiden: Brill, 2014), pp. 58–95.

³⁴ 鄭多函 (Chŏng Taham, 정다함), 〈麗末鮮初的東亞秩序與朝鮮的漢語、漢吏文、訓民正音〉（麗末鮮初의 동아시아 질서와 조선에서의 漢語·漢吏文·訓民正音），《韓國史學報》36（2009），頁 269-305；鄭多函，〈在「中國」與「國之語音」之間—以鮮初漢文、漢吏文、漢語、訓民正音的關係性為中心〉（‘中國 (동국)’ 과 ‘國之語音 (나랏말싸)’ 의 사이—鮮初漢文·漢吏文·漢語와訓民正音의 관계성을 중심으로），《比較文學》（비교문학）60（2013），頁 255-280。

朝鮮本身與滿洲祖先女真人有著悠久的交往史。³⁵ 該國被捲入明朝與滿洲的衝突，並且在 1620 與 30 年代被新興的清朝入侵兩次。³⁶ 在十八世紀，多數的朝鮮菁英認為他們的國家代表了偉大文化傳統的延續，這一文化傳統在中國已隨著滿洲統治的到來而粉碎。³⁷

在清朝崛起之前的幾個世紀，一些關於女真語與女真文的知識，依然由一些朝鮮政府口譯員維持著。口譯員透過專業的語言考試（譯科，역과，yökkwa），包含漢文官話、日文、蒙古文或女真文（後來的滿文），而獲得專業職位。他們被任命為司譯院（사역원，Sayögwön，舊名通文館，통문관，T'ongmun'gwan）的行政人員。³⁸

在十七世紀晚期，當滿文的辭典編纂開始出現於北京，滿語的書面形式已經由漢城（今日的首爾）及其他地方的口譯員所研究。³⁹ 這些通譯官的主要任務是陪同與協助朝鮮使團。使團人數達數百人，一年數次地從漢城跨境跋涉到北京。許多在文化與政治上有影響力的人物參與了使團，通譯官則在其中擔任許多較低的職位。⁴⁰ 儘管滿文做為北京日常語言的

³⁵ Kenneth R. Robinson, "Policies of Practicality: The Chosŏn Court's Regulation of Contact with Japanese and Jurchens, 1392–1580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7); Adam Bohnet, "'On Either Side of the River': The Rise of the Manchu State and Chosŏn's Jurchen Subjects," in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Landscape of Central and Inner As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d. Michael Gervers, Uradyn E. Bulag (烏·額·寶力格), and Gillian Long (Toronto: Asia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8), pp. 111-25.

³⁶ Erling von Mende, "Korea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Manchu,"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27 (2003): 45-62.

³⁷ Adam Clarence Immanuel Bohnet, "Migrant and Border Subjects in Late Chosŏn Kore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8); Adam Bohnet, "Ruling Ideology and Marginal Subjects: Ming Loyalism and Foreign Lineages in Late Chosŏn Korea,"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15.6 (2011): 477-505.

³⁸ Ki-joong Song (宋基中), *The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the Chosŏn Dynasty (1392–1910)* (Seoul: Jimoondang International, 2001), pp. 1-50.

³⁹ 舉例而言，可見 Erling von Mende, "Zur Kompetenz des Jürchenischen und Manjurischen bei Koreanischen Dolmetschern während der Ming-und-Qingzeit," *Türk Kùltürü Arařtırmaları* 30.1–2 (1992): 197-99.

⁴⁰ Gari Ledyard, "Korean Travelers in China over Four Hundred Years, 1488–1887," *Occasional Papers on Korea* 2 (1974): 3, 5. 徐榮輔編，《萬機要覽》，新編三卷（1808，首爾：Minjok munhwa ch'ujinhoe，1971），卷 1，頁 201-202、542-545；金慶門編，《通文館志》，1720，1778 年擴編與修訂，1888-1907 年資料補注，2 編 12 卷本（1907 年；鏡城：Chōsen sōtokufu [Chosŏn ch'ongdokpu]，1944 年），第 1 編第三卷，頁 1a-5a。

重要性在十八世紀日漸減低，朝鮮使節們依然需要擅長此語言的人。朝鮮代表團參與的國家典禮，至少有部分是以滿文執行。由朝鮮人帶去清廷的書信，由於是用漢文文言寫成，在到達御前之前也需翻譯成滿文。⁴¹ 除非朝鮮代表團能相信完全依賴他們與清朝的仲介人也能確保他們在參與滿洲儀式和書信溝通時的利益，否則他們無法在不具滿文知識的情況下工作。

朝鮮的滿文辭書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有通譯背景的學者所編纂，但更顯赫或者社會地位更高的學者也相當關心滿文辭書編纂工作。朝鮮此時的學術發展對於中國與朝鮮的歷史、地理與語言知識抱有高度興趣。可以稱為詞彙學或是詞源學的學問以及辭書編纂工作，在此段時間都頗有發展。⁴² 朝鮮知識份子對清朝之間語言的差異的關注提升，促使他們對於兩地方言的研究。⁴³

我們對十七世紀朝鮮的滿語研究所知甚少，因為早期的滿語書的書名均已佚失（現僅存於十八世紀的修訂版本中）。第一代朝鮮滿文學者能接觸清廷所出版之書籍，並改編這些書籍以符合他們的目的。舉例而言，朝鮮教科書《三譯總解》（*Samyŏk ch'onghae*），從 1684 年開始使用，包含了來自 1650 年滿文本中國歷史小說《三國演義》。因此《三譯總解》使用了自清朝輸入的滿文文學，但將其轉變為語言學習材料的過程可說是朝鮮編輯者的成果。⁴⁴ 此趨勢下的一個例外是朝鮮對於滿漢版《千字文》的運用，該書在清代的原始脈絡中也是一本教化性質的著作。今日尚存一伴有朝鮮注音的版本（可能是完成於 1778 之前，至少應該比 1690 年

⁴¹ 汪銀峰、姚曉娟，〈韓國燕行使筆下的滿語〉，《滿語研究》2014 年第 2 期，頁 25-26。

⁴² 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之研究：嘉慶道光學壇庾理朝的金阮堂〉，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Yi Pyŏnggŭn (이병근)，〈실학시대의언어연구〉，《韓國歷史市民講座》（한국사 시민강좌）48（2011），頁 113-133。

⁴³ 趙成山（Cho Sŏngsan），〈18 世紀後半至 19 世紀前半朝鮮知識份子的語文認知傾向〉。

⁴⁴ 首爾大學奎章閣編（Sŏul taehakkyo Kyujanggak，서울大學校奎章閣），《奎章閣所藏語文學資料》卷二《語學篇解說》（首爾：T'aehaksa，2001），頁 170-171；崔東權（Ch'oe Tonggwŏn，최동권），《譯注『清語老乞大新釋』》（首爾：博文社，2012），頁 6；鄭光（Chŏng Kwang，정광），《朝鮮時代的外國語教育》（조선시대의 외국어 교육）（坡州：Kimyŏngsa，2014），頁 447。

晚許多），⁴⁵ 表明該書在朝鮮司譯院被當作課本使用。原本在中國以能夠反映官話的滿文切音刊印的《千字文》，到了朝鮮，編者卻將滿文切音和官話都加上了諺文的音寫。學生無法透過此書學習滿語。此書可能是，而且可能實際上也是，被用來練習閱讀滿文文字。由於音節呈現的是漢文字的官話發音，亦即，它們不呈現滿文字，因此該文本只能用來學習官話發音。

現存最早的依照清朝原本寫成的朝鮮滿語研究著作，是 1748 年的分類辭典《同文類解》（*Tongmun yuhae*，其取代了一個較簡單的 1691 年版本，該版本現遺失。）⁴⁶ 此分類辭典依照音韻排列漢文的詞目，並且將其翻譯為韓文與滿文，但其中並無滿文字母，滿文部分只用諺文音寫。漢文的詞目通常是文言文與白話文共有的詞彙，但有時候，尤其是在動詞，可以清楚看到其反映的是白話文。選擇使用白話文顯然是有意的：編輯者在選擇《同文類解》詞目之時，使用了原先為教朝鮮通譯官官話而編輯的分類辭典。⁴⁷ 根基於沿用《同文類解》字彙表的清代出版品的文法論著，在其中，滿文介詞等內容參照漢語的文言文和白話文以及朝鮮語的文法進行解釋。⁴⁸

此分類辭典有一篇安命說（念 *yŏl*，即「悅」字）的跋，之中陳述了玄文恒（*Hyŏn Munhang*）與其他司譯院的老師，在編纂《同文類解》的

⁴⁵ 岸田文隆，〈關於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滿漢《千字文》〉，pt.1，《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要》21（1994），頁 77-133。

⁴⁶ 玄文恒（*Hyŏn Munhang*）編，《同文類解》，收於《八歲兒 三譯總解 少兒論 同文類解》（1748；首爾：延世大學出版部，1956）；這本分類辭典之敘述，可見小倉平，《增訂補注朝鮮語學史》，和野六郎編，第 2 版（東京：刀江書院），頁進 615-616。關於 1691 年的滿文詞彙，可見成百仁（*Sŏng Paegin*，성백인），〈《同文類解》和《漢清文鑑》〉（《同文類解》와《漢清文鑑》），《滿語與阿爾泰語學研究》（만주어와 알타이어학 연구）（首爾：T'aehaksa，1999），頁 75-77。關於 1691 年的滿文詞彙，可見成百仁（*Sŏng Paegin*，성백인），〈《同文類解》和《漢清文鑑》〉（《同文類解》와《漢清文鑑》），《滿語與阿爾泰語學研究》（만주어와 알타이어학 연구）（首爾：T'aehaksa，1999），頁 75-77。

⁴⁷ 關於影響到《同文類解》的《譯語類解》，可見鄭光（*Chŏng Kwang*），〈關於類解類譯學書〉（類解類 譯學書에 대하여），《國語學》7（1978），頁 174-177。

⁴⁸ 樸恩用（*Pak Ŭnyong*），〈《同文類解語錄解》研究（上）—基於李朝時代的滿洲語文法書〉（同文類解語錄解研究（上）—李朝時代의 滿洲語文法書에對하여），《研究論文集》4.3（1968），頁 185-224（這本論文集的全名是《大邱天主教曉星大學研究論文集》（大邱가톨릭曉星大學校 研究論文集））。

六年間，從清朝找尋了幾種滿文工具書。⁴⁹ 這種更進步的滿文知識和對於文本來源的精心處理，使得編者編成了一部更細緻的出版品（安氏的跋是用行書），後由校書館（Kyosŏgwan，或叫芸閣 Un'gak）出版（校書館是中央政府的機構，由高階政務官員李周鎮（Yi Chujin，1691-1749）管理。⁵⁰ 一位參與其中的滿文研究學者叫金振夏（Kim Chinha，活躍於1748-1780），他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亦對許多滿語研究著作的修訂作出貢獻。⁵¹

在 1748 年完成的《同文類解》所參考的清朝著作包括坊刻本與官刻本（表 1）。其中使用最多的是清廷 1708 年出版的單語的《御製清文鑑》。成百仁展示了《同文類解》中滿文詞彙的拼音一般是依照《御製清文鑑》的拼音，證明了此書在朝鮮編纂者心中的重要性。⁵² 即便清朝的資料來源主要是以滿語為首，其中甚至有不包含任何漢文的《御製清文鑑》，但是玄文恒及其同僚選擇完成一本以漢文的白話文為首的分類辭典。確實，從纂修人員名錄來看，漢語研究的官員比滿語學者更多，而這些漢語研究官員也排列在名錄的前面。⁵³

表 1：1748 年朝鮮分類辭典《同文類解》可使用的清朝資料來源

來源 a	編輯年與刊印年	刊印者類型
大清全書	1683、1713	商務
滿漢同文全書	1690	商務
新刻清書全集	1699、未標示	私人及可能商務

⁴⁹ 見《同文類解》的跋，頁 281-282。我依據鄭光的著作翻譯 An Myŏng'yŏl 的名字，可見鄭光，〈《清語老乞大新釋》與清學四書〉（『清語老乞大新釋』斗清學四書），《譯學書研究》（Yŏkhaksŏ yŏn'gu 역학서연구）（首爾：J & C，2002），頁 630。

⁵⁰ 關於編纂者的滿文知識，可見成百仁（Sŏng Paegin），〈《同文類解》和《漢清文鑒》〉，頁 86。關於校書館，見方孝順（Pang Hyosun），〈通過《芸閣冊都錄》看的關於校書館藏書的研究〉（「芸閣冊都錄」을 통해 본 校書館 藏書에 관한研究），《書志學研究》8（1992），頁 109；千惠鳳（Ch'ŏn Hyebyong），《韓國典籍印刷史》（首爾：泛友社，1990），頁 140。

⁵¹ 關於金振夏（Kim Chinha），可見鄭光，〈《清語老乞大新釋》與清學四書〉，包含了這些注釋。

⁵² 成百仁，〈《同文類解》和《漢清文鑒》〉，頁 83。

⁵³ 《同文類解》，頁 283-284。

滿漢同文類集 b	未知	商務
滿漢類書 b、c	1700、1701、1706	私人、地方政府、商務
同文廣匯全書 b	1693、1700、1702	商務
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御製清文鑑）	1708	皇家
清文備考	1722（兩版本）其中一個可能稍晚	私人
音漢清文鑑	1735 有幾個版本，有些可能較晚	商務
<p>a 使用於編纂的朝鮮材料並未得見。清朝書籍在程度上如何影響《同文類解》，可見成百仁，〈《同文類解》和《漢清文鑑》〉。</p> <p>b 刊印版本之間的標題不同</p> <p>c 朝鮮編輯者可能使用</p>		

《方言類釋》（Pang'ŏn yusŏk）是一本收錄朝鮮周遭地區語言的多語分類辭典，同樣包含了滿文。⁵⁴ 此書從未刊印，但曾由著名官員及知識份子徐命膺（Sŏ Myŏng'ŭng, 1716–1787）進獻給朝鮮國王。⁵⁵ 徐命膺的序言簡述了自中國古代以來對於方言差異的研究傳統，以及中國學者為描繪這些差異所進行的辭書編纂工作。同時，他稱《方言類釋》的必要性被呈現為這一中國傳統的延續，並源於朝鮮頻繁的國際交流。徐氏序文說：⁵⁶ 「我國西通中州，北臨清蒙，南連倭蠻，使節來往幾乎無年不相接。」⁵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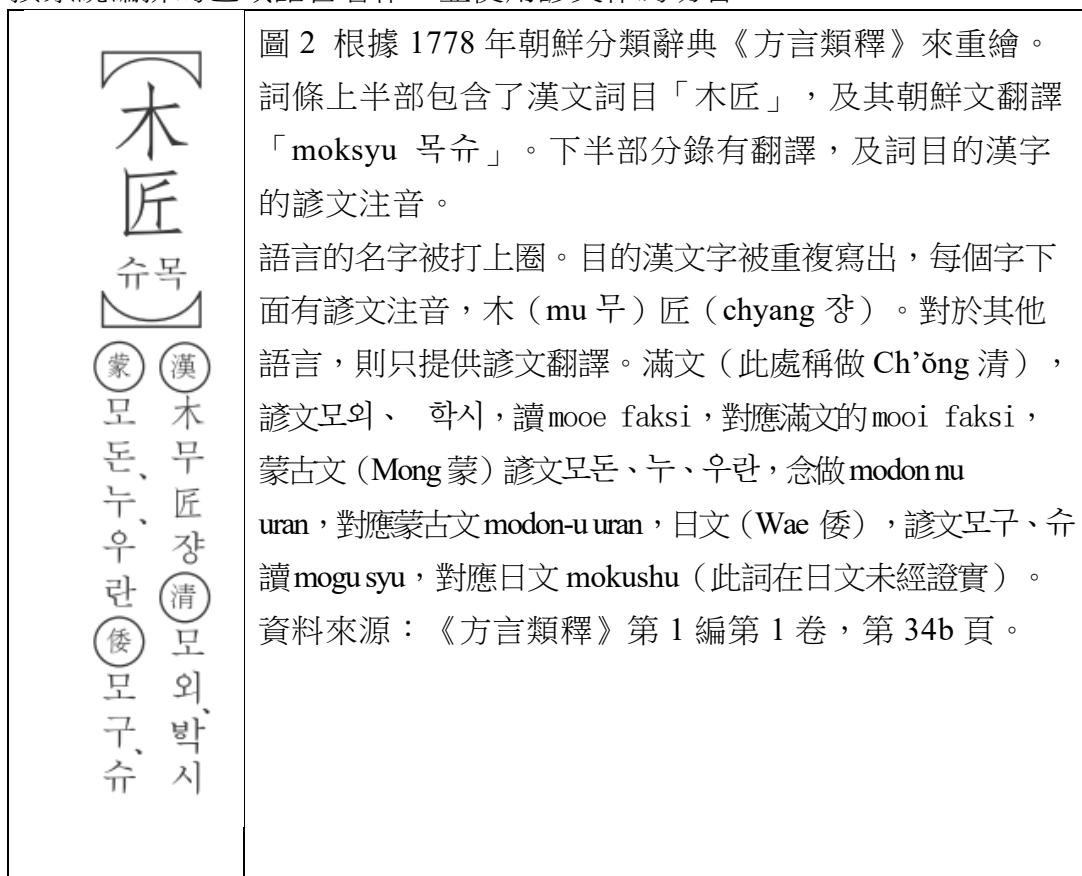
⁵⁴ 洪命福（Hong Myŏngbok）編，《方言類釋》，[約成於 1781 年左右]二編四卷本，普林斯敦大學東亞圖書館微卷，編號：No. K00205（標題寫為《方言集釋》）。
<https://pulsesearch.princeton.edu/catalog/3899466>。

⁵⁵ 金文植（Kim Munsik 김문식），〈徐命膺的生涯和奎章閣活動〉（徐命膺의 생애와 규장각 활동），《精神文化研究》（정신 문화 연구）2（1999），頁 151-184。

⁵⁶ 徐命膺死後，標題中的「yusŏk」一詞，被改為集釋（chipsŏk）。可見安田章，〈《方言集釋》小考〉，《朝鮮學報》89（1978），頁 72，另可見《奎章閣所藏語文學資料》，第 2 編，頁 135。在現存的手抄本中，25 個篇章僅 13 篇留存。見部分再印摘要本，〈〔方言輯釋〕解題〉，《日本學》6（1987），頁 222。亦可見金芳漢，〈「三學譯語」「方言集釋」考——以蒙古語相關資料為主〉，《白山學報》1（1966），頁 101-105。

⁵⁷ 洪命福之《方言類釋》序言，冊 1，頁 1b。

如此頻繁與周邊國家接觸，使朝鮮持續地需要外國語言的知識。然而，徐命膺指出陪伴使節的通譯官所研讀的外國語言實際上並未被使用，因此他另外要求洪命福（Hong Myǒngbok，生於 1733 年，在 1753 年通過譯科考試），⁵⁸以及其他由徐命膺掌管的通譯官，一同完成一部包含最新知識且按系統編排的區域語言著作，並使用諺文作為切音。



洪氏與其同僚編纂的分類辭典詞目表，由漢文字及詞彙組成，與《同文類解》十分類似，以諺文切音多種語言。各條目以漢文詞目由上開始。緊接著底下是韓文翻譯，再下來是以諺文表示如何以官話讀該漢字的注

⁵⁸ 〈Hong Myǒngbok 洪命福〉、〈홍명복 (洪明福)〉，韓國學中央研究院（한국학중앙연구원）編，《韓國歷史人物綜合資訊系統（한국역대인물종합정보시스템）》（南韓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韓國學中央研究院，2011？—），查詢日期：2017 年 7 月 27 日，<http://people.aks.ac.kr>。

音，接下來是詞目的滿、蒙、日文翻譯（並非每一詞條都有這些語言）。除了漢文之外的語言都是以諺文音寫，並非是其本身的字母書寫。

不少詞目展示了許多白話文的詞法與句法。如同在《同文類解》，分類辭典首重的語言是漢文白話文，而非文言文。白話文的諺文音寫，進一步地證明了所謂的白話文是官話。《方言類釋》的一些篇章包含了題為「中州鄉語」（Chungju hyang'ŏ）的附錄，表列了朝鮮編者不認為是官話的漢文詞條。他們可能從中國地方志與其他工具書中搜集這些詞彙，⁵⁹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這些中國方言詞彙的漢字沒有諺文的官話標音。

《漢清文鑑》約略在同時問世。其編纂可能開始於 1779 年或更早，而可能在 1788 年之前刊印。⁶⁰ 金振夏參與了其編纂，但大多數的工作是由李湛（Yi Tam 或 Yi Su 李洙，1721-1777）承擔。他是一位擅長漢文官話的通譯官。⁶¹ 最後總計有四十人參與此分類辭典的編纂，然後由校書館刊印。⁶²

該著作的完成代表了朝鮮外語研究在使用滿文字母以及合理音寫形式的高峰。《漢清文鑑》是一個對朝鮮人在北京購得的 1773 年的《御製增訂清文鑑》的再編輯作品，其加上了韓文翻譯及切音。⁶³ 然而，《漢清文鑑》不僅只是清朝原本加上韓文注解。成百仁寫道：「最重要的是，這是對清代分類辭典『獨一無二，無所不包的研究專著』，並由具有『深入且廣博的滿漢文知識』的人寫成。」⁶⁴ 如同其他此類書籍，《漢清文鑑》

⁵⁹ 大塚秀明，〈關於《方言集釋》中的「中州鄉語」——殘存在朝鮮資料中的中國方言記錄〉，《言語文化論集》31（1990），頁 83-94。

⁶⁰ 《漢清文鑑》的原始雕版是由李湛與金振夏編纂。這本書在再印者創作的標題下再版，延禧大學東方學研究所，《韓漢清文鑑》，卷 15（首爾：延禧大學校出版部，1956），內有閔泳珪的序言。原始刊印年代是推測的。編者對《韓漢清文鑑》的介紹，頁 8，推測是 1779 年刊印，另外小倉進平，《增訂補注朝鮮語學史》，頁 619-620，則推測是 1775 年。

⁶¹ 小倉進平，《增訂補注朝鮮語學史》，頁 619-620；鄭光，〈《清語老乞大新釋》與清學四書〉，頁 635；李押，《燕行記事》[1778]，收於《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冊 20（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 31。

⁶² 成百仁，〈《漢清文鑑》解題〉，《滿語與阿爾泰語學研究》，第 12 頁。

⁶³ 洪善杓（Hong Sŏnp'yo 홍선표），《17、18 世紀朝鮮的外國書籍收容與閱讀狀況》（세기 조선의 외국서적 수용과 독서실태—목록과 해제）（首爾：Hyeon，2006），頁 169。

⁶⁴ 成百仁，〈《漢清文鑑》解題〉，頁 25。

前有「凡例」，說明該詞典用的發音與音標的音寫方法。李湛及其團隊通曉《御製增訂清文鑑》中使用的切音系統，他們參考該系統並用來建立諺文音寫漢文白話文與滿文的系統。加強朝鮮通譯官這兩種語言的口語熟練程度，是編輯此書的主要目標。

因此，《御製增訂清文鑑》這本原為加強滿語在中國的地位的著作，反而在朝鮮被當作學習漢文官話的資源。朝鮮的編輯者直截了當地將這合璧分類辭典當作精進當代漢語（即官話）的發音與詞彙的資料。他們說：

清文鑑本為校定清語而作，故專以清語為主，凡係事物無不備載，且有注釋，纖悉該暢，實清語之淵藪，至若漢語則不過附揭而傍，照狀其所為，語率適時用，亦足為後學蹊徑，且章程事例間多可觀，而所欠者無注釋耳，若不文以注之，諺以釋之，則恐無以曉解，故更加編摩，改定體制，首著漢語而系以新注下附清語，而仍用原釋，庶漢清二語詳略得中，覽閱俱。⁶⁵

《漢清文鑑》扭轉了北京朝廷所推動的將滿語放在所有語言中心的語言秩序。在《漢清文鑑》中，如同《方言類釋》（圖 2），每個詞條由官話起頭，滿文並未緊接其下出現，而是被降低到第三順位，位於諺文音寫及朝鮮翻譯或是漢文文言文注解的白話文之下。所有滿洲文字也都從目錄中移除，朝鮮的出版品只包含了《御製增訂清文鑑》原有篇章的漢文標題。今西春秋斷言《漢清文鑑》是一本「中國語辭典」，特別是「當時的北京官話」。⁶⁶ 如同其他韓文作品一般，而與來自清朝的原始材料截然不同，李湛的《漢清文鑑》給予漢語官話較滿文更為顯著的位置。

確實，成百仁表明了《漢清文鑑》的朝鮮編輯者還以其他方法降低了滿語的地位。當人名或語言在分類辭典中表列時，李湛及其團隊改變原本將滿人放在前面、緊接諸申，蒙古，朝鮮及漢人的順序，⁶⁷ 而將其改以

⁶⁵ 朝鮮編纂者的〈凡例〉，於《漢清文鑑》中再刊印，頁 1a。這段英文翻譯轉引自成百仁，〈《漢清文鑑》解題〉，頁 23。

⁶⁶ 今西春秋，〈漢清文鑑解說〉，《朝鮮學報》12（1958 年），頁 29。

⁶⁷ 譯者註：《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10，〈人部一·人類一〉所收錄的相關詞條依序為：niyalma（人）、manju（滿洲）、jušen（滿洲臣僕）、monggo（蒙古）、ujen cooha（漢軍）、solho（高麗人）、nikan（漢人），頁 137-138。

漢人為首、之後是朝鮮人、滿人、女真及蒙古人。⁶⁸ 將漢人放於朝鮮人之前對司譯院中具有國際觀的學者來說頗為合理，但他們無法接受將滿人放在首要的位置。

然而，更重要的是《漢清文鑑》的編纂者將《御製增訂清文鑑》當作學習漢文官話的資料來源。與此不同，在清代中國，這本書的出版是屬於滿語研究系列叢書的一部分（儘管《四庫全書總目》的編輯認為可以用這本書學漢文）。編纂《漢清文鑑》的朝鮮學者則認為《御製增訂清文鑑》在作為官話發音的參考資料上特別有用，他們對其中的知識如此評價：「我人之酬酢漢語不善相曉者，專由字音之未協耳。」⁶⁹ 編輯者繼續解釋道，「蓋我人（按：即朝鮮許多學漢文的學生）所習漢音，一從《四聲通解》」（Sasŏng t'onghae, 1517）。⁷⁰ 在當時，這本韻書已經問世超過兩個世紀，其中，字的音韻以及釋音，都「已多不同」於《御製增訂清文鑑》。更早的朝鮮韻書表明了漢語發音單音節諺文注釋，但是《御製增訂清文鑑》使用的三合切音系統，官話字的讀音被用滿文字母音寫出來（圖1）。一旦讀者「知此法則乎字得其音」，這比使用舊的諺文系統好。⁷¹ 為了更精確地傳達當時的官話發音，李湛及其團隊在《漢清文鑑》中加上了新的諺文注音，此注音以滿文字母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中的音寫為基礎。在《漢清文鑑》的倒數第二稿與其最終版本中對於注音的許多修正，顯示出編纂者對注音的重視。⁷² 由於該書使用了頗受清朝滿語研究傳統影響的注音方式，朝鮮讀者可以透過《漢清文鑑》而接觸到原來載於《御製增訂清文鑑》的官話讀音。

《漢清文鑑》並非僅供有通譯背景的人使用。李義鳳（Yi Ŭibong，原名

⁶⁸ 成百仁，〈《漢清文鑑》解題〉，頁 42-43。舉例而言，比較《御製增訂清文鑑》第 1 編卷 10，頁 3b-5a，與《漢清文鑑》卷 5，頁 28a-b。

⁶⁹ 朝鮮編纂者的〈凡例〉，於《漢清文鑑》中再刊印，頁 1b。

⁷⁰ 崔世珍（Ch'oe Sejin），《四聲通解》，刻本之微卷[1614 年]，編號：奎貴 1593，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

⁷¹ 朝鮮編纂者的〈凡例〉，於《漢清文鑑》中再刊印，頁 1b。

⁷² 李湛與金振夏（Yi Tam and Kim Chinha），《漢清文鑑》，刻板第一版附邊注，共 7 冊，冊 2，頁 8a，[1780s]。東京大學法律所圖書館，編號：J10264 E44 C 五 30.00 1-7 法研。亦可見樸恩用，〈關於初刊漢清文鑑〉（初刊漢清文鑑에 대하여），《研究論文集》8.1（1971），頁 145-146。

李商鳳 Yi Sangbong, 1733–1801) 為徐命膺的外甥且為官方菁英成員，⁷³ 將此分類辭典用於其巨著—1789 年開始編寫的 23 卷本的《古今釋林》手寫彙編。⁷⁴ 此彙編從上千個著作選取了字詞與詞語，這些著作中包含了全部中國與朝鮮的文學傳統。資料根據其地點以及摘取來源的文類編排，而各篇中則根據表列詞語的字數編纂。在語言彙編中包含了日文、蒙古文與滿文（使用漢字音寫）。李義鳳將李湛的《漢清文鑑》只當作漢文白話文的材料，而不是滿文。他摘錄了李湛的分類字典中的漢文白話文詞目，包含朝鮮文翻譯與使用諺文的官話音寫。舉例來說，白話漢文介詞「把」，之後接著其韓文翻譯介詞(으)로 ((ǔ)ro)，接著是其官話音寫마 (pa，即「把」字的讀音)。李湛的分類字典中的滿文內容並未被收錄。⁷⁵

確實，在有通譯背景的人以外，對滿文有興趣的人通常對漢文白話也有興趣。舉例而言，柳得恭 (Yu Tŭkkong, 1748–1807)，其歷史家的身份最為人知，寫了一篇短論文《滿洲語》，該文參考了《漢清文鑑》，其中他表達了他認為漢語的白話文的發音是「蕃漢相雜」的結果。⁷⁶ 對柳得恭而言，漢文官話在某方面而言也是滿語的變種。對朝鮮知識份子而言，官話顯然比滿語更適合作為國際溝通的語言。當一位來自清朝西域的回回王公詢問朴趾源 (Pak Chiwŏn, 1737–1805) 說滿語還是蒙語時，朴趾源回答說：「兩班（指高階官員）安知蒙滿話」。⁷⁷

⁷³ 見編者對李商鳳（李義鳳）的介紹，《北轅錄》，《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冊 16-17，冊 16，頁 3。

⁷⁴ 李商鳳（李義鳳），《古今釋林》，冊 4 卷本 40，1789（首爾：Asea munhwasa，1977 年再印）。亦可見鄭寅普，《薈園國學散藁》（首爾：文教社，1955），頁 6-9；金芳漢，〈「三學譯語」「方言集釋」考〉，頁 93-101；Chŏn Sugyŏng (전수경)，〈1760 年李徽中、李義鳳父子所碰見的西歐：以北轅錄為中心〉（1760 년 이휘중 (李徽中) · 이의봉 (李義鳳) 부자가 만난 서구: 『북원록 (北轅錄)』을 중심으로)，《韓國文學的語言橫斷的實踐和東亞》（한국문학의 언어횡단적 실천과동아시아），特刊，《民族文學史研究》（민족 문학사 연구）55（2014），頁 12。

⁷⁵ 李商鳳（李義鳳），《古今釋林》冊 3 卷 23，頁 325。

⁷⁶ 柳得恭 (Yu Tŭkkong)，《冷齋書種》，手抄卷本 4，[1796]，卷 2，頁 100-104，編號：한귀古朝 90-4，韓國國家圖書館數位閱讀室典藏。<http://www.nl.go.kr/nl/index.jsp>。

⁷⁷ 見徐浩修(Sŏ Hosu)，《燕行紀》卷 4，乾隆 55 年（1790 年）10 月 22 日條，收於弘華文編，《燕行錄全編》第 3 編，冊 4（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全 4 卷，卷 4，頁 481。亦可見樸趾源(Pak Chiwŏn)1780 年遊記的紀錄，《熱河日記》，收於《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冊 22-23（上海，復旦大學出版，1932，2011 年再版），全 26 卷，冊 23，卷 14，頁 81a。

會說滿語的朝鮮通譯官或許在十八世紀間逐漸減少。⁷⁸ 司譯院的學者不再承擔如分類辭典或課本一般重要的編輯計畫。至少在十八世紀中葉，通譯考試需求也大幅度降低。⁷⁹ 至此，或許精通漢文白話文就已足夠處理大部分在北京的商務需求。為了學習漢文白話文，朝鮮通譯擁有數種工具書，而一些學習漢文白話文的工具書是根基於滿文材料。

滿文、官話及世界其他語言在江戶時代的日本

日本的狀況則與朝鮮截然不同。日本與清朝沒有官方聯繫，且日本直至十八世紀早期都沒有官方支持的滿語研究。在如此環境下，滿語研究本質上與清朝關係不大，而與日本北方邊境變動中的地緣政治有較大關係。此外，日本學者帶著學習荷蘭語的經驗來研究滿語，這種經驗影響了他們與滿語的相遇。然而在日本跟在朝鮮一樣，滿語是透過漢語白話文被接受，並重複地在語言彙編的結構中被置於次要地位。

當滿洲人征服北京，日本已經由建基於江戶（東京）的德川幕府統治了幾十年。德川幕府承續了一個政治分裂與戰爭的時代，而日本在當時接觸了許多外國文化。在德川時代，日本基本上只有西南的幾個區域維持著與中國、荷蘭及朝鮮的貿易與交流，再加上荷蘭定期的參訪江戶。⁸⁰

在十八世紀，許多日本學者不信任亞洲大陸上的清朝政權，並將其文化描繪成低於滿洲統治之前的明朝以及江戶時代的日本。與此同時，漢文文言文與白話文的知識在日本逐漸增加，一些人甚至學習說某些北方發音的白話文。⁸¹ 漢文與日文這時都成為語言學習的主要焦點。⁸² 西南（長

⁷⁸ 李押 (Yi Kap)，《燕行記事》，頁 393。Mende, “Zur Kompetenz des Jürčenischen und Manjurischen,” p. 205；朴元吉 (Pak Wŏn'gil, 박원길)，《朝鮮與蒙古：在崔德中、朴趾源、徐浩修的旅行日記裡反映的蒙古認識》(조선과 몽골: 최덕중·박지원·서호수의 여행기에 나타난 몽골 인식) (首爾：Sonamu, 2010)，頁 421-422、429-430；汪銀峰、姚曉娟，〈韓國燕行使〉。

⁷⁹ 我從鄭光的文章得到這個結論，鄭光，〈譯科清學與清學書〉(譯科清學과清學書)，《譯學研究》，頁 532-549；鄭光，《朝鮮時代的外國語教育》，頁 451-466。

⁸⁰ 舉例而言，Robert I. Hellyer, *Defining Engagement: Japan and Global Contexts, 1640–18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⁸¹ 舉例而言，Emanuel Pastreich (貝一明)，“Grappling with Chinese Writing as a Material Language: Ogyū Sorai's Yakubunsente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1 (2001): 119-70。

崎與附近的對馬島)的通譯與商人首先為了貿易而研讀荷蘭文、漢文白話文、與數種東南亞語言。⁸³ 之後，江戶的藥學與天文學學者則特別對荷蘭文有興趣。⁸⁴

滿語詞彙出現在十七世紀關於一群被困於中國的日本商人或漁夫的報告中。⁸⁵ 這些詞彙應該來自水手，但也可能取自滿洲統治中國之前的書面女真文單字的標音。

日本對滿語的持續研究應不早於 1710、20 年代的荻生徂徠(1666—1728)與荻生北溪兄弟。荻生徂徠的研究是因兩本滿語教材抵達日本而得以完成：一本是漢文切音的滿文《十二字頭》音節表，大約是在十八世紀之交來到日本，另一本是滿漢《千字文》，該書 1685 年刊印於北京，1698 年於日本再出版，日後又再出版。⁸⁶ 荻生徂徠的滿文研究專注於音節表的分析，約寫成於 1711 年到 1716 年之間。⁸⁷ 荻生徂徠既不知道如何說滿語也無法正確地念滿文書面作品。荻生徂徠能夠從他所掌握的相對簡單的滿文出版品中解讀出任何內容，只能歸因於他對漢語白話文的了解(他也是因為對漢語白話文感興趣而對其進行研究)。⁸⁸ 透過學習漢字

⁸² Susan L. Burns, *Before the Nation: Kokugaku and the Imagining of Community in Early Modern Japa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Viktoria Eschbach-Szabo, “La réflexion linguistique au Japon,” in vol. 1 of *Histoire des idées linguistiques*, ed. Sylvain Auroux (Liège: Pierre Mardaga, 1989), pp. 459-64.

⁸³ 和田正彥，〈關於長崎唐通事中的異國通事—以東京通事為中心〉，《東南亞—歷史與文化》9 (1980)，頁 24-50；田代和生，〈對馬藩的朝鮮語通詞〉，《史學》60.4 (1991)，頁 59-90。

⁸⁴ Grant K. Goodman, *Japan and the Dutch, 1600–1853* (Richmond, Surrey, UK: Curzon, 2000), pp. 33, 37, 47, 66.

⁸⁵ 關於 1646 年的商務報告，新村出，〈本邦滿洲語學史料斷片〉，收於《東方言語史叢考》(東京：岩波書店，1927)，頁 98-99。其中滿文字難以辨認，舉例而言，酒被注音為 *atsukr* 或 *akke* (滿文 *arki?*)，馬被注音為 *mōre* (滿文 *morin?*)。關於 1644 年的在地漁民，見內藤湖南，《日本滿洲交通略說》，收於《內藤湖南全集》卷 8 (東京：築摩書房，1969)，頁 252。

⁸⁶ 神田信夫，〈荻生徂徠的「滿文考」與《清書千字文》〉，《清朝史論考》(東京：山川出版社，2005)，頁 418-431；Walter Fuchs (福華德)，“Neue Beiträge zur Mandjurischen Bibliographie und Literatur,” *Monumenta Serica* 7.1/2 (1942): 22.

⁸⁷ 荻生徂徠，〈滿文考〉，收於《言語篇》，收於神田信夫、戶川芳郎編，《荻生徂徠全集》(東京：みすず書房，1974)，頁 698-726。神田信夫，〈荻生徂徠的「滿文考」〉；上原久，〈關於《滿字考》〉，《埼玉大學紀要，人文科學篇》37 (1988)，頁 3。

⁸⁸ Emanuel Pastreich, “Grappling with Chinese Writing.” 亦可見 Emanuel Pastreich (頁一

切音的白話文發音，荻生徂徠得以發出接近滿文文本的發音。

荻生北溪對滿語的研究看來是受限於在 1720 年傳到日本的《大清會典》中漢文切音的滿文字。荻生深陷這些滿文衍生詞的泥淖，因此查閱了有關長崎中國人的中國法律事務的採訪紀錄，並親身進行了相關訪談。部分意思未明的漢文詞彙便透過白話文釋義而得知。⁸⁹

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早期，江戶時代的學者尋求滿文資訊，是作為獲取中國資訊的一種方式。在 1774-1775 年，平澤旭山（元愷，1733-1791），是當時一位地方執法人員的隨從，向一位來自杭州的參訪學者詢問了關於蒙語、滿語及滿洲禮俗等問題。⁹⁰ 此外，未曾使用滿文材料的學者也編纂了多語的書籍。在長崎，由十七世紀、幕府開始海禁之前的商人帶回的語言知識持續發展到十八世紀晚期。舉例而言，一本落款 1796 年（寬政八年）的選輯，是根據早期的材料與通譯家族之間的口耳相傳。一位身為越南後裔的通譯選錄了他的母語與蒙兀兒波斯語。這本選輯有可能是由幕府的當地當權者下令編纂。⁹¹

在江戶時期，滿文的使用往往受限於荻生徂徠所使用的滿漢音節表。舉一個當時對於外國文字有廣泛興趣的學者的生動例子。前野良澤（1723-1803），一位專攻荷蘭藥學研究的學者，提及一本《八種字考》。該書現已不存，但據說其包含了韓文、蒙古文、韃靼文（幾乎可確定指的是滿文）、印度文、馬來文、希臘文、希伯來文與荷蘭文的文字樣本，後來補上了俄文。⁹² 其他荷蘭研究的學者據說學習了所有相似的語

明), *The Observable Mundane: Vernacular Chines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Literary Discourse on Popular Narrative in Edo Japan* (Seoul: Seoul University Press, 2011) 第三章; Olof G. Lidin, "Vernacular Chinese in Tokugawa Japan: The Inquiries of Ogyū Sorai," *Japonica Humboldtiana* 14 (2011): 5-36.

⁸⁹ 舉例而言，姑娘在滿文為 *gege*（姊、公主）。楠木賢道，〈江戶時代享保年間日本有關清朝及滿語研究〉，阿拉騰譯，《滿語研究》2013 年第 1 期，頁 78。

⁹⁰ Osamu Ōba (大庭修), "Chinese Travelers to Nagasaki in the Mid-Qing Period: The Case of Wang Peng," in *Sagacious Monks and Bloodthirsty Warriors: Chinese Views of Japan in the Ming-Qing Period*, ed. Joshua A. Fogel (傅佛果) (Norwalk, CT: EastBridge, 2002), p. 120.

⁹¹ 長島弘，〈關於《訛詞長短話》的蒙兀兒語—近代日本的印度認識的一個側面〉，《長崎縣立國際經濟大學論集》19.4 (1986)，頁 133-168；和田正彥，〈關於長崎唐通事中的異國通事〉，頁 33-34。

⁹² 新村出，〈滿洲語學史料補遺〉，《藝文》5.7 (1914)，頁 78。據說前野良澤還寫

言或文字。⁹³ 前野對東北亞語言的認識並不令人驚訝，而他提到東南亞用的語言也不奇怪，後者通過中國主導的長崎貿易與日本有聯繫。佛教傳統也維持了一些印度文的知識，而關於猶太—基督教傳統的古典語言的文字和語句，則可以在日本流傳的荷蘭書籍裡面找到。俄文無疑也能在荷蘭書籍中被提到，但是前野可能在俄國船隻在十八世紀晚期出現於日本群島後，意識到了俄文的重要性。⁹⁴

十八世紀之交的國際事務的狀況極大地影響了高橋景保（外文名：Johannes Globius）的一生，使得他成為了江戶時代的日本最多產的滿語研究學者。⁹⁵ 跟隨其父親的腳步，其父是一位對荷蘭有高度興趣（但知識較少）的幕府天文學家，高橋景保工作於幕府的天文方，負責日本的世界地圖的製作，1811 年之後，他在自己建議成立的機構內從事翻譯荷蘭書籍的工作。⁹⁶ 當時，幕府仰賴高橋的外語能力處理沙皇政府遞送給日本的外交文書，這些文書旨在解決俄國船隻與日本當局之間不時發生的衝突。然而俄羅斯人無法寫出正確、一致且易懂的日文文書，所以他們附上了幾個其他語言的翻譯，包含了滿文與法文。⁹⁷ 俄國使用滿文做為一種國際語言、且之中並無清政府參與的使用，源於其透過伊爾庫茨克（Irkutsk）與中國的聯絡（與日本的書信也從那裡送出），也符合此時西

了一篇關於「蒙古字音」的專題；杉本つとむ，《江戶時代蘭語學的成立及其開展》，全 5 卷，卷 2，頁 175。

⁹³ Goodman, *Japan and the Dutch*, pp. 79, 144-45; William David Fleming, "The World Beyond the Walls: Morishima Chūryō (1756–1810)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te Edo Fiction"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p. 462; 新村出，〈本邦滿洲語學史料斷片〉，頁 100。

⁹⁴ Brett L. Walker, "Mamiya Rinzō and the Japanese Exploration of Sakhalin Island: Cartography and Empire,"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33 (2007): 292-94.

⁹⁵ 杉本つとむ，《江戶時代蘭語學》卷 4，頁 524；Goodman, *Japan and the Dutch*, pp. 128, 187。

⁹⁶ Yulia Frumer, "Before Words: Reading Western Astronomical Text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Japan," *Annals of Science* 73.2 (2016): 170-94；新村出，〈高橋作左衛門景保的事蹟〉，收於《新村出選集》，4 卷本（東京：甲鳥書林，1943），卷 2，頁 123-128。

⁹⁷ Mariya Sevela, "Aux origines de l'orientalisme russe: Le cas des écoles de japonais (1705–1816)," *Archives et documents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et d'épistémologie des sciences du langage*, 2nd ser., 9 (1993): 1-66; Peter Kornicki, *Castaways and Orientalists: The Russian Route to Japan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Paolo Beonio-Brocchieri Memorial Lectures in Japanese Studies (Venice: Università Ca' Foscari Venezia, 1999).

方學者比起漢語文言文更偏好滿語的普遍習慣。

正確解讀這封信件的需求是促使高橋進行滿語研究的直接原因。高橋得到馬場佐十郎（1787-1822）與吉雄忠次郎（1787-1833）的協助，兩人都是荷蘭研究的通譯，且都擅長於漢語白話文。馬場具備多種語言的知識，可能協助高橋熟悉滿文。杉本つとむ論證高橋是第一位也是最著名的「高級官員型的政治家，而不是學者。」⁹⁸ 不管獲得誰的協助，高橋在那些年頭確實並非獨自一人研究清朝的國語。「滿語研究似乎在〔1810年代〕的知識份子之間有一場榮景，這是對於幕府 1808（文化五年）的命令的回應，該命令要求〔日本的〕中國通譯學習滿文」⁹⁹

高橋與其團隊靠著清代的工具書，完成了俄國信件的翻譯，工具書中包含了《御製增訂清文鑑》。¹⁰⁰ 高橋以工具書中的漢語白話文作為媒介，將滿文翻譯成日文（見圖 3）。¹⁰¹ 高橋或其助手翻譯某些滿文字時，特別是文法上的介詞（比如所有格與賓格 i 與 be），是先將其翻譯為「漢土的俗話」中的對應詞「的」與「把」，然後才翻譯為日文。¹⁰²

⁹⁸ 杉本つとむ，《江戶時代蘭語學》卷 4，頁 544、550。

⁹⁹ 杉本つとむ，〈高橋景保編《亞歐語鼎》之考察〉，《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紀要》18（1977），頁 12。

¹⁰⁰ 上原久，《高橋景保之研究》，東京：講談社，1977，頁 895-899；Okada Hidehiro（岡田英弘），“The Manchu Documents in the Higuchi Ichio Collection on the Takadaya Kahee Incident and the Release of Captain V. M. Golovnin,” in *Tumen jalafun jecen akū: Manchu Studies in Honor of Giovanni Stary*, ed. Alessandra Pozzi, Juha Antero Janhunen, and Michael Weiers (Wiesbaden, Ger.: Harrassowitz, 2006), p. 199；1810 年（文化 7 年）前往長崎的中國船隻上有兩個版本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大庭修，《江戶時代的唐船持渡書研究》（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1967），頁 424-425。

¹⁰¹ Contra Clement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p. 183.

¹⁰² 高橋景保，〈魯西亞國呈書滿文訓譯強解〉〔1810〕，日本國家檔案館內閣文庫，編號：和 42854。此手抄本沒有頁碼，關於此對高橋的引述，見以滿文詞彙“elhe be baime”（請安）為首的篇章。（也可以見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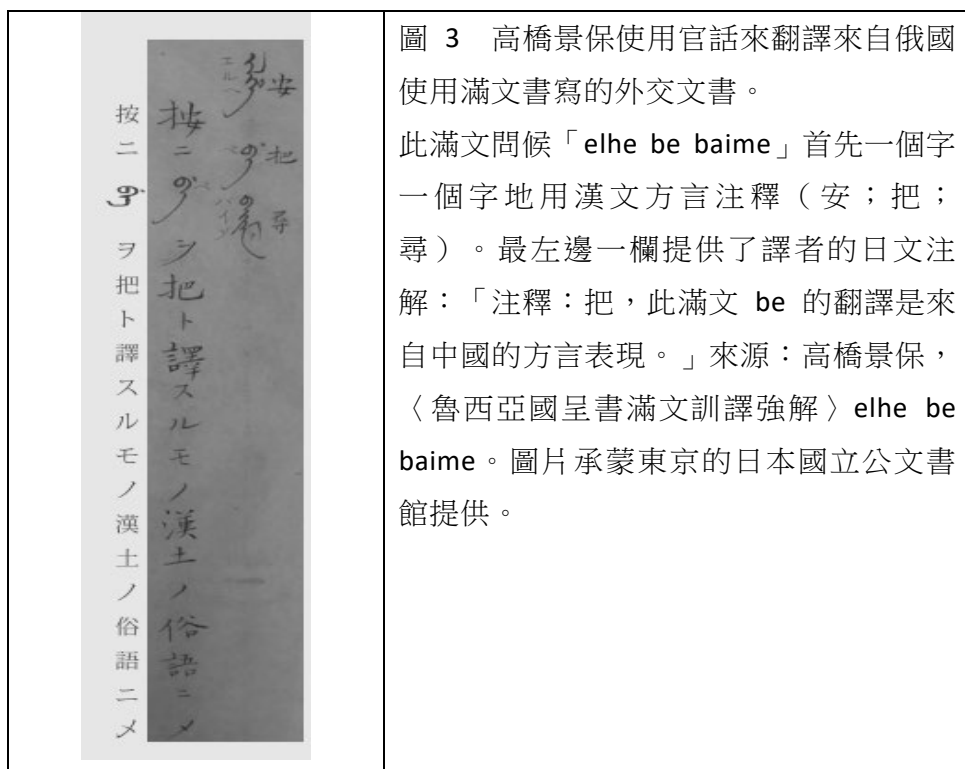


圖 3 高橋景保使用官話來翻譯來自俄國使用滿文書寫的外交文書。

此滿文問候「elhe be baime」首先一個字一個字地用漢文方言注釋（安；把；尋）。最左邊一欄提供了譯者的日文注解：「注釋：把，此滿文 be 的翻譯是來自中國的方言表現。」來源：高橋景保，〈魯西亞國呈書滿文訓譯強解〉elhe be baime。圖片承蒙東京的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提供。

《御製增訂清文鑑》成為之後所有在高橋監督下製作的滿文書籍的核心，但這些書都從未刊印。高橋與他的下屬在滿語研究中始終依賴漢語白話文。他們學習滿文字彙詞義的方法，是透過《御製增訂清文鑑》中各漢語字彙的白話文翻譯，並透過切音學習發音，而這發音依循官話的發音。在學習過程當中，高橋像荻生徂徠一樣碰到了需要首先掌握官話才能學習滿文的問題。

《滿字隨筆》一書應是 1816 年之前的著作，高橋依據一本刊印於北京 1730 年的暢銷教材提供了書面滿文的介紹。¹⁰³ 高橋的滿文音節表附有一個增補的附注，說明他如何學習該語言。滿文是音節符號寫成的文字，但若沒有其他的資訊來源，滿文字母的發音對於沒有聽過滿文口語的人而言依然費解。高橋入門使用的《御製增訂清文鑑》的音節表，包含了漢文字的注音。高橋使用此音節表，並在原本結構的滿文音節表旁邊寫下

¹⁰³ 高橋景保，《滿字隨筆》，附有山田孝雄的介紹〔1918〕（京都：國立國會圖書館關西館，微卷編號：103-392）。關於其書寫的時間，見杉本つとむ，《江戸時代蘭語學》卷 2，頁 330-345。北京的課本是舞格的《滿漢字清文啟蒙》。

片假名音寫。¹⁰⁴ 問題是清朝的注音原本是用來讀漢文官話的，高橋並不知道這種規則：「〔御製增訂清文鑑〕的注音呈現的順天府（北京）的發音。其在某方面與現在在崎（即長崎）的華人的發音不同，可能是因為後者都是來自浙江一帶（中國長江下游，該處不說官話）」。¹⁰⁵

為解決這個問題，高橋向知道北京發音的音韻專家（音家）石塚確齋（1766–1814/17）求助。石塚確齋原本是來自長崎的荷蘭語或漢語專家，後來被薩摩的領主徵召為家臣。¹⁰⁶ 石塚可能已於 1807（文化 4 年）到達江戶。¹⁰⁷ 高橋向石塚求助漢文語言技巧，說明高橋的滿語知識與漢語白話和官話的知識密切相關。若說石塚也懂些滿文，也不無可能。¹⁰⁸

高橋有兩份手稿顯得與眾不同，因為與他其他涉及清帝國語言的作品不同，這兩本書中的漢語白話文並未在結構上高於滿文。高橋首次嘗試寫作的滿文辭典於 1813 年毀於火災，此書似乎將原本以語義編排的滿漢《御製清文鑑》重新按照音節或字母順序編排。¹⁰⁹ 《滿文輯韻》，接續了上一本著作，在 1816 年到 1820 年之間完成。¹¹⁰ 高橋解釋說，他依靠多種清朝文學材料與語言研究，包含坊刻的字典與課本。然而，主要的基礎依然是《御製增訂清文鑑》。在其凡例的說明中，高橋重申清代分類辭典的注音是基於北京的發音，但是一般到日本的是浙江的發音。¹¹¹ 他解釋，他依靠合作者石塚的協助，還有表列滿洲地名音寫的地理著作（包含

¹⁰⁴ 舉例而言，滿文 *nioui*，高橋注音 *niei* ニエイ，與《御製增訂清文鑑》*niwuyi* 尼烏衣對應。高橋景保，《滿字隨筆》，頁 7a。〈*Juwan juwe uju*〉（十二字頭），《御製增訂清文鑑》，第 1 編，頁 4b。標注了當轉音為羅馬字母，滿文詞彙需要四個字，高橋與《御製增訂清文鑑》都沒有運用字母，都是使用三個字，這顯現了音寫方法的傾向。

¹⁰⁵ 高橋景保，《滿字隨筆》，頁 8b。譯註：史料原文為「清文鑑所附ノ音字皆順天府ノ音ニメ今我寄陽ニ渡來セル華人ノ音トハ稍異レリ蓋皆浙江辺ノ人物ナレハナリ」。

¹⁰⁶ 上原久，《高橋景保之研究》，頁 925、972。武藤長平，〈薩摩太守島津重豪公〉，《藝文》5.7（1914），頁 52。

¹⁰⁷ 杉本つとむ，《江戸時代蘭語學》卷 3，頁 1028；卷 4，頁 1140-1141，註釋標為「1005+8」。

¹⁰⁸ 杉本つとむ，〈高橋景保編《亞歐語鼎》之考察〉，頁 12。

¹⁰⁹ 上原久，《高橋景保之研究》，頁 913-914。

¹¹⁰ 高橋景保，《滿文輯韻》，手抄本攝像複製〔1816–1820〕，尚未編目，普林斯敦大學東亞圖書館葛思德舊藏。原本為東京宮內廳圖書館，編號：401.82。

¹¹¹ 高橋景保，〈凡例〉，《滿文輯韻》，手卷，無頁碼。

歐洲著作），還參閱了中國的「俗語解諸書」。然而，漢文「俗語」（即白話）還是讓高橋陷入困難。在寫下《滿文輯韻》序言五個月後，他在附錄評論道：「通常」，詞目在「滿文字典中被翻譯為漢土俚言」，這些「俗話」他並未學過。¹¹² 因此，他提醒讀者他的日文訓讀標點也許依然有錯誤。《滿文輯韻》及其修訂版《增訂滿文輯韻》在高橋去世之時尚未完成。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他著作中唯二在詞目表保留滿文作為為首的語言。¹¹³

高橋先後與馬場佐十郎以及吉雄忠次郎共同合作製作的《亞歐語鼎》，完成於 1823 年以前，就是使用漢文作為首要語言。¹¹⁴ 這是一份手稿本的分類辭典，依然延用了《御製增訂清文鑑》的大致結構，包含了漢文的白話文字與詞彙，滿文與荷蘭文翻譯則殿後（高橋可能為此目的使用了蘭法字典）。¹¹⁵ 有時，俄文或英文翻譯被增補。（幕府在那幾年反復地向荷蘭要求俄文字典，在 1808 年長崎的英國船隻事件〔譯按：費頓號事件〕後馬場佐十郎與吉雄忠次郎被命令研讀這兩種語言。）¹¹⁶ 有些漢文詞目使用漢文的文言文，因此可以被日本讀者理解，但許多詞目並非使用文言文。¹¹⁷ 高橋為不熟悉的漢語白話文在詞目旁邊加上日文解釋。

如圖 4 所示，此類的詞條顯示了在《亞歐語鼎》為了翻譯尋對應詞的

¹¹² 高橋景保，〈滿文散語解〉，收於《滿文輯韻》冊 1，卷 1，導言最後一頁（無頁碼）。亦可見上原久，《高橋景保之研究》，頁 913-927，高橋在頁 925-926 被引用。

¹¹³ 上原久，《高橋景保之研究》，頁 939-950。


¹¹⁴ 高橋景保、馬場佐十郎、吉雄忠次郎編，《亞歐語鼎》，〔1823〕，5 冊，（東京日本國家檔案館內閣文庫，編號：和 43490。）

¹¹⁵ 關於分類辭典著作的蒐羅與蘭法辭典的運用之分析，可見杉本つとむ，〈高橋景保編《亞歐語鼎》之考察〉，頁 10-11；杉本つとむ，《江戸時代蘭語學》卷 3，頁 1003-1039。另有其他關於這本字典的討論，但未提及高橋及日文改編本，見 Goodman, *Japan and the Dutch*, pp. 140-41。關於荷蘭文詞典在日本另請見 Jacques Proust, "De quelques dictionnaires hollandais ayant servi de relais à l'encyclopédisme européen vers le Japon," *Dix-huitième siècle* 38 (2006): 17-38.

¹¹⁶ J. Mac Lean, "The Introduction of Books and Scientific Instruments into Japan, 1712-1854,"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3 (1974): 54-55；富田仁，《法國荷蘭西學的黎明：法國學的開始及其背景》（東京：カルチャー出版社，1975），頁 131。

¹¹⁷ 舉例而言，如「風平了」這樣的詞彙，是用白話文寫，而不是文言文，見〈天文〉，《亞歐語鼎》冊 1，頁 10a。

困難——譬如，認識到儒家、佛教與新教之間的差異後，天文學者是否同意將「經」翻譯為 *psalm*？但我找不到證據證明高橋曾將這本書構想為一本可以實際應用的工具書。上原久推測，對高橋而言，《亞歐語鼎》是編纂多語種分類辭典的第一步，在此辭典裡，日文詞目被翻譯成幕府翻譯部門人員所使用的亞歐語言。¹¹⁸ 然而，從其尚存的版本看來，高橋的分類辭典並非以日文為中心，而是以漢語的白話文為中心。與朝鮮製作的滿文分類辭典類似，《亞歐語鼎》給予漢文超過滿文的地位，將後者完全從目錄移除，並在主體內容將其降低到第二排。在現存的版本中，滿文，荷蘭文，英文與俄國甚至日文都圍繞著漢語的白話文。

	<p>圖4 高橋的《亞歐語鼎》的多語詞條。</p> <p>漢文詞彙「經」，首先被翻譯為滿文的 <i>nomun</i>，接著翻譯為荷蘭文 <i>psalm</i>（頌揚上帝的歌或詩）。雖然 <i>psalm</i> 捕捉到佛經的部分意涵，但他未捕捉到蘊含在滿漢詞彙中的儒家經典的概念。</p> <p>來源：《亞歐語鼎》之〈文學部書類〉（在此篇章無頁碼）。此圖重繪自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所提供之圖片。</p>
--	---

作為一本十八世紀早期的多語種分類辭典，《亞歐語鼎》與在長崎從事荷蘭文與法文的通譯的產品類似，它們同樣是受俄國人寄來的法文信件所刺激。¹¹⁹ 如同高橋景保、馬場佐十郎與吉雄忠次郎透過漢文接觸滿文以便翻譯俄文的外交信件，長崎的通譯們則是透過荷蘭文接觸法文。¹²⁰

¹¹⁸ 上原久，《高橋景保之研究》，頁 930。

¹¹⁹ 高橋邦太郎，〈法語開始的背景〉，《成城文藝》44（1966），頁 24-33。

¹²⁰ Shinichi Ichiwaka（市川慎一），〈Du français au japonais par le truchement du hollandais. Difficultés rencontrées par nos premiers traducteurs: À propos de la

長崎的通譯們借用了漢語白話文的注音來編纂以法荷雙語書籍為基礎的教材。¹²¹ 在高橋的辭典編纂中，這些長崎通譯群體的重要性體現在高橋用許多荷蘭文字與文法解釋滿文。更值得注意的，即便有像馬場佐十郎這樣有良好荷蘭文訓練的編者，在江戶編纂的滿語研究書籍中，依然將漢語白話文視為最主要的語言。

《譯語抄》是一本與《御製增訂清文鑑》相關但未寫明日期的高橋續作，更清楚表明對高橋來說，清朝分類辭書作為學習書面白話漢文的資源的重要性。¹²² 相似於《亞歐語鼎》，《譯語抄》保留了清朝分類辭書的一般結構。然而它並非一本滿語研究著作，因為高橋在《譯語抄》中移除了滿文詞目，並將漢文譯文轉變到原本《御製增訂清文鑑》中的詞目位置。他為費解的漢文辭彙加上了日文翻譯，並在其中一卷加上了荷蘭文翻譯。如同他在 1816 年滿文辭典提及的，許多漢語白話文詞彙對他而言並非立即可懂，因此它們需要進一步研究。一張夾在手稿的便條提及一本流行於清朝的漢文辭典，表明了《譯語抄》是高橋對漢語白話文的後續研究。¹²³ 然而，許多字詞意義，特別是植物，高橋依然是寫「不詳」。篇章中對植物的多重註解（使用黑色、藍色與紅色墨水），揭示了他本人或他在天文方的合作者對清代植物學有興趣。¹²⁴

高橋對中國環境與社會的興趣，充分體現在他對漢語白話文詞彙的研究以及他 1827 年成書的《清文鑑名物語抄》中。¹²⁵ 這本著作在安排上有幾

Nouvelle méthode des langues françoise et hollandoise par Pieter Marin (Amsterdam, 1775)》，《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科紀要（文學・芸術學篇）》39（1993），頁 15-27；吉岡秋義，〈「弘郎察辭範」源流考〉，《長崎大學教養部紀要（人文科學）》4（1964），頁 62-80，<http://hdl.handle.net/10069/9508>；吉岡秋義，〈關於「弘郎察辭範」及「和仏蘭対訳語林」〉，《長崎大學教養部紀要（人文科學）》5（1965），頁 83-92，<http://hdl.handle.net/10069/9517>。

¹²¹ 杉本つとむ，《江戶時代蘭語學》卷 3，頁 371-440。

¹²² 高橋景保編，《譯語抄》，全 7 冊，〔1829 之前〕，（東京日本國立檔案館內閣文庫，微卷編號：和 18555）。

¹²³ 這便條夾在〈懦弱類〉一章，《譯語抄》冊 4。這字被提到的字典是張自烈與廖文英的《正字通》。

¹²⁴ 上原久，《高橋景保之研究》，頁 930-932。植物在《譯語抄》卷 5。

¹²⁵ 高橋景保編，《清文鑑名物語抄》，全 6 冊，〔1827〕，東京日本國家檔案館內閣文庫，微卷編號：和 18554。「名物」的意義，解釋可見上原久，《高橋景保之研究》，頁 1073。

分類似於朝鮮的《同文類解》，表列漢文詞目，其下有滿文翻譯，伴隨漢文解釋（有時候是獨特的白話）。我們可以再度看到這種一般性的結構是衍生自《御製增訂清文鑑》，但只檢選了有部分篇章。如同標題所指出的，這本書關注的是百科知識，而非辭書學。在《清文鑑名物語抄》，漢文詞目的基本功能是把有關清帝國社會政治秩序以及自然環境的資訊提供給日本讀者。高橋重申了其論述：清代分類辭典中滿洲詞目的漢文翻譯都是由俚語寫成，但這現象在《清文鑑名物語抄》不如高橋所編的其他著作明顯。¹²⁶ 本書聚焦於物而非語言的結果，是較少的動詞詞彙列於本書中，因此從詞目中刪除了漢語白話文的一些句法特徵。然而，高橋認為他在這本漢文百科全書中摘錄的詞條代表了一種包含外來事物詞彙的外國語言。他依靠若干清代出版品去瞭解這些詞彙的意義，包含關於清代政治史、治國術、法律、植物學的書籍，還有關於滿洲人內亞新領土的遊記。¹²⁷ 高橋在他的手稿邊緣引用了這些文學作品。¹²⁸ 他的資料來源皆以漢語文言文寫成，但他使用這些資料是為了研究某些特有的清朝漢語文言文，而這些詞彙並不流行於日本。

日本的滿語研究在高橋之後仍然持續，而這些後續研究確定了前往滿語知識的道路是通過漢語白話文，特別是官話。在 1850 年代，當清朝與歐洲強權衝突而使清帝國的未來備受威脅時，部分在長崎的中國通譯受將軍之命而研究滿文。這些如高橋一樣通譯，集中精力研讀《御製增訂清文鑑》。超過十多名通譯承擔編纂滿文參考資料的責任，他們翻譯部分清代分類辭書，以及重新編排這些材料。¹²⁹ 漢語白話文與滿文的連結，不僅表現在長崎學生作為漢語而非滿語翻譯的專業身份上，也反映在他們未完成的辭典《翻譯滿語纂編》（1851-55）的編輯原則聲明中：「透過漢字切音來發出清文字音是最為巧妙的。即便我們現在用國字（此處指的是日

¹²⁶ 高橋景保之附言，《清文鑑名物語抄》冊 1。

¹²⁷ 植物學在《清文鑑名物語抄》卷 6。

¹²⁸ 這顯示高橋摘錄了其個人擁有的清代分類辭典，之中顯示了相似的評注。《御製增訂清文鑑》（北京：武英殿，1773，藏於東京日本國家檔案館內閣文庫，微卷編號：漢 4983）。亦可見上原久，《高橋景保之研究》，頁 933-935。

¹²⁹ 新村出，〈長崎唐通事的滿洲語學〉，《東方言語史叢考》，頁 80-92；上原久，〈長崎通事的滿洲語學〉，《言語學論叢》11（1971），頁 13-24；羽田亨，〈清文鑑日解、滿語編纂解說〉，《東洋史研究》1.6（1936），頁 547-552，<http://hdl.handle.net/2433/138716>。

文)增加細微的注音,還是不可能準確的發出〔滿文音〕。倘若人們不能熟悉漢音,便更難以念出這些音。」¹³⁰《御製增訂清文鑑》的切音系統所使用的一系列漢文字,看起來是長崎通譯對關於滿文字音知識的基礎材料。然而如同他們所解釋的,這複雜的系統需要良好的官話知識。

約略在長崎通譯們研究《御製增訂清文鑑》之時,其他清朝滿語研究的著作影響了佐久間象山(1811-1867)。他是中國與荷蘭研究學者,以對日本海岸沿線防禦的規劃及西方科技的使用而聞名。他在開始學習荷蘭文之前,已接受過漢語文言文的訓練,然而,他對當時可獲得的荷蘭文字典並不滿意,因而編纂了一個修訂版,並試圖出版。這些計畫在 1850 年化為烏有,但佐久間懷有更遠大的抱負:編纂一本包含滿文、天竺字、法文、荷蘭文與俄文的語言工具書。¹³¹ 受到清朝十八世紀軍事勝利的啟發,佐久間在計畫編纂的序言、標題以及信件中,都參考清朝宮廷贊助的多語出版品。¹³² 他據說還寫了一本所計畫之書的節選,該書遵循了部分清朝贊助的著作的形式。¹³³ 佐久間或許並未在他所計畫出版的書籍中遵循乾隆皇帝將滿文置於最重要地位的做法。對佐久間來說,清廷的滿語研究出版品之所以讓他感興趣,是因為它們試圖在同一頁面上彙集並呈現各種資料中的語言資訊。

滿文研究在日本開始得比朝鮮晚,而且不同於他們在半島上的鄰居,日本學者在進入十九世紀才開始進行滿文辭書編纂。除了一些高橋景保的手稿彙編外沒有完成品。儘管有時間上的差異,日本學者與朝鮮學者相

¹³⁰ 〈翻譯滿語纂編·凡例〉之陳述,見平野繁十郎、鄭幹輔、潁川藤三郎等編,《翻譯滿語纂編》,6冊,卷1, <http://repo.komazawa-u.ac.jp/opac/collections/497/?tm=1448496000193>。感謝 Sven Osterkamp 與 Anna Andreeva 在這篇文章的協助。這篇文章也為上原久徵引,可見上原久,〈長崎通事的滿洲語學〉,頁15;關於編纂此書動機的討論,可見松岡雄太,〈《翻譯滿語纂編》與《清文鑑日解》的編纂過程〉,《長崎外大論叢》7(2013),頁64。

¹³¹ 新村出,〈身為蘭學者的象山先生〉,《新村出全集》,15冊(1916;東京:筑摩書房,1971-1973年再版),冊9,頁569-573;杉本つとむ,〈佐久間象山〈增訂荷蘭語彙〉之考察〉,《日本歷史》415(1982),頁1-18。

¹³² 佐久間象山,〈皇國同文鑒序〉,信濃教育會再編,《象山全集》,全5卷(長野:信濃每日新聞,1934-1935年),卷1,頁55-56;佐久間象山,〈省譽錄〉,《象山全集》,卷1,頁12-13。

¹³³ 佐久間象山寫給望月主水的信,1850年(嘉永三年)5月13日,《象山全集》,卷1,頁12-13。我無法辨識收件者的身分。

似，都使用漢文的白話文來拉近自身語言與滿文的距離。同時，如同在朝鮮一樣，日本的漢文白話文在許多彙編佔據了主導地位，這些彙編是日本學者以滿文為主導的清朝材料為基礎編成的。

結論

從十七世紀晚期北京開始，清朝的滿語研究自始便與漢語白話文的口語和書面形式密切相關。乾隆的宮廷贊助了雙語乃至多語分類辭典以及其他書籍的書寫與編纂，以建立首崇滿文的帝國語言次序，但即便在這些書中，漢文白話文（通常是明確的官話形式）也佔有重要地位。在朝鮮與日本，當漢文白話文變成中心語言，清朝的帝國秩序便被顛倒了。

在這三個東北亞國家，確實共享了實現多語分類辭典的條件。隨著該區域的互動日益增多，對外國語言的認識和知識也隨之增強。北京成為了多語內亞帝國的 center，朝鮮人透過頻繁的使團直接見證這一現象。與其同時，日本透過在清帝國之外的商人所掌握的海洋貿易取得國外書籍。

在某種程度上，滿文書籍從北京向東流傳的背景，是透過將荷蘭與漢文書籍帶往長崎與江戶的貿易網路所促成。帝國贊助的滿文分類辭典在北京的書市出售，這些書隨後被跨境帶往朝鮮，或是賣到浙江沿岸的寧波，再進一步運往日本。在一個刊印文化昌盛的情境中，內陸以及海洋東北亞區域因為政治與商業的整合，使語言以書面形式廣泛流傳。中國、朝鮮與日本多語作品集的編纂，我認為反映了他們渴望認識這個正在擴張且逐漸緊密連結的已知世界。在北京，清廷的學者透過讓所有語言聯繫到滿文，為區域內的多樣語言帶來秩序。在朝鮮與日本，洪命福與高橋景保反而以漢文白話文為核心來整理他們已知的語言。

日本及朝鮮這種透過清朝的分類辭典，有創意的製作多語彙編以介紹滿文與漢文白話文詞彙的趨勢，還有助於我們瞭解乾隆宮廷的多語出版品。如同早期學者所指出，這些書籍的其中一個目的顯然具有意識形態：其能「在大眾驚嘆的目光中，展現帝國智識的光輝」。¹³⁴ 正如滿語在乾

¹³⁴ Pamela Crossley, *Translucent Mirror*, p. 265；亦可見 James A. Millward（米華健），*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7–99.

隆贊助的出版品中處於核心地位，滿洲皇帝本身也是普世政體的中心，唯有他能掌握其整體性與多樣性。在一些由身兼高級官員（包含富俊）所編纂的著作中，在同一個頁面中聚集多種語言的原因，可能較少是由意識形態所引起，反而是行政官員意識到需要好好的掌握他們轄下人們所使用的語言。因此，看似出於帝國意識形態影響的安排，在學者－官員編者眼中可能也有實際的功能。

然而，行政的急迫需要與帝國的意識形態，兩者都不太可能是日本及朝鮮編纂的多語分類辭典的動機。朝鮮與德川政府有充分的理由編纂他們所接觸的語言工具書，包含了滿文、漢文的白話文、荷蘭文與蒙古文。但在胎死腹中與完成的多語分類辭典中，竟然包含有希伯來與希臘文字樣本，或是中世紀內亞國家的字彙，這種現象很難被解釋為對國際關係需要的回應。後面幾種語言的出現揭示了一種由日本及朝鮮的學者所共有的需求，也就是透過精心安排與組織，再現已知世界的語言多樣性。這種精心安排與組織同樣賦予了乾隆贊助的書籍其意識形態上的內涵。

清代中國的多語編纂計畫並未包含滿洲人有興趣的內亞範圍之外的語言。特別是，日語及韓語完全在滿洲的帝國語言秩序中缺席。不過，透過在那個秩序中給予漢文白話文一個位置，清廷所贊助的分類辭書讓朝鮮與德川學者得以進入清朝的語言複合體。的確，許多日本及朝鮮學者將出現在《御製增訂清文鑑》的官話視為其自身語言與滿語之間的橋樑。近代早期東北亞的語言秩序呈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在朝鮮與江戶日本的、根據《御製增訂清文鑑》寫成的工具書是以漢文白話文（而非韓文或日文）為首。乾隆皇帝與他的學者－官員原本想要推廣滿文，但在國外，他們所製作的書籍反而確立了理解漢文白話文的重要性。

在中國、朝鮮與日本所編的書中，語言位階以及組成這些位階的語言有所差異。然而，這些書籍都反映了超越現代早期東北亞區域的類似需求和現實。在十七世紀的歐洲，隨著越來越多的語言被認識並以印刷形式呈現，學者們編纂類似的多語辭典著作。¹³⁵ 歐洲學者想用滿文詞典的資料

¹³⁵ John Considine, *Dictionar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exicography and the Making of Herit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88-313.

來充實他們的多語著作。¹³⁶ 然而，這樣的資料在當時非常難以取得，因為那時滿文辭書才剛於北京開始。滿文晚於漢文傳入歐洲，但若干歐洲學者發現這個語言相對簡單。歐洲人成功地刊印了一本以北京的滿漢辭典為基礎的滿法辭典，比第一本以西文刊印的漢文字典早十幾年。¹³⁷ 至少一位主要的漢學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透過滿法辭典及清朝的原本，學習了漢文（他認識到漢文裡有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兩種體裁）。就某種程度上來說，歐洲學者使用滿文的方式類似於朝鮮和日本學者使用漢語白話文的方式：作為通向另一種更為陌生語言的橋樑。

1914 年，在日本日益成為東亞公開與歐洲強權競爭的強權之時，日本學者新村出（1876-1967）比較了高橋景保（德川滿語研究的代表）與他的歐洲同代人的辭典著作。新村的比較旨在展示德川學術與歐洲學術水平相當，甚至優於歐洲。¹³⁸ 確實可以發現有趣的相似之處，例如雷慕沙的同僚柯恆儒（Julius Klaproth, 1783–1835）在 1823 年出版的多語彙編《亞洲諸語》（Asia Polyglotta），其特徵更接近前述的十七世紀多語傳統，而非柯恆儒所處時代的新興語言學。同樣，高橋景保與他日本同時代人的出版品與編纂動機，也展現出同樣更受多語傳統影響的特徵。¹³⁹ 然而，將高橋與近代早期歐洲的漢學家相比，並不能將他抽離東北亞的情境。高橋與柯恆儒相同的地方，在洪命福與李義鳳，甚至富俊身上都看得

¹³⁶ 舉例而言，可見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寫給維利烏斯（Antoine Verjus）的信，萊布尼茲，*Der Briefwechsel mit den Jesuiten in China (1689–1714): Französisch/Lateinisch–Deutsch*, ed. Rita Widmaier, trans. Malte-Ludolf Babin (Hamburg, Ger.: Felix Meiner Verlag, 2006), pp. 476-83; 約翰·康斯丁，“Leibniz and Lexicography,” in *Yesterday's Words: Contemporary, Current and Future Lexicography*, ed. Marijke Mooijaart and Marijke van der Wal (Newcastl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8), pp. 41-52.

¹³⁷ Jean-Pierre Abel-Rémusat(雷慕沙), “Discours prononcé à l’ouverture du cours de langue et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s, au Collège Royal, le 16 janvier 1815, sur l’origine, les progrès, et l’utilité de l’étude du chinois en Europe,” in vol. 2 of *Mélanges asiatiques* (Paris: Dondey Dupré, 1826), p. 13; Vivianne Alleton, “L’oubli de la langue et l’« invention » de l’écriture chinoise en Europe,” *Études chinoises* 13.1–2 (1994): 262. 亦可見 Isabelle Landry-Deron, “Le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 de 1813,” *T’oung Pao* 101.4–5 (2015): 429, 該文並未提到我所推測的雷慕沙除了滿漢辭典之外，還使用了滿法辭典。

¹³⁸ 新村出，〈高橋景保的滿洲語學〉，《藝文》5.6（1914），頁 20-23。

¹³⁹ Hartmut Walravens,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 Leben und Werk* (Wiesbaden, Ger.: Harrassowitz, 1999), p. 5.

到。他們都努力將他們所接觸到的各種語言彙集於手稿或刊印頁面，而且他們所使用的參考書都來自清朝的首都北京，尤其是清帝國的印製廠。在他們書中所彙編的語言絕少完全相同，但是他們所有人，包含柯恆儒，都使用了由宮廷贊助且出版於北京的滿文分類辭典。清朝首都在現代早期的歐洲與東北亞多語研究的重要意義是無庸置疑的。

乾隆皇帝可能會希望，他的宮廷在語言研究的重要性，能夠體現在歐亞大陸兩端因多語研究所編纂的書籍中，並讓滿語擁有相應的重要地位。確實，作為十八世紀軍事勝利的結果，對滿語的興趣遠遠超出了清帝國的邊疆。然而，我並不認為乾隆會預料到：在漢城與江戶，引起最大興趣的語言，是由漢人平民與東北旗人的民俗混合所產生的北京的漢文白話文，而非清王朝的滿語。

《世界史中的金帳汗國》的前言、導讀 與結論

Золотая Орда в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 (The Golden Horde in World History).
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монография. — Казань: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им. Ш.Марджани АН РТ,
2016. — 968 с. + 28 с. цв. вкл.

前言

拉法葉·哈金莫夫 (Рафаэль Хакимов)

俄羅斯韃靼共和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針對朮赤兀魯思（金帳汗國）的全面性研究相對較晚才開始，是在二十世紀 90 年代、解除國家意識形態立場解除後開始。這裡主要指的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 1944 年發布的「關於改進韃靼黨組織之群眾政治及意識型態工作之措施」，該決議禁止研究金帳汗國和韃靼各汗國歷史，以及推廣史詩《也迪該》（Идегей）。令人驚訝的是，對於蘇聯政治而言，改造韃靼歷史竟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在拿下柏林之前、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國內全體力量與資源的緊張狀態下，國家高層仍認為有必要禁止對金帳汗國進行研究。在史達林的眼中，韃靼歷史的重要性不亞於前線的勝利。該意識形態的目的在於將韃靼歷史侷限為伏爾加地區的在地事件，並解釋韃靼人起源於伏爾加不里阿耳人，他們英勇地抵抗了韃靼—蒙古人的入侵；同時針對韃靼人的負面形象也形成，認為他們是打斷俄羅斯自然歷史進程的亞洲人。在這種理論的影響之下，甚至還出現了所謂「不里阿耳主義者」的政治運動，他們主張將自己改名為不里阿耳人，而韃靼共和國則改為伏爾加不里阿耳利亞。當中最為狂熱的積極份子更試圖提倡在護照上以「不里阿耳人」取代「韃靼人」，並在人口普查時登記成不里阿耳人，而非韃靼人。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不里阿耳主義的活動漸漸平息，在今日看來反倒像是蘇聯時期的古怪殘遺，還催生了一派歷史神話。

二十世紀 90 年代的政治事件撼動了整個社會，並大幅提升了韃靼人的自我意識。「改革開放」解除了先前對金帳汗國與韃靼各汗國的研究限制，來自任何機關對意識形態的控管都不復存在，在韃靼共和國內則出現了不服膺於俄羅斯科學院的獨立研究機構；當時俄國學術界正在經歷動盪時期，沒有心力去研究韃靼史。此外，俄國歷史學家也當中出現了支持客觀研究金帳汗國歷史的學者。

在 1990 年宣布國家主權、1994 年喀山與莫斯科簽署有關權力劃分的雙邊協議之後，韃靼共和國的經濟和文化開始蓬勃發展。邊境開放、加強了與世界各地學術中心的聯絡，共和國開始出現了廣泛的對外關係，韃靼人與韃靼共和國國民的自我意識與日俱增。韃靼人訴求客觀的歷史書寫，因為教科書及出版物都延續了老舊的傳統史觀，視韃靼為野蠻的民族，而金帳汗國則是未開化的、欺侮俄羅斯人和威脅整個歐洲的根源。俄國政界曾試圖將庫里科沃戰役（Куликовская битва）提升為俄國國定節日，但來自韃靼共和國高層的反對力量阻止了這一進程。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之下，對金帳汗國問題的大規模研究開始了。這條路上第一個重要事件，便是於 1998 年 6 月 23 至 26 日舉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術赤兀魯思史（金帳汗國）史料學。從卡爾卡到阿斯特拉罕。1223-1556》[3]。該研討會之後又舉行了多次會議，隨後演變成了定期的「金帳汗國論壇」。對金帳汗國問題的多方面研究促成了獨立史冊《術赤兀魯思（金帳汗國）：十三世紀至十五世紀中葉》（主編為米爾卡辛·烏斯曼諾夫教授）一書的籌備與出版，在共有七部的《韃靼歷史：從古至今》的框架之下發行。[1] 連同該系列第四部《韃靼國家：十五至十八世紀》[2]，二書相當詳細地描述了金帳汗國的興起、盛世與衰落，以及金帳汗國崩解之後在這個區域發生的歷史。由瑪爾札尼歷史研究所主導下研究金帳汗國和韃靼各汗國的出版物，如雜誌《金帳汗國觀察》、年刊《金帳汗國文明》、《金帳汗國錢幣學》、《中世紀的突厥－韃靼國家》，支持了與俄羅斯及海外的主要學術中心研究上的聯繫，為的是鑽研金帳汗國史的各個層面。這本集體著作是全體國際學者多年來努力的成果。

1. 《自古以來的韃靼史，共七部》第三部，《術赤兀魯斯（金帳汗國）：十三至十五世紀中葉》。喀山：韃靼共和國科學院瑪爾札尼歷

- 史研究所，2009。1055 頁。（История татар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в семи томах. Том III. Улус Джучи (Золотая Орда). XIII - середина XV в. Казань: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им. Ш. Марджани АН РТ, 2009. 1055 с.)
2. 《自古以來的韃靼史，共七部》第四部，《韃靼國家：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喀山：韃靼共和國科學院瑪爾札尼歷史研究所，2014。1080 頁。（История татар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в семи томах. Том IV. Татар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XV-XVIII вв. Казань: им. Ш. Марджани Центра АН РТ, 2014, 1080 с.）
3. 《术赤兀魯思史（金帳汗國）史料學，從卡爾卡到阿斯特拉罕，1223-1556》。喀山：馬斯特·萊恩出版社，2002。432 頁。（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 истории Улуса Джучи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От Калки до Астрахани. 1223-1556. Казань: Изд-во “Мастер Лайн”, 2002. 432 с.）

* * *

瑪莉·法孚蘿（Мари Фаверо）

歷史學博士、牛津大學研究員

金帳汗國的統治時期是中亞區域及各民族人口首次被集結成統一的政治體系。如同大部分的帝國，金帳汗國涵蓋了許多不同民族的文化。它成為不同宗教族群的棲身之地，這些族群不僅在此共存，還和彼此來往並貿易，形成了空前緊密的相互交流，尤其是在伏爾加河流域，也就是帝國的中心區域。金帳汗國很大程度地影響了十三世紀至十四世紀中期的貿易擴張，其經濟與政治上的統治促進了舊世界的全球化進程。

歷史學家們曾指出，成吉思汗長征過後，空前繁榮的貿易往來如何改變了歐亞大陸的社會與文化風景。所謂的「毛皮之路」連接在伏爾加河下游的絲綢之路。從這裡開通了兩條主要路線：東邊的路線會經過中亞，通往中國及印度；而西邊的路線則是穿過克里米亞半島，朝地中海世界與中東而去。金帳汗國在這近乎戲劇性的來往當中成為了舞台，其可汗與領主

們在全新的國際秩序中扮演了領頭的角色。無怪乎這一時期當中，不論是伏爾加河下游與克里米亞，還有連接西伯利亞與匈牙利間草原幹道上的沿線村鎮都發展蓬勃。隨著游牧民族的上流階級皈依伊斯蘭教，汗國的宮廷遂成為伊斯蘭世界的中心。來自安納托利亞、中亞、埃及和敘利亞的雲遊學者與工匠受到金帳汗國親切的接納。

金帳汗國的政治制度對歐亞大陸的政治、經濟、文化版圖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學者們指出，伊斯蘭教透過形塑社會生活與集體記憶，以及將薩滿習俗與當地蘇菲派相結合的獨特方式，將各民族團結在一起並實現社會融合。韃靼人與中亞其他族群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別兒哥汗與月即別汗皈依伊斯蘭教的時期。許多現居於俄羅斯聯邦內的伊斯蘭民族將這個時期視為其歷史之形成；而確實，伊斯蘭化是金帳汗國遺產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金帳汗國是人類共同遺產的一部份。由於其中游牧與定居社會的互動，汗國為十三至十四世紀全新的精緻文化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當西方學術界才剛開始承認這個現象的重要性時，俄語學術圈早已體認到金帳汗國遺產的獨特性。這份獨特性不僅吸引了俄國的——尤其是韃靼共和國的——歷史學家，也引起了考古學家、藝術學家還有古錢幣學家的興趣。多虧了他們的努力、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研究成果，金帳汗國才成為一個真正的學術活動領域。西方學術界需要更深入地了解這些學術著作，一方面是金帳汗國時期應該要納入美國、英國、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歷史教科書內，世界史應該要從非歐洲中心的觀點傳授，才有可能更深入地探討我們共同的過往，否則將無法理解當代全球化世界的歷史根源；另一方面，同樣重要的是，當代金帳汗國研究應該要考量到世界各地的史學家們對史料編纂的辯證與觀念。

「世界」乃是全球史的一個範疇，最近為歷史學家們認定具有超越狹義帝國概念的多重含義。的確，帝國及王國並非個別存在，而是倚賴著更廣闊的世界。當代全球史的任務就是定義這些世界並闡明其運作方式。金帳汗國在蒙古帝國瓦解後倖存下來；它變得更強大，並對周遭世界產生了影響。這個世界包含了蒙古帝國位於中國、阿富汗、印度、波斯、安納托利亞，以及拜占庭、羅斯、歐洲與中東的繼承國。從地中海至裏海、一直

到中國之間的密集往來，就說明了朮赤兀魯思與周遭更廣闊的世界之間連結有多緊密，因此金帳汗國的歷史不應與這全球構型的現象分開談論。

民族主義式的史料傾向曲解歷史，竭力塑造並傳播只對自己有利的固定說詞。歷史學家們的首要任務就是透過推動對更重要的問題之研究，以打破「蒙古－韃靼桎梏」這類不精確的說詞。例如：當共同歷史認知已經超過現代國家的範疇時，該如何處理其概念？且在這樣的縮影之下，金帳汗國在世界史中的角色及遺產為何？

集體著作《世界史中的金帳汗國》（Золотая Орда в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對以上這些問題提出了一些答案。本書試圖達到的目的，是向廣大的學術界受眾介紹在狹窄的專家圈外鮮為人知的開創性研究，並將這些研究成果整合成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史全景。書中結合了不同的問題與解析途徑，不僅是為了詳盡地反映當代研究的現況，也是為了確立最有前景的研究方向，並將最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發揚光大。這本嶄新且全面的概論書是許多主導與協辦學術機構之間合作的成果：韃靼共和國科學院瑪爾札尼歷史研究所、牛津大學及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歷史研究所。

我想要向那些能夠把這個大膽的出版計畫實現為令人印象深刻又詳盡的集體專著的人們表達我最深切的謝意：哈金莫夫（Рафаэль Хакимов）、米爾加列耶夫（Ильнур Миргалеев）、哈烏斯塔爾（Роман Хаустала）及特列帕弗洛夫（Вадим Трепавлов）。多虧了我們來自韃靼共和國科學院瑪爾札尼歷史研究所以及其金帳汗國與韃靼各汗國研究中心的同仁非比尋常的力量，喀山已證明自己成為了（未來也將是）研究金帳汗國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與古錢幣學家的絕佳工作地點，隨時準備好比較他們的觀點。有關金帳汗國體系位於歐、亞及中東之間十字路口的概念，尚需要不同領域的專家之間相似的對話。國際上的集體出版物與歷史書寫是一個共同的開始，能夠從不同學術機構之間的合作中得到極大的好處，尤其是當這些機構來自不同國家的時候。這本國際專著為讀者帶來傑出專家們研究金帳汗國史的成果，並與介紹我們最新的全球史概念。

地名及地理索引是由韃靼斯坦科學院瑪爾札尼歷史研究所的同仁阿布依佐娃（Р.Р. Абызова）、阿克山諾夫（А.В. Аксанов）、吉尼亞圖琳娜（Л.С. Гиниятуллина）、薩德科夫（Ш.Ф. Садыков）、賽依費吉諾娃（Э.Г. Сайфетдинова）等進行了編輯。

彩色插頁（第八至十五頁）上的地圖由阿斯泰基訥（А.А. Астайкиный）（莫斯科）提供；插圖由各章節的作者提供。

導讀

瓦基姆·特列帕弗洛夫（вадим трепавлов）
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俄羅斯歷史研究所首席研究員
國際金帳汗國研究人員協會主席

本書講述的是中世紀時期幅員最遼闊且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對於大部分的現代讀者而言，「金帳汗國」這個名稱會引起一致的負面印象，並且讓人聯想到黑暗的「蒙古—韃靼桎梏」時代。俄國的中小學及大專院校學生至今仍被灌輸這樣的觀念：1230 年代至 1470 年代間是俄國的土地受到占領者殘酷奴役的時期，受苦受難的羅斯土地被這些人吃乾抹淨。汗國的八思哈（Баскак）徵收貢品，也就是「沙皇的進貢」，大公們只能根據汗國可汗——「沙皇」發給的敕令，才得以坐在宗主國的桌前，嗜血的韃靼騎士們侵襲和平的城鎮與村莊……整體而言呈現出了一幅毫無法治且屈辱的景象，並持續了至少兩個半世紀。

這個深深刻在中小學生與大專生們腦海中的歷史印象，不僅發源自由卡拉姆津（Карамзин）與索洛維約夫（Соловьев）領導的帝國官方歷史書寫，這種對於金帳汗國、其統治者與居民的觀點早在十三世紀的俄國知識份子間便已形成，並與中世紀作家們的世界觀、其國際視野及政治和文化上的刻板印象相互結合。重點在於編年史（使我們得以了解久遠時代的主要史料來源）大部分是在宗教場域完成的。神父和僧侶們透過他們所熟悉的聖經形象及比喻反映了當時的現實情況。

這種反映不只是由當時書寫者的世界觀特性所導致，還有十三世紀時的歷史情勢因素。東方基督教世界還沒來得及從 1204 年十字軍對君士坦丁堡的嚴重破壞中恢復，就又爆發了新的外族侵略，東正教便再度經歷挫

敗。蒙古對羅斯的侵略被理解成上帝已經背棄了神聖的羅斯、將其拒於自己的仁慈與恩典之外無可辯駁的證據。過去的幾十年間公國間的血腥鬥爭、毫無原則的陰謀設計與爭吵、將「野蠻的波羅維茨人」歸類為敵對的公國，都剝奪了神給予羅斯人的庇護，報應則以他族的奴役為形式到來。與聖經先例相比，「上帝的選民」以色列人不就是這樣服侍法老的嗎？他們不正是因此才成為了巴比倫囚虜嗎？現在應當祈禱並指望來自上天的恩惠；在神恩尚未開始閃耀前，必須忍耐並承受與這份「桎梏（壓迫）」相關的苦難。東正教書寫者們所引入的正是以上的概念，用以指涉蒙古人在羅斯建立的制度。

因此，十五世紀「桎梏」的瓦解也相對應地被宗教書寫者們（以及其受眾）視為上天眷顧的結果。至於金帳汗國就應該淪落為歷史中的韃靼人，彷彿是為長期對東正教的凌辱所付出的代價。

穆斯林對於全面性的劇變也有著類似的態度。在眾多例子當中，我們引用一位閱歷豐富的神學家所說過的話，他是蒙古人 1220 年在布哈拉的暴行的目擊者。對教友的怨嘆，他回答道：「〔這〕是神怒之風，〔被它所吹散的〕乾草桿（即切碎的桿草—作者註）無話可說！」（15，頁 81）

現代的學術工作中開始確立對汗國更為冷靜、客觀的觀點，拒絕將其解釋為當然抵抗羅斯的敵對勢力。除此之外，金帳汗國的領土涵蓋哈薩克，並延伸到當今俄羅斯聯邦、烏茲別克、烏克蘭與摩爾多瓦的部份疆域，是許多突厥民族的搖籃，其人口與文化是這些民族歷史的一部份，也是全俄羅斯歷史的一部份。

然而在大眾認知和教育體系中，把金帳汗國解釋為壓迫者與奴役者的傳統詮釋仍然當道。如果去看看中小學課本（11），則會發現使作者們感興趣的只有納貢制度的組織（敕令、貢品、驛站等）、圍繞偉大的弗拉基米爾大公王位的算計和俄羅斯人為了爭取獨立日益激烈的抗爭。同樣的過度簡化也存在於針對金帳汗國繼承國與其「殘餘」的論述中，也就是各個韃靼汗國，它們被刻劃成是造成俄國邊境緊張的根源，必定會遭到「應得的」報應（毀滅）。從此還延伸出一套他們在 1550 年代征戰的標準理由：終結韃靼人侵襲、拯救戰俘中大量的俄羅斯囚犯、透過獲取喀山「天

堂下的土地」以擴充土地資源，好分配給貴族肥沃的耕地、掌握伏爾加貿易主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最後一項之外，以上所有觀點都可以歸功於征服喀山汗國（儘管當中的每一點在學術討論中還是有爭議），但不適用於阿斯特拉罕。對於當時的俄羅斯而言，阿斯特拉罕相對安全、偏遠，四周圍繞的不是富饒的耕地，而是半沙漠。

本書的作者群認為，俄國史學中這種將金帳汗國視為俄羅斯歷史插曲的傳統觀點已經過時，需要重新反思。（儘管這種觀點可以從資料來源的狀況來解釋，因為大量有關「蒙古－韃靼人」的資訊來自於中世紀俄羅斯的文獻。）這個強大的國家本身就擁有其歷史價值，並且是一個獨立的歷史主體，也不該是以排除羅斯的立場來討論。

金帳汗國出現在地圖上時是一個更龐大的國家陣營的一部分，其規模在歷史上前所未有，這便是蒙古帝國（大蒙古國）。這個帝國完成了游牧民族的千年更替，使游牧民族的統一機制更臻完善，這個機制在過去的一千五百年間一直週期性地發揮作用。

能將併入帝國的屬地整合為一個凝聚的有機體、形成一個具有相對標準的行政體系的統一國家領域，蒙古的征服是以上二點最重要的條件。許多阿拉伯及波斯當代學者指出蒙古帝国有條理且清楚的國家體制，尤其是其隨著時間分離出來的西方部分——金帳汗國。儘管十三世紀的旅行者和傳教士對成吉思汗的帝國給出中立且偏向正面的評價，歐洲史學仍然從中世紀開始便展露出對蒙古的畏懼。在西方世界廣為人知的《馬可·波羅遊記》介紹了遙遠、幾乎是童話般的「偉大的可汗之國」，但並未著重於蒙古人在其創建過程中的角色。也因此，關於該國的認知雖推動了航海發展——包含哥倫布在內——這個認知卻無法真正與作為中亞游牧民族的蒙古人連結在一起。

是什麼讓許多國家與民族得以在帝國的框架下結合？很明顯地，僅將帝國和汗國相對較久的國祚歸因於當局殘酷鎮壓任何不滿、征戰後被征服者的疲憊以及對圍剿行動的恐懼是不夠的。正如上文所述，蒙古軍團的成功向中世紀的人們證明了神力對於征戰者以及其領導的眷顧。正因如此，成吉思汗的王朝被視為（自己也如此認為）被上天選中的部族，是被號召來統治世界的天選之人。相應地，地上的其餘君主若不服從，注定會遭到

被征服或滅絕的命運。忠誠的領袖則被允許保留自己的高等地位及行政結構，但是是作為臣服於蒙古或汗國的附庸身分。其標誌是分發給他們一種統治許可，也就是傳統上稱為敕令的文件。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它可以被用來解釋蒙古帝國的形成與快速擴張，以及帝國內部長期沒有出現「民族解放運動」的原因。「……熱」現象在帝國建立之初就開始作用，其不止一次伴隨著年輕帝國形成，但歷史學家卻很少對其進行分析。「帝國熱」反映了不同社會政治和文化發展的複雜辯證關係。雖然歷史上曾出現過完全透過征戰而建立的帝國，但這類國家結構很大一部份是基於各種不同的契約關係及互惠義務所組成。帝國的凝聚力首先在於穩固的國家秩序，這與周遭屬地的分散與不穩定性產生了鮮明的對比；其次，得以獲得軍事保護以抵禦宿敵，並做為強大國家的一部份與之對抗；第三，帝國可以積累並分配大量資源，這是周圍屬地所無法比擬的。

眾所周知，十六世紀時近東與法國曾出現土耳其熱、十三世紀高加索地區曾有羅斯熱等等。這種蒙古熱潮大致可以被認定為出現在甫成立的蒙古軍隊第一次「對外」征戰的時候，也就是當中亞地區、西伯利亞南部以及東突厥斯坦的各個突厥民族落入成吉思汗的權力版圖時，就可以看出端倪。它們「被收攏」至帝國內的過程比單純的征服（以強制手段逼迫臣服）複雜多了。

在十七至十八世紀民族國家形成的時代之前，民族融合的進程往往是在帝國政權形成的框架中所發展。而金帳汗國的也不例外，因為它是許多當代突厥民族的「民族搖籃」。在此之上還得將帝國被征服者「多層次」的身分認同考慮進去。僅有在新時代國家形成的過程中，以屬於某個特定族群作為國家建設準則的歸屬問題才開始凸顯出來；在此之前，階級、宗教、地區和氏族身分更為重要。民族社會的多樣性並沒有對帝國體制的建立和運作造成阻礙。對國家秩序的忠誠和對王位的效忠才是大批多語種的被征服族群的共同點。

對於欽察草原（金帳汗國的草原區域）的居民而言，他們自我認同最牢固、最長遠的結合力量，是起源自共同真實或虛構祖先的氏族群體。史學家們通常稱這類群體為部落。在不同的時代以及不同的突厥民族中使用

бой (буй)、ру、ырыу 等詞彙來稱呼；在中世紀後期的欽察草原則稱為 эль。

十一世紀的突厥語文學家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在自己的《突厥語大詞典》中記載到：「當互相不認識的兩個人會面時，其中一人會先問候對方並詢問：『буй ким（你是哪個部落的）？』在這之後他們才會開始對話或是匆匆分別，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深知對方代表著哪一方。」〔9，頁 844〕。而這類的好奇在今日依舊會出現，尤其是當巴什基爾人和哈薩克人在初次見面時，會問道：你哪個部落的？你來自哪個部落？

對於部落而言，意義重大的不只是對祖先的記憶，還有共同的墓地、與來自不同氏族的同部落成員定期聚會的地點也很重要。氏族和部落身分構成了個人和群體自我意識中最根本且最牢固的層面。

下一個層級則是參與游牧世界的民族文化、了解畜牧生活方式的獨特性以及與定居農民和森林獵人的不同之處。根據非常有限的資料可以判定，十四至十八世紀間「烏茲別克人」一詞用來表達屬於游牧族群，該名稱並沒有與特定的民族群體或同名者（金帳汗國的可汗月即別）有任何的關連。金帳汗國的最後一任可汗謝赫·阿合馬，發現了欽察草原游牧氏族的組成與在十六世紀初自朮赤兀魯思遷移至立陶宛大公國的移民之間的相似性，曾提到「我們的烏茲別克人」（бізниц өзбэг та'іфісі）〔13，頁 96，124，рис. XII〕。在突厥和波斯十六世紀的文獻中，諾蓋汗國改名為烏茲別克斯坦，其人民則改稱忙兀特烏茲別克人（узбакан-и мангити）〔14，頁 201，347〕。除此之外，哈薩克汗國的臣民在某些史料中被稱為烏茲別克人和烏茲別克—哈薩克人。根據十九世紀民族學家哈洛什辛（А.Хорошихин）的說法，與哈薩克人聊到其歷史根源的時候，他們常常會說：「我的祖先，我的源起，是烏茲別克人」〔8，頁 251，252〕。

然而不該逐字地引用謝赫—阿合馬（Шейх-Ахмеда）關於烏茲別克民族的言論來作為一個既存民族的證據。這裡的「烏茲別克」一詞可能還帶有其他含意。十八世紀時，準噶爾汗國的渾台吉向哈薩克汗國的阿布海兒宣稱道：「……我們絕不會在這隻烏鴉（俄羅斯女皇—作者註）面前下跪，因為他們（指俄國人—作者註）是坐車的，而我們是騎馬的（意指游牧民族—作者註）」〔7，頁 306〕。

不論我們針對金帳汗國時期將韃靼人這一稱謂解釋為族群性的、政治性的、社會性的，這個詞彙大概都會持續具有種族融合的潛力。種族融合與金帳汗國韃靼民族性的形成在兀魯思的右翼明顯地呈現出來，其中有著發達的城市文明與強大又古老的定居文化發源地（伏爾加不里阿耳、克里米亞、摩爾多瓦）、區域間聯繫頻繁、還廣設專業的國家機構，這些都在可汗強硬且有效（直到十四世紀末前）的權威之下。這樣的統一性無疑地在十五世紀存在了一段時間。然而十四世紀中期的鼠疫、緊接著的戰爭以及從東方跨越了烏拉爾河而來的游牧移民中斷了這一進程。左翼的「烏茲別克人」承載著古老的社會文化規範，他們嚴守部落制度，並在朮赤兀魯思的西部推動再部落化。在汗國的繼承國中（喀山汗國、克里米亞汗國，可能還有阿斯特拉汗國），在地的民族共性開始在金帳汗國（過去是一個相對統一的韃靼民族）的基礎上形成。

再下一個層次是政治意識，也就是將自己歸類為某個君主的臣民，並進而成為特定政體（汗國、部落聯盟）的子民。這裡顯現出一種政治文化的形成，在不論部落歸屬、職業及生活方式，所有被征服民族都同樣尊崇的宗教場域展現出來。對都城及王室陵墓的崇敬代表了一種政治認同的形式，即屬於臣服在朮赤兀魯思之下的群體之一。都城與可汗的陵墓與統治王朝之代表人物的生死有關，也是王朝的家族財產〔見：12〕。同時，朮赤家族凌駕於所有臣服的部落之上（日後在哈薩克人中形成了特殊的貴族階級托熱）。因此欽察草原的所有突厥部族都對這個被賦予神聖魅力及壟斷權力的部族抱有崇敬之情，並承認其為自己的聖地。

史學家們在研究金帳汗國時面臨著重重挑戰。幾乎沒有直接來自金帳汗國的編年史、法條及文件留存至今，基本上所有關於金帳汗國的已知資料來源都是在汗國境外寫成的，且通常由從未探訪過汗國的人們撰寫。這些作品主要是描寫王室的事蹟，有關許多城市以及可汗的領地；而帝國人口的絕對多數—欽察人的游牧群體、其他突厥民族和突厥化的蒙古人仍落在視野之外。即便如此，朮赤兀魯思政治發展的重要階段，其經濟、社會及文化生活的基本特性依舊得以被重建，而國家的歷史也大致可知。透過一些考古學的方法，金帳汗國平民百姓的生活樣貌或多或少得到了還原。十三至十四世紀遺跡的挖掘工作——包含城市與墓地——在一定程度上填

補了此一空白。古錢幣材料為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總地來說，在兩個世紀以來針對金帳汗國的學術研究中，已經確立了大量的史料，而要去分析這些資料需要特別的觀察及專門的專題式研究。當代歷史學家所面臨的任務不只是拓展對金帳汗國過往的認識，還要促進消除過去對汗國形成之傳統的負面刻板印象。我們希望本書有助於形成對該國客觀、公正的視角。

1. 阿梅爾金、謝列茲涅夫，《當代及其後認知的庫里科沃之戰》，沃羅涅日：雙輪戰車出版，2005。414 頁。（Амелькин А.О., Селезнев Ю.В. Куликовская битва в сознани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и потомков. Воронеж: Квадрига, 2005. 414 с.）
2. 《金帳汗國：書目索引》，編：米爾加列耶夫，喀山：韃靼共和國科學院瑪爾札尼歷史研究所，2013。412 頁。（Золотая Орд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указатель. Автор-сост. И.М.Миргалеев. Казань: Ин-т истории им. Ш.Марджани АН РТ, 2013. 412 с.）
3. 伊茲邁洛夫，〈十三至十五世紀金帳汗國人口民族政治意識形成與發展的某些觀點〉，《取自金帳汗國史》，主編：瓦列耶娃－蘇列曼諾娃，喀山：蘇莉安－加利耶娃基金會，1993。頁 17-32。（Измайлов И.Л.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эт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в XIII-XV вв. // Из истории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Отв. ред. Г.Ф.Валеева-Сулейманова. Казань: Фонд им. М.Сулиан-Галиева, 1993. С. 17-32.）
4. 伊茲邁洛夫，〈术赤兀魯思人民的族群政治自我意識形成：突厥－韃靼歷史傳統發展的某些因素與趨勢〉，《术赤兀魯思史（金帳汗國）史料學。從卡爾卡到阿斯特拉罕。1223-1556》，主編：烏斯曼諾夫，喀山：馬斯特·萊恩出版社，2002。頁 244-262。（Измайлов И.Л.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эт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населения Улуса Джучи: некоторые элементы и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тюрко-татарск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 //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 истории Улуса Джучи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От Калки до Астрахани 1223-1556. Отв. ред. М.А.Усманов. Казань: Мастер Лайн, 2002. С. 244-262.）
5. 《自古以來的韃靼史，共七部》第三部，《术赤兀魯思（金帳汗

- 國)：十三世紀至十五世紀中期》，主編：烏斯曼諾夫、哈金莫夫，喀山：韃靼共和國科學院瑪爾札尼歷史研究所，2009。1056 頁。
- (История татар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В 7 т. Т. III. Улус. Джучи (Золотая Орда). XIII - середина XV в. Гл. ред. М.А.Усманов, Р.С.Хакимов. Казань: Ин-т истории им. Ш.Марджани АН РТ, 2009. 1056 с.)
6. 伊斯哈科夫、伊茲邁洛夫，《喀山汗國歷史簡介。論文集》，喀山：韃靼共和國科學院瑪爾札尼歷史研究所，2005。頁 48-53。
(Исхаков Д.М., Измайлов И.Л. Введение в историю Казанского ханства. Очерки. Казань: Ин-т истории им. Ш.Марджани АН РТ, 2005. С. 48-53.)
 7. 《十六至十八世紀哈薩克與俄羅斯的關係》(文件與資料合輯)，群編：沙赫馬托娃等，阿拉木圖：哈薩克加盟共和國科學院出版社，1961。741 頁。(Казахско-рус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XVIII вв.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д ред. В.Ф.Шахматова и др. Алма-Ата: Изд-во АН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1961. 741 с.)
 8. 克里亞施托爾尼、蘇丹諾夫，《歐亞草原上的國家與民族。古代及中世紀》，聖彼得堡：彼得堡東方學，2004。368 頁。(Кляшторный С.Г., Султанов 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народы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степей. Древность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СПб.: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2004. 368 с.)
 9. 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譯、序及評論：奧厄佐娃，阿拉木圖：代科出版，2005。1288 頁。(Махмуд ал-Кашгари. Диван Лугат ат-Турк. Пер., пред. и коммент. З.-А.М.Ауэзовой. Алматы: Дайк-Пресс, 2005, 1288 с.)
 10. 魯達柯夫，《十三世紀中至十五世紀古羅斯文士眼中的蒙古—韃靼人》，莫斯科：雙輪戰車出版，2009。248 頁。(Рудаков В.Н. Монголо-татары глазами древнерусских книжников середины XIII - XV вв. М.: Квадрига, 2009. 248 с.)
 11. 特列帕弗洛夫，〈中小學祖國歷史課本中的俄羅斯各民族(20 世紀

- 前)》，《祖國史》，2003，第一期。頁 114-120。(Трепавлов В.В. Народы России в школьных учебниках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до XX в.)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3. № 1. С. 114-120.)
12. 特列帕弗洛夫，〈术赤兀魯思的宗教地形〉，《民族觀察》，2011。第二期，頁 107-115。(Трепавлов В.В. Сакральная топография Улуса Джучи //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11. №2. С. 107-115.)
 13. 烏德米什－哈吉，《成吉思傳》，復刻、翻譯、轉錄、校對、註釋、研究：尤金娜，評論、索引：阿布賽伊朵夫。阿拉木圖：哥林姆，1992。296 頁。(Утемиш-хаджи. Чингиз-наме. Факсимиле, пер., транскрипция, текстол. примеч., иссл. В.П.Юдина; комм., указ. М.Х.Абусейтовой. Алма-Ата: Гылым, 1992. 296 с.)
 14. DeWeese D. Islamization and Native Religion in the Golden Horde: Baba Tükles and Conversation to Islam in Historical and Epic Traditi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 Press, 1994. 656 p.
 15. The Ta'rikh-i-jahangusha of Alau'd-din 'Ata Malik-i-Juwaini. Pt. I. Ed.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indices by M.Qazwini. Leyden: E.J.Brill: London: Luzac & Co, 1912. 380 p.

結論：世界史中的金帳汗國與韃靼部落聯盟

瓦基姆·特列帕弗洛夫 (вадим трепавлов)

十三世紀，成吉思汗及其繼任者經過多年的征戰建立了蒙古帝國。在蒙古帝國廣袤的領土上形成了類似的（以基本參數而言）最高和地方政府結構以及金融體系。從這層意義出發，我們可以來談論蒙古治世，也就是其政治上的統治及蒙古人帶來的影響；更準確地說，是他們的國家體制。一個多民族的多元文化體系形成了，這是世界史上最早的這種體系之一，使最初的全球化進程得以實現（如上文瑪莉·法孚蘿的前言所述）。然而與歷史上其他已知的治世不同的是，蒙古帝國內並沒有出現共同的文化場

域，而這或許是因為統一的大蒙古國存續的時間過短（半個世紀），它對鄰國文化的影響相對較小（也許一些隨商隊運往大陸另一端的中國發明除外）。

游牧民族素有的以及蒙古人建國初期所採用的國家建設之傳統規範、經濟制度與文化標準，在其草原疆域上——蒙古及术赤兀魯思（金帳汗國）——是最有效的；而察合台汗國（河中地區）及旭烈兀統治下的土地則非如此。被納入成吉思汗帝國內的定居文明擁有自身發達的國家制度與文化，因此征服者的統治是透過地方的權威來施行（羅斯、東突厥斯坦、葉尼塞吉爾吉斯人的地區等），或者由外來的蒙古人自行效仿當地的行政體系。

需要考慮到的是，在成吉思汗死後的最初幾十年裡，他作為帝國建立者及神聖先祖的權威在許多層面調節著帝國內部的關係。對於大蒙古國建國者的崇拜，起初確保了由他所照拂的政治結構與意識形態建設的存續；然而隨著時間過去、隨著汗國內部社會進程的發展與中亞移民在被征服土地上的文化融合，其他形式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逐漸形成。在汗國內部，早在被征服前就存在於臣服地區的強大傳統更加茁壯。這些地方的統治階級必須適應當地的條件。术赤與旭烈兀王朝接受了伊斯蘭信仰，並隨之轉向於城市的伊斯蘭官員與商人；元朝皇帝將宮廷和整個國家漢化，按照中國傳統的模式進行徵稅、劃分行省和建立官制。

比起成吉思汗帝國的中亞、伊朗與中國疆域，金帳汗國存在於一個相對更多維的文明空間裡。支撐著最高政權的不只是合格的官員，成千上萬的草原居民也同樣重要（作為納稅人大眾與軍力基礎），他們保存了游牧民族慣常且具有威望的生活方式、賦予這個國家獨特性、促使游牧和定居文化的傳統與制度共存。在地的定居農業文明基礎（主要來自花剌子模，部分來自克里米亞以及前伏爾加不里阿耳）隨著各種政治變動、經濟轉型與自然災害，時而增強，時而減弱，並退居於游牧文化規範之下。

與元朝（「大汗兀魯思」）內部施行漢化以及旭烈兀王朝的伊朗化類似，金帳汗國恢復了在歐亞大陸這一地帶固有的「母體」、蒙古統治前的國家形式。在這一點上，歐瑪里（ал-Омари）的那句名言新添了一層額外的意涵：「土地戰勝了他們（韃靼人）的自然與民族特質，於是他們都

完全成為了欽察人。」烏古斯—欽察人幾個世紀以來的遺產在朮赤兀魯思的體制中愈來愈明顯。

蒙古征戰以及前欽察統治高層的退位所帶來的動盪，都被在強大且富裕的國家內和平又穩定的生活所取代。過去波羅維茨人的廣袤土地「野蠻的原野」上建立了嚴格且整齊的國家制度，對人口進行十進制劃分。金帳汗國政府不允許擅自從一個兀魯思轉移到另一個兀魯思，以免破壞嚴密的稅收與軍事動員安排。幾十年間相對和平且豐衣足食的生活對人口產生了正面影響，草原部落增加、分化又延伸，他們的領主（埃米爾）獲得了愈來愈多的臣民。在游牧世界裡，這代表著非王朝貴族的社會重要性和政治影響力提升。部落聯盟（эль）的首長—首領地位逐漸增強，其原因不僅出自於十三世紀下半葉至十四世紀上半葉朮赤兀魯思良好的經濟條件與人口發展，還包含了脫脫汗在位期間與月即別汗在位初期拔都統治集團的危機與鎮壓因素，當時朮赤家族在王權爭奪鬥爭中失去了他們的親屬與王朝成員的支持，而在關鍵的游牧領主們這邊則獲得支持，也因此這群韃靼特權階級開始被引入最高統治階層的圈子。

傳統上敵對的朮赤王朝與旭烈兀王朝之間暫時和解，以及金帳汗國接受伊斯蘭作為國教，都刺激了波斯以及烏古斯—塞爾柱人的國家結構元素滲入金帳汗國中。

這個過程同時也伴隨著宮廷、官僚制度及公文事務的突厥化。連同帝國與汗國文化內的各種外來事物（參見本版伊·瓦沙里 И. Вашари 的文章），突厥化也加強了朮赤王朝社會的多樣性。

金帳汗國從授給成吉思汗其中一個兒子的遙遠外省領地，變成了獨立的強大帝國，支配著周圍的國家與民族長達兩世紀。其對歐亞地區歷史和文明的影響力是長期且多方面的，需要更詳細、客觀的研究。

學術界內很早就已提出有關汗國各種形式歷史文化遺產的問題。第一個提出有這類遺產存在的說法由歐亞主義學派——俄羅斯的移民史學家直接提出，然而他們其中大部分的人並不是從事嚴謹的歷史研究，而是針對俄羅斯歷史路線進行整體理解。因此當歐亞主義學的觀點問世時（且有很大一部份繼續存在），並非作為一種史學推論，而是一個尚待事實佐證的歷史哲學觀。

歐亞主義學說綜觀可歸結為三個大陸強權的歷史連續性：突厥汗國、蒙古及俄羅斯帝國，這三個國度客觀而言相互轉移了「聚集」共同邊界內人民的功能。在這種論調之下，俄羅斯（有時還會加上蘇聯）扮演了歐亞大陸過去超級強權的偉大統一使命之繼承者。

人們曾多次嘗試定義出俄國和東方世界多樣化的文明交流形式。一如往常地，這種交流最明顯的指標被認為是從十三至十五世紀的金帳汗國與來自其他更早的突厥國家的外來語。當然也有無可辯駁的例證，首先存於俄國貴族正式稱呼與社會術語（可汗、答刺罕等）、中世紀羅斯的金融體系與驛站服務組織等等；儘管有些作者將東方借鑒的程度絕對化，例如把韃靼人的起源歸於俄羅斯的領地和仕紳大會（佩連斯基 Я. Пеленски）。

定義東方借鑒外來語的方法最初顯然是由維爾納茨基（Г.В.Вернадский）提出：如果某種現象或制度在蒙古統治前的羅斯不存在，但在十四到十五世紀時定型，代表它們出現於韃靼時期興起，可能是從汗國那裏借鑒而來。這種分析方式的風險顯而易見，但維爾納茨基利用這個方法區分出羅斯在經濟、政治與軍事生活層面上的一系列景況，並且可以由此明顯看到亞洲的原型。奧斯特洛夫斯基（Д.Островски）和加爾佩林（Ч.Гальперин）正是以這個方法為基礎研究了金帳汗國對羅斯的影響。但若要完全套用這種方法的話，需要了解的是所研究的現象是否存在於金帳汗國；如果存在的話，是以何種方式存在，而這點因為現在對金帳汗國歷史研究的不足，還很難實現。

由歐亞主義所提出之有關羅斯與金帳汗國的關係、金帳汗國對中世紀羅斯的影響問題，實屬於有關歐亞大陸各民族共同的歷史、國家體制與文化遺產等更廣泛的問題的一部份。

在前蒙古帝國的疆域中，蒙古統治的遺產、帝國機構與法規的影響在其瓦解後於一些地區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以各地政治發展舉例，若將這份影響的強度由大至小排列，會是歐亞大草原與中亞、伊朗、莫斯科公國。

以草原與中亞地區而言，這是因為人口組成沒有變化以及成吉思汗王朝的管理所促成；而在中亞地區，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要加上因為帖木兒在位期間帝國性特別的復興。眾所周知，他致力於重建大蒙古國（奪取

察合台汗國的政權、征服前伊兒汗國、擊潰金帳汗國，並死於對明朝中國——距離元朝不久——的戰役中）。在伊朗，蒙古的遺產疊加在突厥（烏古斯—土庫曼人）部落歷史悠久的古老傳統之上，而這些突厥部落在中東地區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在莫斯科公國，促使蒙古遺產存續的原因是需要藉助韃靼人的管理方式來統治併入俄國的前金帳汗國臣民。

金帳汗國擁有一套發達且分布廣泛的管理制度，這個制度在汗國存在的三個世紀間幾乎都在發展與轉變。朮赤王朝先是在被征服的欽察草原引入了為整個蒙古帝國所採用的傳統制度，後來也善於合理利用被征服民族與其鄰國的行政傳統，形成了一套複雜的管理機關與職務、按照官階分級的中央與地方部門。

歷史學家們素來對朮赤王朝的管理體系展現出濃厚的興趣，有以下幾點原因：第一，該體系穩定的程度，使其不僅長期存在於將此制度創造出來的國家，還持續在後金帳汗國的繼承國與部落聯盟中（以基本的特徵）發揮作用。在蒙古帝國其他的昔日疆域——中國和伊朗——就現在所知，卻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

第二，金帳汗國的管理體系客觀而言對羅斯各個公國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因此在研究十三至十六世紀的羅斯歷史時，如果沒考慮到這個因素，研究便顯不足；在史料學中也出現了一個完整的學派，研究俄國國家體系與文化中的東方特色。

第三，金帳汗國的國家體系展現出一個相當少見的歷史案例：屬於不同經濟系統（游牧的放牧者與定居的農人）、信奉不同宗教和使用不同語言的被征服民族沒有衝突地在廣大的疆域上長期共存。

成吉思汗王朝重複了許多王室的命運：一旦皇室失去王位，其獨佔性便不再被承認。十四世紀末至十六世紀，他們所握有的國家權力開始喪失，在現實政治中，身為成吉思汗的後裔已起不了決定性作用。這個轉變過程呈現的方式各有不同。出現了「古爾汗」（гурганские）王朝，要想登上王位，僅需要與母系的「黃金血統」聯姻即可。正如上文所述，通往權力之路在於當上非皇室的貴族，也就是突厥部落的領主，這些人直到十四世紀中期以前在政壇上幾乎不見蹤影。十五世紀時，部落首領的社會威望日益增長的現象以哈刺赤制度的形式出現，他們是主要部落聯盟（通常

有四個）的領導者，在金帳汗國後期、克里米亞汗國與卡西姆汗國，他們組成了執政可汗底下不可或缺的諮議機關。也可以透過沒有實權的成吉思汗後裔－魁儡來實行執政，這些魁儡大部分都不起眼且無足輕重到不為史學家們所知，他們的使命僅在於透過自己神聖的身分與無聲的存在來神化真正的統治者無上的權力。

相應地《成吉思汗法典》也失去了意義，前蒙古帝國領土上的各個汗國曾在不同的程度上遵守這份法典。哈薩克人與瓦剌人分別於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建立新的法律彙編（《哈斯木汗的光明之路》“Касым ханным каска жолы”、《衛拉特法典》“Их цааз”）。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金帳汗國在歐亞大陸民族版圖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許多突厥民族的起源是以該國不同省份的人口為基礎。在後金帳汗國時代，文書上又多出現了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諾蓋人與庫梅克人等等。以韃靼作為民族稱謂的當代民族群體，其起源也是在術赤兀魯思內。

十五世紀下半葉的史料中開始出現獨立的哥薩克族群。1460-1500 年代，當金帳汗國瓦解、大帳汗國也跟隨其腳步接近垮台，這樣的情況有利於在東南歐草原上哥薩克群體的形成。當時他們幾乎只主要來自大帳汗國的韃靼人組成。那個時期的哥薩克人是草原居民的邊緣族群，可能在名義上繼續被認為是金帳汗國的臣民，但實際上獨立行事。

如此一來，金帳汗國所扮演的歷史角色與其在世界史及和歐亞文明當中的意義問題便非常廣泛。然而史學家們在研究這一巨大範圍的問題時，卻面臨著難以跨越的障礙。我們知道，幾乎沒有直接來自金帳汗國的編年史、法條、文件、公文留存至今，幾乎所有關於汗國的已知資料都是在其境外寫成的，還經常都是在距離金帳汗國數千俄里之外、由從未去過汗國的人撰寫。考慮到這些困難，必須聯合和協調不僅是來自俄國的，還有來自其他國家的不同學科的學者如：東方學家、歷史學－羅斯學者、考古學家等等。

這本集體專著是國際合作的典範。來自不同國家的研究者透過分析多樣化的史料來源，針對汗國歷史中複雜且有爭議的層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我們希望讀者能充分了解金帳汗國的發展、其與鄰國的關係以及其在十三至十四世紀全球政治中的角色。

在許多方面，多虧了韃靼共和國學者們對金帳汗國問題成功的研究，這本著作才得以開展。近幾年來，韃靼共和國科學院瑪爾札尼歷史研究所內的烏斯曼諾夫金帳汗國與韃靼各汗國研究中心在這個學術流派中所扮演的協調者角色愈來愈明顯。由中心及學院舉辦的學術活動（研討會與討論會）、由他們出版的專門期刊、有關汗國主題的專題論文與合輯，使來自不同國家研究中心的同業之間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Ts. 達姆丁蘇倫的兩首短詩試譯

Ts. 達姆丁蘇倫 (Ts. Damdinsuren, 1908-1986) 著

黃柏諺 譯一

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生

楊子嫻 譯二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學士生

Үдийн нар шиг хонгор минь (1932)

Үдийн нар шиг хонгор минь
Үзэгдэж гийлүүлээд ирэвч
Үйлтэй төрсөн би чинь
Үүлний сүүдэрт үлдэж байна

Хар тунгалаг нүд чинь
Хажууд ойрхон тормолзовч
Халдаад тэвэрьеэ гэхлээр
Хаана байгаа нь мэдэгдэхгүй

Зүрхний янаг хүүхэн минь
Зүүдэнд ороод болохгүй
Зүсийг үзэхэд дэргэд ч
Зүглээд очиход солонго мэт

Солонгын гэрэл сайхан ч
Харанхуй болоход хоосон байна
Харанхуй болоход миний бие
Хайрт чамайг хүлээж байна

翻譯一

如正午太陽般 我的寶貝

卿卿¹ 猶如正午空中的曙曦
妳的出現好比陽光普照了荒鄙
哪裡是身來不幸的我所能比擬
僅能苟安在雲影下的杳見地

妳那烏黑清澈的雙瞳
雖就在我身旁轉動
但妄圖將之收攏
卻又不知其所蹤

嗚呼我心所愛慕的女孩
身處夢鄉我倆仍有所礙
在夢裡端詳妳的面容好似依傍搖擺
欲而邁進方覺彼此遙如天外的虹彩

虹彩的光很是美麗
但在天黑時亦顯無力
我雖值此夜幕之際
唯所冀望著可愛的妳

翻譯二

像中午的太陽的 我的親愛的
雖然出現並照亮我
但不幸地出生的 你的我

¹ 「卿卿」，此為西晉王戎夫婦典故，「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此處用以借代愛人，以示兩人間的親密。

卻在陰影下停留

你的眼眸清澈烏黑
雖然在一步之遙閃動著
但若是企圖靠近抱住你
卻又不清楚在哪裡

我親愛的姑娘
在夢之外我們是不可能的
看著你的樣子就在附近
向你走去 你卻像彩虹一樣逐漸遙遠

彩虹的光即便美麗
夜幕降臨後也會變得黯淡
當天一黑
我就會親自去迎接可愛的你

Наалинхай хоёр нүд чинь (1938)

Наалинхай хоёр нүд чинь
Намрын ус шиг мэлтэгнэнэ
Намрын усны долгионд
Наадах нөхөр чинь бөмбөрлөө

Шингэн цагаан царай чинь
Шинэ цаснаас ялгаваргүй
Шинэ цасны ширхгээс
Шимэхийн төдий хайрла даа

Уул царай зүсий чинь

Ус цасаар жишээлэвч
Урд нь суугаад байхад
Улаан нар шиг шиг илчтэй

Нар болсон дагина минь
Намайг хараад инээж байна
Нарны гэрэлд байлгахыг
Наадах нөхөр чинь хүсэж байна

翻譯一

溫柔的你的雙眼

伊人溫和柔順的雙眼
汪汪好似金秋的水潭
立身踏足於此金水靈淵
妳的玩伴我呀嘗在此流連

水嫩的白色臉龐
較之初雪而無恙
此生焉有福份享
啜飲白羅玉瓊漿

觀汝昔日容顏樣貌
雖然好比水雪靜好
但妳在我面前垂袍²
卻似紅日煦暖光耀³

² 「坐」(суугаад)，此處以「垂袍」代稱。參考蒙古習俗，其人喜著長袍。而入座時，為提正其下擺，手部自然下垂，故謂之「垂袍」。

吾幻化如日的天仙閨秀
 嫣然一笑為咱倆所定眸
 作為妳的玩伴我但所盼求
 能夠在這陽光中略坐停留

翻譯二

妳溫柔的雙眼
 像秋日湧出的水
 你的玩伴
 在秋水的波浪中滾動

你水嫩白皙的臉龐
 和初雪相比無異
 請允許我從新雪的絲縷中
 吸吮一口吧

你原本的面容
 雖以水雪比擬
 但在我面前坐下後
 卻又像紅通通的太陽一樣熾熱

變成太陽的 我的仙女
 看了我之後 你笑著
 在太陽的光裡
 你的玩伴希望稍作停留

³ 「有熱感的」（илчтэй），此處借以「煦暖光耀」稱之。「煦」、「暖」兩字原意皆作暖，以此暖暖達到雙重肯定，並藉之形塑出紅日（улаан нар）的熱烈感。而光耀則為煦暖的補述，因紅日的熱感正是伴隨著陽光而為人所體察。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本刊除了接受學術論文外，也接受學術譯作、書評、學術研究發展動態、學術相關科普類文章。
- 三、學術論文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出處，文長以一萬至一萬五千字為原則。並請附中英文摘要（中文摘要 300 字以內，英文摘要 200 字以內）、關鍵字（3-5 個）、徵引書目、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寄至 chinaborderareastudies@gmail.com。
- 四、學術譯作來稿請依上述學術論文來稿規定辦理，但無須附徵引書目；其他稿件僅需附上作者簡介即可。
- 五、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六、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七、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八、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出版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 半年刊

名譽：劉學鈞
發行人：楊克誠
社長：劉學鈞
主編：藍美華
電郵：chinaborderareastudies@gmail.com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http://acbas.org.tw>

印刷者：信強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